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主编 刘宗和 副主编 钱洪良



梁玉国◎著

# 依附战略与东亚发展

YIFUZHANLUEYU  
DONGYAFAZHAN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亚的依附性发展是一个特例,作者在本书中对这一特例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分析,作者理论基础扎实并有若干创新之处,如提出可从依附性发展转为自主性发展的具体条件,日本仍具有依附性质等,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陈晓律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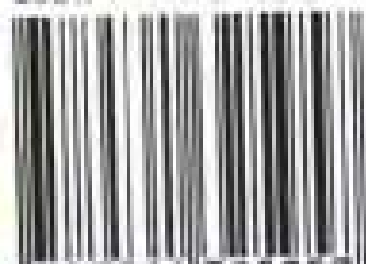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对学术史做了一定程度的梳理,根据对以往理论的归纳,提出了“资本-市场-技术”这样三项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并就美国对日本、韩国在此三个方面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董正华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

本书涉及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书资料丰富,材料组织得较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观点正确,行文流畅。

——王章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ISBN 7-5613-2595-9



9 787561 325957 >

ISBN 7-5613-2595-9/G·1842

定价:220元(全套10册) 本册22.00元

# 依附战略与东亚发展

梁玉国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代号:SK4N06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依附战略与东亚发展/梁玉国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6

(国际战略研究丛书/刘宗和主编)

ISBN 7-5613-2595-9

I. 依… II. 梁…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东亚-现代②社会发展-研究-东亚-现代 IV. F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5626 号

---

责任编辑 任平 史进

装帧设计 刘葶葶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sup>#</sup>(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15 千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 元(全套 10 册) 本册 22.00 元

---

开户行:光大银行西安南郊支行 账号:0303070-0033000469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 话:(029)85307864 85233753 85251046(传真)

E-mail:if-centre@snuph.com

**梁**玉国,1972年生,江苏淮安人,2002年

6月获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理论、中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著(译)作有《发展与争霸》(合著)、《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展历程》(合著)、《20世纪史》(合译),在《太平洋学报》、《安徽史学》、《历史月刊》、《中华战略学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0余篇。

# 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

曹晓敏/著

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霸权与均势

周桂银/著

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研究

高金虎/著

依附战略与东亚发展

梁玉国/著

现代局部战争结束问题研究

滕华斌/著

中西战略思想史

曹晓敏/著

冷战后俄罗斯外交战略

张文岳/著

印度人民党政府对外战略

朱德星/著

西方地缘战略理论

朱昕昌/著

大战略理论与实践

周桂银/著

责任编辑/任 平

史 进

封面设计/刘亭亭

# 《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刘宗和

副主编：钱洪良

编 委：刘宗和 钱洪良 丁诗传  
吴康和 翟晓敏 薛洲堂  
朱听昌 钮汉章 李建波  
杜农一 王文明 周桂银

##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绪论	4
第二章 寻求发展的要素:战后发展理论概述	11
第三章 依附性发展与战后东亚的整体变迁	63
第四章 日本:依附性发展的成功者	114
第五章 韩国:依附性发展半成功的国家	171
第六章 依附与发展:东亚奇迹评述	230
第七章 余论:从依附到一体化	251
参考文献	258



## 自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许多新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所谓不发达世界中的诞生,这些新生的政治实体对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发展,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事情,也是战后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国际学术界从多种角度对战后第三世界展开研究,试图对第三世界的发展进行指导。然而,在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原因的分析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总的来说,学术界的观点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方面,注重从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各自的内部寻求发展和不发达的原因,如欧美理论界形形色色的发展理论流派;另一方面,则从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来认识彼此的发达与不发达,如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这些研究构成了战后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

然而,理论的构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却没有能够形成一种互动,无论是从第三世界内部考察还是研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都没有能够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形成一个明确的指导。相反,理论上的争论,更多的导致了对现实历史认识的一种困惑。战后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无论是否遵循了发达国家所开出的发展“药方”。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战后东亚地区的发展历程。

正是这种理论与历史之间对立的现实,促使作者对战后发

展理论进行了反思。虽然本书花费了许多笔墨来分析战后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的具体发展经历,但是,作者认为,本书最重要的内容以及最初的写作目的仍然在于理论构建。作者对战后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从分析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入手,借助于依附论的全球结构主义的特征,重新构建了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对日本和韩国在二战后具体发展历程的分析,不仅在东亚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复活了依附论,而且将依附定格为获得发展要素的战略,由此,作者对东亚依附性发展向自主式发展的转变寄予希望。

本书即将出版,但是,对于发展理论的探索却远未结束。本书系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因此,所有的缺点与错误由作者承担。

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陈晓律教授,正是在陈老师的悉心指点之下,本文才能够最终完成。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李庆余教授、杨豫教授、沈汉教授、陈仲丹教授、刘金源副教授、刘成博士对于我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写作提出了许多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令我获益匪浅。北京大学历史系董正华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王章辉研究员为我博士论文撰写的评阅意见非常具有洞悉力,使得作者终身受益。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胡成教授,正是由于他的无私教诲与帮助引领我走上学术之路。

感谢外交部外交史处王勇博士、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郭立新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严幸智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李恭忠博士、江苏省委党校李霞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李培锋博士、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宋炯博士等,正是与他们在无数个夜晚的热烈讨论,本文的思路与主题才逐渐的明晰。

感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由于他们的鼓

励和帮助,我才能够迅速的适应这个新的工作环境,谨向丁诗传教授、吴康和教授、翟晓敏教授、朱听昌教授、戴超武教授、袁胜育博士、杨光博博士、宋德星博士、张文茹博士、葛腾飞先生、崔建树先生深表谢忱。特别感谢周桂银副教授,正是由于他的鼓励和帮助,本书才得以迅速完成。

## 第一章 绪 论

### 一、研究的缘起与范围

在西方人的眼中,东方一向以历史悠久和文化独特著称;在当代世界中,东亚地区在战后 50 年中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变迁更给人以奇迹般的感觉。东亚地区由二战初期的废墟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曾经引起无数学者和政治家的各种各样的解释,东亚经济也被冠以“奇迹”的桂冠。然而 1997 年的金融危机又在一瞬间击垮了东亚的“神话”。东亚战后 50 年的发展经历吸引着很多学者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试图揭开其发展之“谜”。

东亚在最近 30 年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学术界对于东亚获得这种经济成就原因的认识却存在着分歧,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东亚模式由赞赏一变为反思与批评东亚模式的缺陷和不足。关于东亚“奇迹”的评价,学术界较为典型的观点是:东亚持续近 30 年的高速增长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当代落后国家和地区追赶型工业化、现代化的典型,它的成就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和难以消解的。同时也应看到,东亚后来爆发出的问题其实早已存在,只不过这些问题大多与成就并存于一体,形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因而问题长期被成就所掩盖

罢了。<sup>①</sup>

那么,东亚早已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战后东亚的成就与危机都是源于东亚依附性发展结构本身的缘故,即东亚在战后能够发展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美国的扶持与援助。随着战后国际格局的改变,美苏对立以及美国出于全球霸权战略与冷战的需要,东亚成为美国刻意要扶植的地区,因而东亚得到了美国大量的资本、技术援助和免费开放的市场,正是由于这一援助才使得东亚获得迅速的经济的发展,因此,战后东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美国而取得发展的。同时也因为这种发展是依附性的,因而它隐含着不稳定与不健康的一面。东亚的经济波动正是这种依附性发展的结果。为此,用最简洁的话可以将本书的观点描述如下:依附导致了发展,但是这种依附性的发展也使得东亚的经济与社会存在着危机。

因此,东亚要改变这种依附性的一面,则必须利用其依附性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他种种措施扭转依附性发展的趋势,从而使得东亚发展逐步的走向自主式发展的方向。通过对依附与发展的辩证分析,作者力图借此而对战后东亚的发展历程进行重构,一方面突破传统依附论的理论局限,另一方面也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战后东亚的发展进行诠释。本书便是这一尝试的结果。

出于行文的需要,有必要对几个宏大的概念进行界定,虽然这种界定可能会产生另一种模糊,但这种工作还是必须的。

首先是对“东亚”一词的界定。本书使用的“东亚”一词是

---

<sup>①</sup> 董正华:“东亚‘奇迹’之后的再思考”,见董正华、赵自勇、庄礼伟、牛可:《透视东亚“奇迹”》(代前言),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页。

一个政治经济范畴,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本书中的东亚地区主要指日本、韩国,但是由于许多统计资料和引用的数据所涉及的范围往往超出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在宏观讨论东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变迁时,东亚一词所涉及的范围除了上述地区外往往还包括中国大陆、香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区。

其次,关于对第三世界的称谓问题。对于第三世界的称谓向来比较混乱,即西方殖民主义者最初将第三世界称为“落后国家”;二战结束前,国际上一般称其为“不发达国家”;40年代末和50年代,一般改称为“欠发达国家”;60~70年代以来称为“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写作和引用有关资料时,各种称谓可能不统一,但事实上都是指第三世界。

最后,需要进行界定的是关于“Underdevelopment”一词的翻译问题。在发展研究中,Underdevelopment 有时候被翻译成欠发达、未发展或者低度发展,出于行文的需求,本文一般翻译成不发达(如果在引用别人著述时则按照原作者的翻译)。与此相关,有“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y)、“不发达理论”(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sup>①</sup>

---

① 关于这几个概念的翻译问题参考了高锴、高戈译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弗兰克著)的译者说明;以及许宝强:“前言:发展、知识、权力”;埃斯科巴:“权力与能见度: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发明和管理”,参见《发展的幻象》(许宝强、汪晖选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页和第84~107页。同时,在埃斯科巴看来,“第三世界”或“低度发展地区”等概念实际上是被西方发展主义理论建构出来的,对于西方以外的所谓贫穷地区,发展主义话语所给予的不同名称:“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发展中地区”、“低度发展地区”、“边缘地带”等等,大抵与“第三世界”或“落后国家”分别不大。

## 二、前人研究成果回顾

东亚地区由不发达达到发展的过程,与发展理论的两个中心论题——不发达和发展——相符合。同时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与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主义的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东亚的发展实践深受发展主义的理论影响并且明显带有发展主义理论的烙印,故而只有对发展理论进行必要的梳理,才能明了东亚战后发展所体现的国际背景与理论影响。

本书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通过对战后发展理论的回顾和依附论的演进来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这一工作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一节的论述之中。

由于发展理论的种类和流派相当之多,以至于想完全概述它的任何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也因为经济发展依然是讨论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和最显著的指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至少是发展最重要的方面),所以,作者在概述前人关于发展主义的研究时,将按照经济和非经济领域来归纳对发展理论的流派或对发展的争论,透过这一争论,作者总结了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资本、技术和市场。对于依附论的演进,作者分三个方面,最初,依附论由于革命的色彩而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早期的发展策略中受到特殊的青睐,虽然它在理解传统的依赖状况时依然是有用,但是它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设计的闭关锁国或脱钩战略在现实中毫无意义;到卡多索提出依附性发展概念后,人们认为依附也能够导

致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式的发展;作者对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进行依附性发展个案的研究,认为东亚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特殊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而引发的依附性发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依附性发展,具有东亚自身的独特之处,而且存在着向自主式发展转化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对东亚的依附性发展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既看到其有利的一面即发展性,又分析了其不利的一面即依附性;并对东亚依附性发展模式的前途进行了探讨。

虽然,作者从依附论的角度对战后东亚的发展历程重新解读,但是在对东亚战后发展研究的探讨中,国内学术界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最为特出的就是罗荣渠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他们对东亚现代化<sup>①</sup>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不仅丰富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而且作为第三世界学者独立提出了一套研究的范式,打破了西方主流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话语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上个世纪末东亚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对于东亚模式的争论“应该被认为不仅仅是一次经济危机,而是一次‘思想斗争’或意识形态的斗争”<sup>②</sup>),对东亚地区的发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重大的影响。虽然作者研究的角度和罗荣渠教授不一样,但是,在研究思想上却是一致的,都是力图打破传统的单线式思维,将东亚发展置于

---

① 罗荣渠教授所主张的“现代化”一词含义实际上就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发展理论,因为罗荣渠教授的思想已经吸取了早期现代化理论以来各支理论流派、特别是世界体系观点后新的综合的成果;罗荣渠教授曾经表示,之所以不用“发展”,是因为这个词已经“属于”经济学,“现代化”为社会学所用,而社会学与历史方法有内在的亲合性;上述观点参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可副教授的未刊论文:“历史对发展意味着什么?”在此深表感谢。

② Richard Higgott,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Political Economy*, Nov 1998, Vol. 3. PP. 333 ~ 357.



广阔的历史与国际背景中去探讨其所发生的种种变化。

### 三、写作说明及篇章安排

本文对战后东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依附性发展的角度进行重新诠释,注重的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观点对具体的一段历史进行重构与解释,因此,在材料的取舍上并不刻意搜罗原始档案等一手资料,而注重的是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新的诠释;而且,由于日本和韩国国内的许多经典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或英文,使得作者能够充分的吸收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时,虽然本文对日本和韩国进行了个案研究,但是,本文所探讨的是一种发展的模式、理论或策略,而不是具体的国家,故而论文题目在范围上仍然界定为东亚。

本文循此思路而展开论述,具体篇章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本书写作的由来与范围,以及资料和篇章的安排。

第二章从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两个方面回顾与概述了战后发展理论的研究状况,由此而归纳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资本、市场和技术。

第三章探讨东亚地区如何因国际环境的变换从而通过依附这一通道获得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并通过具体的历史叙说来揭示整个东亚地区战后依附性发展的成就。

第四章和第五章则通过对日本和韩国的个案研究,揭示两国在战后发展中的依附性特征,详细的论述了两国是如何在依附的情况下取得发展的,以及这种依附性发展所蕴含的结构性

危机,并展望了两国依附性发展的趋势。

第六章对全文进行总结,通过剖析战后东亚发展奇迹的基础上对依附性发展进行了哲学上的辨析,分析了依附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并探讨了东亚依附性发展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重大意义,及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影响力。

第七章系作者对战后东亚发展模式面临转型的一种可能性方向的预测,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特殊原因,东亚的发展面临着多种的挑战,但是,就发展的基本要素的供给链而言,东亚由战后依附性发展模式的转型,最大的可能性是转向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作者为此而简单的分析了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的作用和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可能走向。

## 第二章 寻求发展的要素： 战后发展理论概述

自亚当·斯密以来,对经济发展的关注就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促使全世界经济学家投身于发展理论的研究,那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在费景汉和拉尼斯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后果是大量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所谓欠发达世界中的诞生,而不是政治势力在参战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重新组合。一般说,这些贫穷国家的民族热情实际上无一例外地都体现在渴望经济发展上,尤其是实现工业化。由于它们充分认识到现存巨大的国际收入差距——并再也不能因此而再谴责殖民主义——经济发展已成为其一件最为优先考虑的事情。”<sup>①</sup>

然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因为获得独立而能够迅速的发展了经济。对此,人们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并由此而大大的繁荣了战后发展理论的研究。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战后的发展所遇到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更是与政治、国际环境密切相连。对此,希克斯的观点是,“在指导所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中……把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当作纯经济问题对待,似乎不会

---

① (美)费景汉、(美)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王璐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得到什么效果。”<sup>①</sup>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战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发达国家发展早期的国际背景完全不同。这种区别在法国的调整(regulation)理论的学者们看来,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化,“战前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一直以工业革命时期机械技术与低薪劳动相结合,以生产线为基础的外延型的积累为主要特色。这种生产线上生产的商品行销海外,所获利润再投资于国内的机制产品工业……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中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具体表现为外延型的积累方式为内涵型的积累方式及福特主义的积累方式所取代,这是一种以现代高新技术与高薪劳动相结合、大量生产与大量消费的生产线为基础的积累方式,丰富的国内市场是这种再生产的巨大推动力。”<sup>②</sup>不管法国学者的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他提出了问题,即对于刚刚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何才能完成这种积累方式的转变?如何才能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呢?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才能迈出开始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并因此而登上飞驰的经济快车呢?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构成了战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

本章首先对战后发展理论进行梳理,从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两个方面,对战后发展理论进行概述;通过理论梳理,从而寻找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资本、市场和

---

① (英)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郭家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1~12页。

② (日)小林多加士:“东亚:转型现代化的新范式”,刊载于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第32~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37页。

技术。

## 第一节 战后发展理论研究概述

所谓发展理论,简单的讲就是指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它研究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宏观问题。

在国外,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理论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指的是关于非西方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如何从不发达阶段过渡到发达阶段的学说。发展理论之所以产生在二次大战以后,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非西方国家大都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和间接的殖民统治之下,它们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欺凌和压迫,没有国家主权,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提供发达条件的殖民地。二战以后,世界殖民体系崩溃,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对不发达国家研究的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冷战使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需要考虑的因素。<sup>①</sup>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和领导人目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也油然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发展欲望,开始致力于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尝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首先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开始了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的探讨,其后是一些非西方第三世界国家本身的学者开始了对不发达问题的性质的探讨,发展

---

<sup>①</sup>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大纲》,顾朝阳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5页。

研究一时成了一个世界潮流。<sup>①</sup>

由于战后大量新兴独立国家的涌现,整个世界性潮流已经再也无法容忍殖民地的存在,这正如牛津·斯亭雷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已经开始爆发一场“由过高的期望而引起的革命”。<sup>②</sup>但是,“由过高的期望而引起的革命”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成功者寥寥无几。这就促使人们深入的探讨,发展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如何才能获得这些基本要素?本章首先对战后发展理论进行回顾,探讨前人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对发展基本要素的认识。

在发展理论研究者看来,无论是从研究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着手,发展理论本质上都是在寻求发展的动力和探讨不发达的原因,这样,发展理论研究实际上就包括了两个基本的目标:发展和不发达。由于发展理论的种类和流派相当之多,以至于想完全概述它的任何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也因为经济发展依然是讨论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和最显著的指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至少是发展最重要的方面),所以,本文对战后发展理论的概述将按照经济和非经济领域来归纳发展理论的流派或对发展的争论,对战后发展理论总结的目的是寻求第三世界发展最深远的历史动因。

---

① 张琢主编,孙立平等著:《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45页。

② 转引自(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邢东田、黄汉卿、史少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 一、经济领域的发展理论研究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理解。虽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流派纷呈,但是可以从生产、贸易(流通或销售或交换)与需求(消费)的角度对其进行简单的划分。

#### (一) 强调生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对生产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特色。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作用。马克思认为,虽然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无情的剥削和压迫,而且严重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他还是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进步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相反,所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都是“落后的”或“野蛮的”,也就是说,不发达。<sup>①</sup> (在20世纪,马克思这一观点甚至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例如,凯(Kay)就认为,“资本产生不发达不是因为它剥削不发达世界,而是因为它剥削得不够”。<sup>②</sup>)当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时代,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是“腐朽的”和“垂死的”,但是在殖民地和落后地区,资本主义是年轻的、有生机的并且发展迅速。<sup>③</sup> 列宁就将资本主义一分为二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①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 ~ 2.

② G. Kay,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A Marxist Analysis*, 1975, London: Macmillan, P. 10.

③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17.

正统的发展主义<sup>①</sup>从生产的角度寻找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之路时,主要关注的是工业与农业部门以及其相互关系对发展的贡献。

首先,把工业作为发展的前提。

这种观点最为普遍,它认为,发达国家富有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工业化;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贫困是因为它们仍然严重的依赖于农业。罗斯托是最为广泛地讨论工业化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的研究者,他在1960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的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把发展描述成为五个连贯阶段的直线,欠发达国家只要遵循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就能够从不发达到发达。

即便是十分强调工业和农业应该协调发展的刘易斯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否认自己对工业的偏好。刘易斯曾经指出,虽然“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在1938年写文章,把国际贸易作为‘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我认为‘增长的发动机’是指整个核心国的工业部门。”<sup>②</sup>正因为工业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独特的作用,才使得西蒙·库兹涅茨、阿尔伯特·赫施曼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主导部门”(Leader Sector)的概念,即在工业增长的不同时期和阶段,一些部门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整体,并能给其他部门带来增长动力。<sup>③</sup>这样就提出了工业部

---

① 本文对正统和非正统发展理论的区分是主观的,基本的划分是:如果学者和决策者认为世界的组成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缘”(不发达国家),我们将这些作者的观点归为非正统;而另一些人不接受“中心—边缘”论,其观点即归为正统;此一观点参考了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著:《战后发展理论》,吴正章、张琦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②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梁小民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页。

③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7页。



门内部优先发展顺序的问题。对于工业产业间的关系的关注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三种理论:

**“大推动”平衡增长:**不发达国家的所谓“大推动”平衡增长的发展战略,是拉格纳·纳克斯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首先提出的。大推进方式(或称大推动战略)的基础在于大量不发达的农业地区的弥漫——过度的耕种人口,在大量人口流动和再就业行不通的情况下,因而罗森斯坦-罗丹声明,衰落地区经济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使设备和资本的流动指向劳动者,而不是使人口向资本流动。在雷格纳·纳克斯看来,如何取得资本从而使得经济获得发展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纳克斯首先批评了古典和新古典主义通过贸易获得资本的途径,他指出,今天很多发达国家在19世纪出口到国际市场,才维持了持续的增长,而今天欠发达国家模仿类似方式依赖国际市场以打破“恶性循环”的可能性是有限的。<sup>①</sup>

因此,这项战略认为不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按人口平均收入低下的情况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而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则有赖于资本的增加。这种“大推动”战略最重大的特点是:当一般投资在经济中无利可图时,可以把一些投资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作用,那就会证明有利可图。<sup>②</sup>这也是纳克斯提议解决的方法,即在整個工业领域进行同步协调的投资,以达到市场规模整体扩大的目的。因此,在罗森斯坦-罗丹看来,“促进工业化的因素并不是贸易条件,而是由于工业的外部经济条件大大优于单一农业经济;我不同意自力更生增长或内向型工业化战

①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14~15页。

② W. F. 伊尔奇曼、R. C. 巴加瓦:“平衡思想与经济增长”,见(美)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49~76页,高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略,我主张的战略是:在工业化中谋求国际投资、形成利用国际劳动分工和优势的工业化模式,那样最终会为每个人生产更多的财富。”<sup>①</sup>

事实上“大推动”平衡发展战略由于若干原因,又是很不可能的。这种战略要求一个国家在短期内把巨大的工业部门建立在经济很原始、落后的基础之上,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是很不现实的;地区间的差别将不断要求其进行调整;这一战略的资金来源使它对集团提出的要求处于软弱地位。<sup>②</sup>因此,朴圣相批评了这种战略,认为它“除了加剧发展战略上的严重分歧,并没有给发展问题带来光明的前途;这种舞台式的理论提供了超出实际起步水平、因而是适当的政策指导。”<sup>③</sup>

**非平衡增长与联动效应:**艾伯特·赫希曼提出了他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作为对“大推动”平衡增长的回答。他早在1958年就主张,人为制造不平衡是达到发展的最佳途径;但是赫施曼进一步指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特征是其本国产业关联的脆弱,这使他得出结论:最佳战略是把资金集中投放到那些有若强关联效应的产业上。<sup>④</sup>赫施曼辩称,“大推动”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正是低收入国家所缺乏的。确实,那就是它们不发达的原因。他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传统经济上

① 保尔·N. 罗森斯坦-罗丹:“自然增长:非均衡增长过程分析”,刊载于(美)吉拉德·M. 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205~220页,刘鹤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② W. F. 伊尔奇曼、R. C. 巴加瓦:“平衡思想与经济增长”,见(美)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53~54页。

③ (韩)朴圣相:《增长和发展:实物生产和就业增加的战略》,蔡坚、陈晓希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2页。

④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17~18页。

面强加一个巨大的现代化部门,那是不现实的。但是根据他的分析,最大的欠缺是出现机会时理解和作出投资决定的能力。不平衡增长的战略设法创造一些强使人们作出投资决定的局面来以此弥补这种欠缺,要形成这种局面,就要有意使不同部门之间出现“不平衡”;如果使经济的某些部分增长,配件的缺乏就会对经济形成压力,从而迫使人们进行投资,选择经济发展的先导部门时,应当使配件部门的投资非投入不可,而不是让它们放任自流。<sup>①</sup>

**增长极:** 弗朗索瓦·佩鲁对研究产业关联和它们对发展的含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佩鲁关于“增长极”概念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有推动力的产业”,这些部门或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第二,产业间的相互作用常常会打破平衡,尤其因为它的非竞争性,或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寡头竞争性;第三,佩鲁认为由于人际接触与交往,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了某些特殊效应,即地区不平衡,有活力的“增长极”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增长。根据佩鲁的理论——他的见解是赫施曼和其他赞成不平衡增长的先驱——某个产业出现打破平衡的力量时,如果寡头企业的生产率上升而且资本积累比强竞争状态下更快,就可能推动增长。<sup>②</sup>

正是因为工业对于资本积累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最为重要与明显,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发展理论流派对工业以及工业部门内部发展顺序的强调。然而,对于工业化的过分关注往往是以牺牲农业的发展为前提,而事实上,农业部门通常被错误地认

① W. F. 伊尔奇曼、R. C. 巴加瓦:“平衡思想与经济增长”,见(美)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55~56页。

②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19~20页。

为会妨碍现代化,部分决策者甚至片面地认为只有促进和发展工业才能实现现代化。

第二,强调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对发展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五六十年代,当一些学者致力于工业和工业领域内产业关联研究时,另外一些在发展理论和政策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权威人士把注意力投向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上,并导致了所谓的“二元经济模型”的建立,刘易斯将这种经济模型的基本特征描述为,在一个欠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着一个“传统的”非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部门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sup>①</sup> 随着发展的持续,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逐渐地减少,而现代的资本主义部门则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这样二元性就消失了,现代化就将实现。二元主义在早期的研究中将工业化作为实现发展和消除二元性的途径,而后来的二元经济分析则更侧重于传统农业自身的现代化和发展。因此,有学者将二元主义分为静态二元主义和动态二元主义,静态的二元经济模型强调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有限的相互作用;新的动态二元经济模型则把农业作为传统部门,工业作为现代部门,试图探索这两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相互影响。<sup>②</sup>

社会二元论最初是荷兰经济学家 J. H. 伯克在 1942 年《二元社会中的经济与经济政策》一书中提出,其目的是探索荷兰殖民政策在印度尼西亚失败的原因。虽然对动态二元论的最近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乔根森和费—拉尼斯的著作,但现在已成为经典的阿瑟·刘易斯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对乔根森、费与拉尼斯以及其他大多数最近的二元经济文献来说,代

①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52.

② (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郭熙保、张进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表理论上的“起飞”；其实，刘易斯的著作可以作为连接动态二元论与古典的和静态的二元论传统之间的桥梁。<sup>①</sup> 因此，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被证明更有影响力，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工业上快速的资本积累，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应该把发展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储蓄和投资率占国民收入由4%~5%上升到12%~15%的过程，不过，对于如何获得资本积累，与其他的发展理论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刘易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

刘易斯认为，资本主义部门能够自给自足并且包含所有类型的经济活动，所以它并不依赖传统部门的供给<sup>②</sup>，同时，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根据传统部门的收入而定，但是资本主义部门不熟练劳动的真实工资也是高于传统部门的所得，这样资本主义部门才能吸引传统部门的劳动，通常前者比后者平均收入大约高30%~50%<sup>③</sup>……结果，现代或资本主义部门对传统部门的依靠只是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资本主义部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意味着，如果资本主义部门能够提供额外的雇佣，劳动力的供给将远远超出它们的需求；在普遍的工资本平下，劳动力供给的曲线具有无限的弹性。<sup>④</sup>

乔根森、拉尼斯和费以及哈里斯和托达罗等进一步额化和延伸了刘易斯模式，他们将传统部门等同于农业（其占不发达经济中总劳动力的50%~90%），现代部门等同于工业，当认为

① (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第27页。

② W. Arthur Lewis, "Reflection on Unlimiter Labour", *Essays in Honour of Raul Prebisch*,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2, P. 76.

③ W. Arthur Lewis, "Unlimited Labour: Further Notes",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8, Vol. 26, No. 1, P. 20.

④ W. Arthur Lewis, "Reflection on Unlimiter Labour", *Essays in Honour of Raul Prebisch*, P. 77.

农业的增长和工业增长一样有用时,他们强调为了发展工业必然要从农业抽去资源——劳动力、储蓄和经济剩余。这样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就充分的体现出来。<sup>①</sup>

费和拉尼斯坚持认为,“任何试图加速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如果忽视了农业部门先行的或至少是同时进行的革命,都会发现难以前行。因此,我们强烈认识到这个事实:任何只集中于工业部门劳动吸收能力的成功标准,仅仅只是一个指标,它暗含地包括了农业部门同时释放劳动的能力。”<sup>②</sup>因此,刘易斯通过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限制了工业部门的规模?”开始了他对五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的评论,刘易斯论述到:“最初的回答是詹姆斯·斯图亚特所提出的——那些把剩余农产品用来交换工业制成品的农民的生产力;这一观点长期存在于我们的著作中,在亚当·斯密那里,这个观点成为理解他所说的‘富裕的自然增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经济学’的钥匙。”<sup>③</sup>从而开始强调他向来主张的工农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在刘易斯看来,工农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体现如下:“农业所生产的粮食和原料,除工业部门消耗外还必须有剩余;农民生活富裕了,他们就会成为工业品的市场,如果国内市场太狭小,则仍旧可能通过出口制成品和进口粮食和原料使工业部门得以维持,但是,通过出口制成品来开始工业化则很难。”<sup>④</sup>

因而,二元主义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工农业间的良

①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p. 61 - 73.

② (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第31~32页。

③ 阿瑟·刘易斯:“五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刊载于(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107~126页,刘鹤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④ (美)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乔依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页。

性互动联系。

第三,强调农业对于发展的作用。

上述各种模型中,并没有包括一个单独的农业领域发展机制,实际上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在于农业为其他部门提供生存的基础——粮食,但是农业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的“剩余部分”对于经济发展的潜在作用。正如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所强调的那样:“农产品与农业部门自我消费的比率可能是经济‘发展潜力’最好的可利用的指标,而在农业落后的国家,这种比率总是很低的”。<sup>①</sup> 同样,在刘易斯看来,其他国家没有能够和英国等西欧国家一同进行工业革命的关键在于农业,“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工业革命依赖于农业革命先期或同时发生”;<sup>②</sup> 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工业部门的大小是农业生产率的函数。

为了分析农业剩余刺激或促进工业发展可能的机制,卡尔多将农业剩余定义为从农业部门“出口”的农产品部分,他辨别了农业剩余的主要功能如下:

1、农业剩余为非农业人口、尤其是工业部门的工人提供粮食,非农业雇佣增长的比率依赖于粮食剩余增长的比率;2、农业或初级部门为工业提供原材料;3、工业化成功之前,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4、工业部门为了筹措它的“进口”(国内或者海外资源)资金,它必须“出口”其部门产品……而这又主要依靠农业对工业品需求的增长,因此农业剩余的增长十分

<sup>①</sup> Nicholas Kaldor,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67, PP. 55 ~ 56.

<sup>②</sup> (美)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第6页。

必要,它为工业持续扩张提供了必须的有效需求的增长。<sup>①</sup>

我们知道,工业品增长主要受有效需求增长的决定,而对农业而言,外在的刺激只是起着一个很小的作用,农产品有自主的力量,其主要依靠节约土地和革新,这种革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而且包括农业社会框架的变革,整个制度的网络决定着土地的所有权和农村地区教育的过程……这就说明英国以及欧洲另外的地区所谓的“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而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sup>②</sup>这也为农村土地改革的进行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

约翰斯顿(Johnston)和梅勒(Mellor)早在1961发表的文章就指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上升,所以食品供应的失败将严重地阻碍发展;认识到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的学者还有库兹涅茨,他指出了农业对经济发展在生产贡献、市场需求贡献和要素贡献等方面的历史作用;其中以舒尔茨在1964年出版的《改变传统农业》一书的影响最大。<sup>③</sup>正是由于对农业自身现代化或发展的强调,才导致了两次“绿色革命”的出现和农业复苏运动。

同样,正是由于对农业自身发展的强调,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越高,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越多,农业需要的人口就越少,故而农业人口的转移不在于农业自身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业所能够消化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卡尔多由此而得出了一个类似于刘易斯的假设,“提供给工业的潜在劳动供给是无限制的;因为限制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是劳动被吸纳或利用的比率,而不是潜在供

① Nicholas Kaldor,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55 ~ 57.

② Nicholas Kaldor,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56 ~ 57.

③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39页。



给规模的抑制”。<sup>①</sup>

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但是乔根森、费和拉尼斯以及卡尔多还是达成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也就是不发达经济中工业部门的增长在于农业剩余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这就导致了学者们对农业剩余决定因素的思考,这个问题涉及到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整个农产品增长速度的关系,也就是剩余相对于整个农产品的弹性。<sup>②</sup> 迄今为止,对农业剩余的弹性研究仍然没有结论,因为大多数研究者不太关注不发达经济中农业技术落后可能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原因以及相应的特别低的劳动率;因而对农民阶级结构和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的剥削方式以及关于农业剩余增长的规律,都没有能够吸引大部分的研究。<sup>③</sup> 但是人们认识这种研究的不足,恰恰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农业对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了。

#### (二) 强调贸易<sup>④</sup>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生产的强调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而对外贸易往往涉及一个国家的与别的国家的关系问题。

关于对外贸易和发展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是“增长的女仆”,就是说,经济增长是贸易扩张的原因<sup>⑤</sup>;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① Nicholas Kaldor, "Equilibrium Theory and Growth Theory", *The Essential Kaldor*, Duckworth, London, 1989, P. 428.

②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p. 110 ~ 112.

③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123.

④ 传统经济中的贸易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进行,一般指国家内部的贸易,而本书所说的贸易主要指的是对外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而不是国内贸易。

⑤ H. G. Johnson,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7, P. 65.

即贸易扩张不是经济增长被动的结果,而是它的推动力。<sup>①</sup> 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与依附论关于对外贸易与发展的关系的观点正呼应了上述两种对立的论调。

虽然主流发展理论研究者非常强调生产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也有相当的学者从贸易的角度来考虑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其中强调贸易对于发展的积极作用最为有名的理论就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新古典主义认为外贸是有效的“增长动力”,因而赞成自由贸易,他们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出口;而源自贸易的利益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特征,静态如同他们称之为直接收益,产生于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动态收益是间接的由贸易产生,主要是由于比较成本低的缘故,各国分工,专门生产一两种商品出口,成本自然就比较低,所以新古典主义认为自由贸易将导致国际价格和收入的平等。<sup>②</sup> 正因为如此,新古典主义批评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ISI),例如,威纳(Viner)、哈伯勒(Haberler)、鲍尔(Bauer)和雅梅(Yamey)等人认为ISI战略妨碍了建立在相对优势基础上的自然发展过程,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是初级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并且要鼓励他们发展农业和种植业。<sup>③</sup>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斯旺(Swan)在1956提出了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新古典主义模式强调

---

① Denis Robertson,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St. Albans, Staples Press, 1948, P. 214.

② Magnus Blomstrom,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The Dependency Debate and Beyond: Third World Response*, London: Zed Books Ltd., 1985. P. 14.

③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49页。

增长是如何从资本积累开始的。他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公式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说明。首先每个有效劳动单位的股本  $K$  发展如下：

$$(1) \dot{k} = sxf(k) - (n + g + \Delta) K$$

$S$  是储蓄率,  $n$  是人口增长率,  $g$  是技术增长率,  $\Delta$  是资本贬值率。只要生产能力得到很好的运转, 经济随着时间的变化就会接近一个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的状态被定义为: (2)  $\dot{k} = 0$  或用一颗星来表示不变的价值: (3)  $sxf(k[sup *]) = (n + g + \Delta) K[sup *]$ 。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下, 每个有效单位的产量是不变的, 即:  $y[sup *] = f(k[sup *])$ 。特别是当  $Y = K[sup Alpha](AL)[sup 1 - Alpha]$  时, 每个有效劳动单位的产量将被定义为  $y = Y/AL$ , 此时每个有效劳动单位的资本是  $k = K/AL$ 。这就意味着  $y$  的增长率直接与  $k$  的增长率成比例, 这样, 这种稳定的状态  $y$  和  $k$  的解决办法如下: (4a)  $y[sup *] = [s/(n + g + \Delta)][sup Alpha/(1 - Alpha)]$  和 (4b)  $k[sup *] = [s/n + g + \Delta][sup 1/(1 - Alpha)]$ ①

上述公式表明, 有着相似生产技术、资源环境、储蓄和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将达到相似的稳定状态的个人平均所得水平。正如世界银行 1991 年报告所宣扬的那样, “假若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能获得工业国的新技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国的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可能趋于相同。”②索洛 - 斯旺模式意味着穷国在追赶富国的变革时, 虽然生活水平和资本或劳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 但

① Toh Mun Heng, Tiew Chee Siang,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of the ASEAN and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Aug 1999, Vol. 16, PP. 149 ~ 166.

② 世界银行:《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 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 第 13 页。

是其增长却很快。特别是,他们强调,通过自由贸易可以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这样穷国就会循着富国的道路而达到发展的阶段;而且他们认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可压制的力量,通过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而有助于穷国和富国在收入和生产方面稳步前进。<sup>①</sup>

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基石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及比较优势概念。比较成本学说是由19世纪的大卫·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框架中首次作了说明。比较成本学说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能够给双方都带来好处——即使其中一个在所有商品生产方面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他们认为不发达经济应该实行自由贸易,并且专门生产他们具有比较利益的商品,即: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换言之,新古典主义倡导自由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sup>②</sup>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中心主席安德烈·菲利普(Andre Philip)所论述的那样,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出口,以赚取足够的外汇去支付必要的进口——无论是机器、材料或食品,只要是在国内生产不经济的;在管理上应更好地利用价格机制,高成本的国内生产应被重组过的农业和工业所取代,以逐渐加强其自身竞争力并在国际市场上立足。<sup>③</sup>

但是,事实上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却并不能证明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的观点。保罗·巴洛克(Paul Bairoch)广泛的研究了1860年以后的自由贸易与欧洲的经济的发展,他对于贸易的作

---

① Toh Mun Heng, Tiew Chee Siang,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of the ASEAN and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Aug 1999, Vol. 16, PP. 149 ~ 166.

② Rune Skar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P. 19 ~ 20.

③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50页。

用进行了比较的分析，“发达的”英国是一方，而“不太发达的”法国、德国、意大利为另外一方。他的研究概括如下：“很明显，自由贸易对这两种类型的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在发达国家中，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经济增长最为迅速；对于不太发达的国家而言，结果却是消根的，在这三个国家中——法国、德国、意大利——自由贸易时期的经济效果与自由贸易理论预见的完全相反：经济增长、革新和投资都在减速……然而，当保护关税（1880～1890年左右）重新介绍到三国后，经济趋势却整个地颠倒过来：增长加快、革新和投资的步法加速。”<sup>①</sup>

这样，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的缺陷就引起了人们的质疑。辛格（H. W. Singer）认为现存的国际劳动划分对经济繁荣是一个障碍，不发达国家出口原料，在与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中受到了伤害。这样，源于外贸的收益就集中于“中心”，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所宣称的那样提高了所有国家的福利。<sup>②</sup> 而冈纳·缪尔达尔进一步指出，新古典主义认为一个地区的发展，通过扩散（Spread）效应会导致另外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国家收入增长导致进口需求提高而增强另外国家的生产，通过贸易从而使别的国家的收入得到了提高，对此，缪尔达尔认为，这种所谓的贸易“回流（Backwash）”效应可能导致不发达。因为自由贸易不仅不能平衡不同国家的收入，相反可能会趋向于加重这种差异，这是因为市场的扩大通常有利于那些发达的工业国。<sup>③</sup>

① Paul Bairoch, "Free Trade and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72, Vol. 3, P. 211.

② H. W. Singer,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0, Vol. II, P. 112.

③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16.

因此,对于目前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巴洛克认为,“19世纪欧洲大陆的经历应该引起那些掌握国家经济政策而且想着手增加外贸以享受较高水平的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人的警惕”。<sup>①</sup>这样,经济发展的现实就表明,同这个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相反,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总的来说将趋于产生不平等,并且当已经存在大量的不平等时,这种作用更为强烈。<sup>②</sup>

新古典主义虽然对比较成本进行了解释,并试图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但是,新古典主义理论除了缺乏经验的支持,而且它所设计的假设条件并不存在,特别是对于跨国公司这种发生在公司内部而非国家之间的贸易,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实际上无话可说;同样,新古典主义对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资本概念等的解释也是难以令人信服。同时,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之间的贸易交换关系应该持续地有利于后者,这是因为,首先,不发达经济专业化生产的初级产品容易受到报酬递减的影响;其次,与初级产品的生产相比,技术进步导致的报酬递减在制造业中表现的更为迅速。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如果价格等同于边际成本,正如新古典主义所宣扬的那样,那么初级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的比率应该上升。而事实上却显然不是那么回事。因而新古典主义希望把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打算在现实世界中并不能实现。

与新古典主义不同,依附论<sup>③</sup>却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持怀疑

---

① Paul Bairoch, "Free Trade and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72, Vol. 3, P. 244.

②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大纲》,第242页。

③ 由于作者在、将详细的探讨依附论,故而本处只是简单的说明一下该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的观点。

的态度,早期依附论对贸易的作用是持否定的态度,后期则有了一定的修正。

早在1950年代,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早期依附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他的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同事们就对新古典主义的贸易理论提出挑战,他宣称,贸易关系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利于不发达经济的。他将世界分成两部分:中心(工业国)和边缘(不发达经济,从事农业和其他初级产品的生产)。<sup>①</sup>普雷维什认为,贸易关系不利于边缘的根源在于中心和边缘对于收入弹性需求的不平衡,由于中心地区技术的进步、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以及保护关税的政策,使得中心对于边缘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而边缘对于中心工业品的依赖却在加深。普雷维什假定中心和边缘的贸易在长期内是平衡的,并且中心存在着自动增长的机制,那么中心地区收入增长的比率就决定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普雷维什运用哈罗德关于边缘的对外贸易收益增值率理论,从而推断出,边缘的人均收入增长比率远远低于中心。<sup>②</sup>

正是由于对外贸易并不能给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增长,所以,普雷维什认为,边缘要想“修正”收入弹性进出口需求的不平衡,并且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法只能是“进口替代”工业化,也就是传统的进口商品将逐渐地由国内生产。<sup>③</sup>普雷维什之所以拒绝通过贸易来获得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其原因正如弗兰克和阿明等人所论述的那样,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条件剥削边缘国,给不发达国家带来的是贫困和灾难,而不

①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viii.

②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39.

③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40.

是欠发达国家所梦想的富裕。弗兰克和阿明指出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并且形成了弗兰克所描述的“大都市”和“卫星城”之间的依附链条。显然,早期依附论认为,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只能是附属的,是取决于以利润为中心国家的需求,是其发展的后果,边缘国家只是为中心国家服务的,有人由此而将这一情形描述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讲,早期依附论是主张发展中国家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束缚,走民族自主的发展道路,以发展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取得经济的发展。布伦纳(Brenner)认为弗兰克理论的后果将是闭关自守,而不是社会主义,<sup>②</sup>其根源就是由于弗兰克对于贸易的否定态度,因为弗兰克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状态,不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机会。

很显然,在经济一体化潮流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早期依附论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且在现实上也无法解决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所以必须要对依附论进行必要的理论修正,以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对此,费尔南多·卡多索和恩佐·法莱托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和发达国家利益群体建立一种相互的关系,还是可以导致“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即在依附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获得资本主义的发展。<sup>③</sup>可以说卡多索等人的观点已经部分的接受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功能,

① 房宁:《世界潮流中的国家利益》,《北京青年报》,1996年7月18日。

② R.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977, No. 104, P. 91.

③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31.



如果我们同意卡多索将发展定义为:“资本积累和它对不同生产体系的影响”,那依附性发展就意味着边缘地区的资本积累和一定程度上的工业化,并且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个特例,表现为国外资本和本土资本的结合或联盟。<sup>①</sup>而正是这种联盟,使我们可以推知依附论对于贸易作用的部分接受。

### (三) 强调需求<sup>②</sup>对发展的作用

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功能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作用是不同的。贸易的前提是产品,而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销售出去,关键要看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情况,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技术的革新、生产的增加、产品的积累其后果就是要寻求销售的市场,也就是要扩大需求。从经济学角度而言,生产、交换(贸易)、消费(需求)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循环的过程,需求不仅是经济景气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且还直接地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在20世纪初期,西方特别是英国经济学界盛行的是理论是剑桥经济学的均衡理论,这种理论对付经济危机的方法是通过供求力量的自动调节,认为市场自身能够调节经济使就业充分,实现均衡发展,而一旦出现严重的失衡现象,关键就在于供求力量自动调节的功能受到外界因素如工资太高或者利息率不合理等因素的干扰,这样,只要调整利息率或工资,失衡现象就会消除,社会发展就会趋于稳定,危机自然就会消除。然而,社会发展的事实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凯恩斯从理论上否定了剑桥经济学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善性、和谐性,通过供求力量自发作用就可以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论证。凯恩斯认为,由

①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 32.

② 此处所讨论的需求主要指一国内部的需求和国内民众生存的基本需求,而不是来自国外市场的需求。

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灵活偏好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中总需求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是不可避免的,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为了减少失业和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就应当设法增加有效需求。<sup>①</sup>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第三章中将有效需求定义为:D(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佣N人所获得之收益)在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点时之值,称为有效需求,<sup>②</sup>凯恩斯认为:“此即就业通论之要旨。”在《通论》第六章中,凯恩斯说:“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包括其他生产原素之所得(亦即雇主之原来成本)在内。”<sup>③</sup>从凯恩斯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也就是企业主的利润达到最大化时的总需求。

《通论》于1936年问世时,它所提供的与其说是一项新的、激进的计划,不如说是为一种已经采用的行动步骤进行辩护和解释。《通论》清楚地指出,美国——实际是西方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不过是商界方面缺少足够投资的结果。因此,所做出的补救办法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假使商界未能进行扩张,政府就必须代为进行。<sup>④</sup>

如果投资不能直接起到刺激作用,那么,至少消费是能够起这个作用的。投资固然是经济体系中一个捉摸不定的因素,但

①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3~225页。

②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26页。

③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49页。

④ (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61页。

消费却是经济活动中一个坚实的底层。因此,一般认为用振兴署计划来解决问题是具有一箭双雕作用的;它既可以帮助维持,否则将因失业而不复存在的购买力,又可以使私营企业重新走上扩张的道路。因此,凯恩斯在1934年亲自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说道,“我是按照下面的观点看待经济恢复问题的:正常的私人企业什么时候才会出来起到挽救作用?在它尚未出来的期间,不正常的政府支出,要在什么规模上、用什么权宜之计、经过的时间要多久才是适当的?”<sup>①</sup>

要注意“不正常”这个字眼。凯恩斯并不认为政府计划是对商业活动的永久性干预或者别的什么事物,他认为,只有当体系已经滑出轨道、正在挣扎着希望恢复正常时,由政府从旁助一臂之力是可以的,此外都是不对的。<sup>②</sup>

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关于有效需求方面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内容,第一,通过有效需求理论来代替剑桥学派的经济自动调节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第二,要求把政府的首要责任之一转为控制有效需求即总需求的水平:如果有效需求不足,主要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它或直接提供它,如果需求过度,主要以财政政策来抑制需求。<sup>③</sup>可以说,在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深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这种通过政府的力量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成为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一种最重要的替代方案。

---

① (美)罗伯特·L. 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第162页。

② (美)罗伯特·L. 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第163页。

③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第232页。

很清楚,凯恩斯关于刺激有效需求的药方对发达国家恢复资本品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未被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是很有意义的。紧缩通货的理论是基于存在着未被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的假设,因此反紧缩通货的措施就主要被用于在一定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供给水平上增加有效需求。但是,这种办法完全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物生产分析提出的假设是,同大量潜在的消费者需求相比,生产设施太不充足了,因此需要通过实物生产分析探讨创造供给的措施。如果需求即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当今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应当是最发达的国家了。在这方面,我们相信古典主义的“数量理论”才最接近发展中经济调整需求时的真实情况。引导需求的发展战略在这里行不通,因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高于发达国家,更不用说有一大批需大量资本品的投资项目。<sup>①</sup>

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问题在于生产的能力太大,所以需要寻求或刺激有效需求;对于发展中国家,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十分薄弱的生产能力。这样,发达国家强调需求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试图由政府出面通过调节需求从而控制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形势。而第三世界国家探讨需求的作用却恰恰相反,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需求首先指的是生存的基本需求。因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十分贫困,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认为,“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虽然 20 世纪的技术革命创造了众多机会,但仍有占世界人口 1/5 的 10 多亿人每天的生活费尚不到 1 个美元——这是西欧和美国 200 年以前就达到的生活标准。”<sup>②</sup>所以说,“对那些勉强度日的赤贫者来说,每

① (韩)朴圣相:《增长和发展:实物生产和就业增加的战略》,第 25 页。

② 世界银行:《1991 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 1 页。

天的生存才是当务之急,并不能说穷人生来就是目光短浅的。”<sup>①</sup>

因此,第三世界国家所理解的基本需求就与发达国家的概念完全不同。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在1976年世界就业大会上对基本需求所下的定义那样:基本需求包含两大部分,首先,它包括一个家庭在个人消费上的基本最低要求,如充足的食物、居所、服装、家庭设施和服务;其次,它包括由社会提供并使社会受益的基本服务,如安全饮用水、卫生环境、公共交通、健康与教育设施。<sup>②</sup>

发展是一把双刃之剑,同时创造和破坏价值,它的利益常常被吹捧而代价却并不符合。人们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然而增长的结果并没有给普通的劳动者带来实际的利益,相反,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和更大的贫富差距是他们努力结果的唯一回报。“滴落”机制(Trick-down Mechanism)和正统的再分配手段——通过税收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对于穷人而言,并没有什么效果。正因为如此,人们开始对发展的方式进行反思,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在1969年发表“发展的意义”演说中提出,“应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提出以下问题:贫困情况怎么样了?失业情况怎么样了?不平等情况怎么样了?如果这三者都从高水平下降了,那么无疑这是该有关国家的一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有一项或两项变得更糟,特别是如果三者都变糟,那么,即使该国的人均收入倍增,也不能称这个结果为‘发展’。”<sup>③</sup>而埃莫里也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批评:这种传统的

① 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②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79页。

③ 高钰:《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发展模式建立在增长的假设上,并强调现代部门,它认为发展的答案就存在于增长自身之中,增长的成果会自动的在一段可接受的时间内,传播到劣势经济部门和人口的较贫困阶层,这种假设已被证明是错误的。<sup>①</sup>

希尔斯的演说表明,正统发展思想对发展的认识开始从经济增长转向关注贫困、失业和非平等等方面,这就导致了改革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改革主义强调通过国家干预,以取得缩小国内发展之间的差距,为贫穷的人提供最基本的需求,要达到这个目标,改革主义认为应该关注三个方面:就业,再分配和人类的基本需求。<sup>②</sup> 满足基本需求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已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列为首要任务,1960年,印度的首任总理在介绍第三个五年计划时说:“据说国家收入在‘一五’和‘二五’期间提高了42%,人均收入增加了20%;那么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增加的部分)到哪里去了?……我可以看出人民的吃穿都有了改善,他们还盖起了砖房……(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受益”。<sup>③</sup>对于政府而言,满足基本需要意味着既要发展经济,又要推行一系列目标明确的社会发展规划。

改革主义所关注的消除贫困的三个方案中,满足基本需求方式被认为是一种消除贫困的最佳、最快的方法。1977年,斯特里腾就明确阐述道,基本需求发展方式是从提供人类个性全面的、物质的、精神的以及社会发展机会这一目标出发,然后达到这些目的。<sup>④</sup> 然而,从更宽泛的角度而言,就业、再分配和基

①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74页。

②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73页。

③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49页。

④ 转引自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80页。

本需求这三个方面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点的,即都是从需求的角度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就业是需求或者消费的前提,而再分配则是政府出面对这一前提的必要补充,对于基本需求,这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培植潜在需求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尽管它通常以人道主义的面貌出现在各项政策之中。

需求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意味着培植新的市场以销售它的产品,特别是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这类出口导向工业化国家。由于它们的国内市场狭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就特别严重,外部需求就显得意义非凡。关于这一点,本文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详细地讨论。

我们从生产、贸易(流通或销售或交换)与消费(需求)的角度对战后经济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概述,虽然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如果对此一时期发展理论有所了解的话,就会觉得试图全面总结发展思想的做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提议。同时,我们对战后发展理论的归纳与总结,其根本目的在于从中寻找出第三世界发展的基本要素,以便由此而对战后东亚地区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 二、非经济领域的发展理论研究

发展长期以来就被等同于现代化和西方化,并且直接作为经济学问题被研究。经济学理论对于发展的决策人而言一直是政策规定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如今被广泛批评为种族中心主义和经济简化论,经济学自身在其概念化、方法论和分析方面正在复兴道德规范;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孕育而生;并且一种新的学科(Discipline)——发展道德已经形成,发展道德集中在关于价值问题等发展的研究上;在追逐美好生活过程中,拥有物质(having goods)和存在美好(being good)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一

个公正社会的基础是什么,社会应该对自然采用什么样的姿态?这一新学科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两点:从事伦理理论明确表达的发展活动,对主流伦理的批评并且以精巧设计的标准化策略来指导发展实际。<sup>①</sup>在1967年,发展被看作是一种进步,通过运用技术而获得自我可持续经济增长,最终消灭贫困。教皇保罗六世对这一经济简化论提出了一个纠正性的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和精神发展的重要性。在1997年,这一人类发展的广泛性观点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包括 Sen, Daly, and Power)的挑战。后现代主义思想家(Latouche, Escobar, Esteva, Sachs)谴责后现代主义是新殖民主义,扮演着将西方人的福利观念强加给世界其余地区的角色,尽管她承认保罗维护了正义和尊敬不同的文化。<sup>②</sup>

虽然我们承认经济发展在发展中的主流地位,但是事实上发展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政治、社会、文化等都是发展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到1980年代以后,把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个别民族国家与整个人类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考虑的综合发展观,即“可持续发展论”大为盛行。因而,从一般意义上说,发展主义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社会进步理论;具体而言,发展主义则是“二战”以后的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理念,是继马歇尔计划之后西方阵营的第三世界发展战略,也是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以及种种关于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等不同版本的发展学说的总称。<sup>③</sup>

① Denis Goulet, "Development ethics: a new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4(11):1160-1171, 1997 (Report 14:23, Spring 1998).

② Denis Goulet, "Development debates (in French)". *Spiritus* 38(148), pp. 288-297, Sept. 1997. (Report 14:23, spring 1998.)

③ 周惠明:《挑战发展主义》,《读书》2001年第12期,第92页。



事实上,发展理论并不存在着单一的方面,即使是典型的发展经济学流派往往也很关注政治和社会。因此我们在概述非经济领域的发展理论时,例如政治发展,并不是指单一的理论,只不过这一理论强调的中心是政治领域而已。对于非经济领域的发展理论,出于论述的需要,本文并不试图全面的进行分析,而且那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因而,本文只是集中于政治领域的发展研究,同时兼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论述。这既是行文的需要,也是因为作者的能力所及。

### (一) 政治领域的发展研究

西欧的经验提出一条走向现代发展的直线道路,发达国家的现状就是不发达国家的未来,最初的发展理论所描绘的美好前景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对前途充满了乐观。在1950~1960年代,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它们的注意力首先转向了未来,计划经济发展和繁荣,这个时候的发展理论投其所好,更注重解决当前的发展问题和保护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不是检查西方和第三世界过去的历史。在1950年代后期,西方有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欧洲和北美经济发展的历史,试图为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sup>①</sup> 当时美国制定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第三世界)的政策时,它的经验就体现在下述的信念中:先发展经济,再进行社会改革,这两步成功了,政治稳定便会水到渠成;美国人脑海里的因果链条是:经济援助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促进政治稳定。<sup>②</sup> 在当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认为第三世界的繁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前提当然是要追寻欧美的

① Gavin Kitching,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82, London: Methuen & Co. Ltd., P. 1.

②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5页。

发展途径与历程。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际状况却远非想象的那么乐观,到了1960年代,第三世界所遭受到的,更多的是经济崩溃的灾难而非富裕的文明成果。

这样,到了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鼓吹上述观点的学者们因为他们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而受到了批评,巴兰和弗兰克等认为,他们仅仅在重复西方的发展模式,而忽略了“帝国主义”剥削在西方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不明白,西方的发达和它在目前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注定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依附”或“边缘”状态,这样重复西方的道路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因此西方经济史是不适合第三世界的,那么唯一向前的办法就是革命和社会主义。<sup>①</sup>

实际上巴兰和弗兰克的观点暗含了一种趋势,即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政治的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巴兰和弗兰克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逻辑的结果,当时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也是这一结果的一个强有力证据。在1960年代后期,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不仅经济上崩溃,而且确立了以集体暴行、军事政变与分裂为特征的政治模式……因此,国家与政权的问题又开始从新的角度进入人们(发展理论研究者)的视野。<sup>②</sup>

要想取得经济发展,就必须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发展理论研究者认识到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后,放弃了一贯的自由与民主思维,而从第三世界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sup>③</sup>,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败的

① Gavin Kitching,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1.

②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③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页。

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整合往往引起激烈的冲突,而只有在强大和有效的政府控制下,这种转变才有稳定的政治保障。

有关政治发展的传统论著强调政治方面,把政治发展区别于经济发展,这种论著汇集为三种类型:一类与民主的概念有关;另一类关注政治发展与变革的方面;第三类研讨政治发展的危机与结果。对于发达国家的历史而言,自由和民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经济是社会的事情,让“看不见的手自主的发挥作用”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对这一原则进行保障的就是民主。

然而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并不能简单的套用到第三世界中去,第三世界国家在五六十年的发展现状却又促使政治学家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思维,这样政治学家们至少在表面上逐渐放弃了现代化理论中的民主理想而赞成有序的政治……由于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对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的需要,后来的学者就将其称之为强大政府学派。<sup>①</sup>他们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从第三世界的角度考察国家或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集权主义虽然在外表上不如民主那么诱人,但是东亚战后发展的现实却表明在经济发展中集权主义、行政强制等封建色彩较为明显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而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

<sup>①</sup>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第169页。

为自由民族”。<sup>①</sup> 虽然东亚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但是,事实证明东亚集权式的发展模式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政治发展所涵盖的领域和范围是相当的广泛,不仅第三世界国家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发达国家也时常面临这一问题,但是,就发展理论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对民主参与、政治发展、合法性以及自由的关注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并不切合实际情况。发展理论关注的是落后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与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内容,其余的一切都是这一中心的辅助部分。因此本文考察的政治发展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发展,而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中政治所起的作用这一意义上的政治发展。

## (二) 其他领域的发展研究

虽然近年来发达国家也开始关注本国的发展问题,但是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讲是研究不发达国家如何才能发展的问题。同时,就本文的主旨而言,主要是研究战后东亚的依附性发展问题,因此,在作者看来,回顾一下前人对东亚发展评论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战后东亚的依附性发展研究,其核心问题仍然是战后东亚的经济发展;同时,战后东亚取得的重大成就也体现在经济方面。所以,虽说是在概述其他领域的发展研究,但实质上剔除了与本文主旨并无太多相关的理论或观点,而只是概述与东亚发展相关的一些理论或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比较重要的无疑包括现代化理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文化与发展的关系等。

---

<sup>①</sup> (法)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1页。

现代化与发展理论之间的差异与争论由来已久,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化包含着一种过程,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理想;而发展的重点则是对过程的强调……现代化是一种目标,而发展则是实现此目标的方式或手段。<sup>①</sup> 本文之所以没有从现代化理论考察东亚的发展过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对于落后地区的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现代化的过程,而是如何启动现代化的第一步,而发展理论则更多的考察落后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寻找不发达国家开始发展最合适的启动方式。

探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对于东亚而言有着与众不同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政府的作用。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国际市场为贸易商品设定的价格,但是,东亚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国家制定政策的权利,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制定价格的权利,同时,对世界市场作出反应的是国家而不是经济本身;这样,一个“发展的”国家就能够加速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国家不仅能够修正市场的失败,而且能够提高市场体制有效运作的结果。<sup>②</sup> 这样就提出东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较为独特之处,即国家的作用。国家在增长中的特性和作用是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但是容易引起争议的是何种类型的政体能够最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主流发展理论研究通常着眼于民主资本主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很少能够解释为何一些独裁政体获得持续的、迅速的经济增长,而另外的国家却失败了。事实上对于东亚地区而言,答案正是由于其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注重政府的功能和作用,当然人们也通常认为这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

①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第17~18页。

② James L. Dietz, "Overcoming Underdevelopment: What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e East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Jun 1992, Vol. 26, PP. 373 ~ 384.

个较为共同的倾向,正如福山(Fukuyama)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150年中,许多给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记录不是民主政治的汇编,而或多或少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独裁国家所带来的”。<sup>①</sup>事实上,对于极权主义作用不应该作如此简单的分析,而应该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在最初的经济发展中,极权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可能更为有利,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极权主义政体则会妨碍经济的可持续、迅速的增长。斯蒂芬·雷杰因此而分析道:“(当极权主义)在一个有利的自由贸易环境中,并可以从相似的跨国网络中获得大量的技术和巨大的投资,这就有可能在最初较低的水平上获得很高的增长;但是在发展的后一阶段,这一增长过程在一个更民主的环境中有可能更成功。”<sup>②</sup>或许,这也是不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时必须强调国家作用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因为在国际环境里,一个不发达国家比单个国家中的不发达地区处境更弱,其原因就在于不存在一个能像单个国家中的政府那样立法、征税和补贴、保护和促进不发达地区的世界性政府。<sup>③</sup>因此,东亚在战后发展的初期,政府所起的积极作用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东亚在获得巨大经济发展的现代,则应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

与东亚发展研究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文化因素。日本经济的显著增长和战后迅速的恢复以及经济扩张使得人们思索,是否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伦理或价值体系在其中扮演关键

---

① Shuhe Li, Peng Lian, “Deentra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China’s Credible Commitment to Preserve the Market Under Authoritarianism”, *China Economic Review*, Fall 1999, Vol. 10, PP. 161 ~ 191.

② Stephen Wrage, “Examining the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in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the Wake of Asian Economic Failure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Jan-Mar 1999, Vol. 22, PP. 21 ~ 32.

③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大纲》,第243页。

的作用;当四小龙也加入发展的行列后,人们提出了儒家伦理来解释东亚各国的发展原因;但是,到八九十年代,随着东南亚等与儒家没有什么联系的国家也加入快速发展的行列中,这种亚洲价值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就变得很复杂了。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管这种东亚价值在解释东亚经济增长中扮演何种作用,它们能够在增长中幸存吗?我们称所见到的东亚种种变化为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方面的发展——工厂、货币和信用、银行、商业关系、城市以及摩天大楼、消费经济——而且包括社会和价值的变化,这似乎是伴随着经济方面不可避免的结果。确实,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是一前一后的发生,就像西方社会一般,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西方化”;但是这可能用词不当:因为迄今为止,东亚的经济变化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具有现代化特征的西方的社会和价值变革的程度——也就是世俗主义、核心家庭、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东亚经济衰退使得西方开始认为“亚洲价值或儒家伦理不能解释东亚经济令人吃惊的成功,也不能解释它们令人吃惊的经济失败”,<sup>①</sup>虽然人们坚持认为儒家伦理对于经济的作用不能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表示怀疑,因为那些受东亚经济崩溃影响很小或者最先迅速恢复的国家都是位于儒家文化圈内,而且不是所有国家都随着金融危机而滑入经济深渊的,比如日本,尽管有许多问题,仍然是一个经济大国,有很强的出口能力、较低的失业率,平民似乎并没有受到经济低迷的影响。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东亚模式的怀疑却不可遏制,一种较为典型的观点认为,东亚增长主要是由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

<sup>①</sup> Nathan Glazer, “Two Cheers for Asian Values”,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9, PP. 27 ~ 35.

累,而不是整个生产力因素奇迹般的增长,是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单位产出的增长;这样,随着收益递减,东亚经济不可能维持象1980~1990年代那样的增长率;从这一意义上看,东亚只有一个奇迹,即“资本迅速积累和为了未来的消费而自动自发的牺牲当前的消费”。<sup>①</sup>

因此,对于探讨文化与东亚发展关系的学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仅仅依靠经济理论则无法解决现实的经济开发问题,从而,在探讨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文化问题”;但是,“有必要强调一点,那就是经济开发并非仅仅取决于文化因素。”<sup>②</sup>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人们怎么评价儒家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都不能否定其作用,只不过是作用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 第二节 发展的基本要素 资本、市场和技术

有人将发展研究归结为“单纯经济发展论”,这虽然是有失偏颇,但是确实体现了经济在发展研究中的突出地位。

不过,批评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在发展研究中地位的也大有人在,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在评述发展时就曾表示:“经济进展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组

<sup>①</sup> Graham Bird; Alistair Milne, “Miracle to Meltdown: A Pathology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 Apr 1999, Vol. 20, PP. 421 ~ 438.

<sup>②</sup> (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第13页。



成部分。这是因为发展不纯属经济现象,最终而言,发展必须包括不仅仅人们生活中的物质与财经方面。所以,发展应当看成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包括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的重组与重新定向。除了改善收入与生产以外,发展包括体制结构、社会结构与行政结构以及公众心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包括风俗信仰——的巨大变革。虽然发展通常的定义是指国别范围,但基于广泛的认识,发展的定义也要包括国际经济与社会体系的根本政变。”<sup>①</sup>很显然,迈克尔·托达罗的观点代表了发展研究的前进方向,问题是对于那些仍然处于落后境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对未来的设想,而是需要现实的计划,因此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寻求发展的基本要素就成为它们最迫切的事情了。

那么发展的基本要素到底是什么呢?古典主义者认为,资本积累依然是增长的基本源泉。<sup>②</sup>对此,艾伯特·赫希曼表现了明显异议,“对经济发展问题加以详细研究后,结果令人难以乐观:人们开列了一份长长的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各种因素、条件、障碍及前提的清单。研究的方向也已从完全对客观、有形及定量现象的研究,发展为对主观、无形及不可测度现象的研究。在1914年、甚至1929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当讨论一个国家的发展机会时,自然资源始终占据中心地位。随后,又转面将资本这一由人创造并可数量化的实体,视为发展的首要动因。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不发达国家只要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或通过外援等方式,得到充足的资本,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迷

① 转引自高钰:《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第12页。

② (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第12页。

信资本战略地位的观点,已经面临日益增加的挑战。”<sup>①</sup>在赫希曼看来,那些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条件如公共秩序、法律执行及公共管理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经济发展和创业活动的成功更多的依赖于这种动力的存在。<sup>②</sup>如果赫希曼评论的是那些较为发达的或者已经迈入发展行列的、并且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国家,那么这种评论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可是用来论述第三世界那些还在经济发展门槛外徘徊的国家,则颠倒了主次。要知道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是首先给它创造了完美的公共秩序后才启动经济的发展,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情形恰恰相反,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才能逐步的完善这些间接的发展环境。赫希曼的错误恰恰在于他颠倒了发展的次序。

正因为如此,麦金农才会有过这样的设问:“人们能解释为什么在一些国家经济富裕,或者出现普遍的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却变得贫穷不堪吗?由于各个国家在文化传统、自然资源、受殖民奴役的经历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特殊的差异,人们似乎忽略了纯经济的分析。”<sup>③</sup>在他看来,复杂的表象差异迷惑了人们对第三世界现实的分析,实际上,对第三世界而言,发展最迫切的方面仍然是经济。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言,“为什么有些地区的经济实绩比其他地区好得多呢?说到底,要向贫穷开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证据表明,哪里经济情况良好,那里的贫困情况就减少。”<sup>④</sup>虽然发展的概念不停的变换,人

① (美)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曹征海、潘照东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② (美)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第2页。

③ (美)R. I. 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隽译,上海三联,1997年,第1页。

④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们对发展的期望愈来愈多,但是,“经济增长是使发展成为可能的  
基本手段”,而且“就其(经济增长)本身说来,它是进步的极  
不相称的代表。”<sup>①</sup>

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发展的基本要素依然要在经济领域中寻求。透过各种纷呈复杂的争论表象,我们还是可以归纳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的因素:资本、市场和技术。无论是从生产、贸易还是需求的角度,发展理论本质上追寻的是发展的动力和不发达的原因。在论述经济发展的各种流派、著述中,其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都承认资本、市场和技术是发展的充要条件,而它们的分歧也正是在于如何获得这一充要条件。经济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首要目标,恰如沃勒斯坦所言,“环顾当今世界,不论左派右派如何界定,它们的区分不在于发展经济与否,而在于谁的方针能给此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大的希望。”<sup>②</sup>换言之,发展理论各个流派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目标,而在于达到目标的手段或者途径不同而已。

### 一、资本

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仅是主流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非主流学派揭示不发达的根源。

从马克思开始,资本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灵魂,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发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的。这里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的。因此,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在这种场合,至多是来自作

① 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第34页。

②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黄燕堃译,刊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第1~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为农产品商人的租地农民),也不是来自行会(虽然在这种场合有这种可能性),而是来自商人的和高利贷的财富。可是,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而与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时候,这种财富才找到购买这种自由劳动的条件。而且只有这时候,这种财富才有可能购买这些条件本身。例如,在行会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如果它本身不是行会的、不是行会师傅的货币,就不可能买到织机,用来织布;一个人可以用多少织机来作业等等,是预先规定好的。总之,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还表现为活劳动所支配的领域,以致工具还没有被真正卷入流通。要使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 and 材料等等,这些生活资料 and 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是那些现已丧失自己客观生存条件的人们的财产,现在同样也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了。”<sup>①</sup>简单地讲,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须包含两个基本要素:自由劳动和资本。这就奠定了资本在商品社会中作为生产发展前提的地位。

而另一种劳动条件——一定的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工具等等——是被货币财富在资本的这个准备时期或最初时期发现的现成的东西,它们部分地表现为城市行会制度的结果,部分地表现为家庭工业即作为农业的附属物的工业的结果。这个历史过程不是资本的结果,而是资本的前提。经过这个历史过程,资本家才在土地财产或一般财产同劳动之间作为中间人(历史地)插了进来。……但是要成为整个时代普通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资本的条件就必须不仅在局部范围内,而且在广大的范围

---

① 《经济学手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7~508页。

内发展起来。<sup>①</sup>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资本积累和形成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入侵过程,不过马克思将这一过程视为历史进步的阶段,而在巴兰看来,这一过程却是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根源。

巴兰正是从资本的角度解释了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巴兰通过经济剩余这个概念的辨析,认为不发达国家的根源正是在于大部分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所掠夺,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第三世界国家,“把这些受害国家以前积累的和现时产生的剩余的一大部分掠走,不可能不对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阻碍……(虽然这些国家可能获得某些发展)但这种发展极大地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被扭曲和削弱,以适应西方帝国主义的目的。”<sup>②</sup>

其实,不仅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功能,就是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也是特别重视资本的作用。刘易斯就把资本积累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一再强调启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累速度,因为资本积累的速度通过资本-产出比率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sup>③</sup> 而根据罗斯托的观点,实际上国际关系加速了发展的过程,与不发达毫不相干,罗斯托通过许多更明确的方法不同于早期的发展理论家(他把他的“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替代选择),但是他思想中的关键因素在于资本积累的过程。<sup>④</sup>

资本的重要性在双缺口模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双缺口模

---

① 《经济学手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08-509页。

②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30-231页。

③ 陈广汉:《刘易斯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④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13.

型(Two-gap Model)认为,在工业增长的早期阶段储蓄不足是国内资本形成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旦工业化进展顺利,主要因素可能不再是国内储蓄,而是外汇,因为进口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原材料作为工业投入,外汇是必不可少的。<sup>①</sup>而且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中,人们通常将发展和增长视为同义词,即发展多少是被看作资本形成的同义词。<sup>②</sup>

人们如此极度的强调资本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根本作用,还根源于资本(金融资本)自身的一个属性,即如列宁所说,“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sup>③</sup>一国拥有了资本,就扩大了获利的手段和程度,并且使得利润和生产领域分离。为此列宁进一步指出,“霍布森写道:在1893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额的15%;我们要指出,到1915年,这种资本又增加了大约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要纳税人付出很高代价,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殊少价值,……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sup>④</sup>正是因为资本具有自身增殖的能力,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也正是因为资本孕育着丰厚的利润,才会促使资本家“贪婪地”追逐它,“历史资本主义……它进行资本

①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10页。

②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12.

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1915.08~1916.06)》(第27卷),第323~439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4页。

④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1915.08~1916.06)》(第27卷),第412页。

积累,为的是积累更多的资本,资本家就像踏车上的白鼠,一直在快踏,为的是踏得更快。”<sup>①</sup>

正因为如此,二战后的“增长理论”对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强调甚至到了如此地步,就像布鲁克菲尔德(Brookfield)所指出的那样:“战后时期的经济计划者希望找到一种资本投资的东西,就像一个发展的自动售货机:把钱投进去,按一下按钮便获得(经济)增长。”<sup>②</sup>

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基本作用不仅成为各个学派的共识,而且最终形成了联合国的一份重要文件。1951年联合国一份重要报告——《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认为:“在大多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里,净资本的形成在国内至少是国民收入的10%,实际上有些国家还要高得多。相反,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即使包括外国投资,净资本的形成不足国民收入的5%……如何提高资本的形成率便成为当务之急”。<sup>③</sup>这样,发展的前提就被定性为资本的形成率。

事实上,今天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因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所出现的趋势对于它们而言更加不利,“全球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资本把世界看着是一个单一市场,并且对全球市场有着重要的影响;全球资本增长的反面是民族贫困。”<sup>④</sup>这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更难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本,然而,

---

①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20页。

② P. W. Preston, *New Trends in Developmen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 15.

③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8页。

④ Yosshikazu Sakamoto, “An Alternative to Global Marketization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Civic State,” *Alternativ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 Humane Governance*, Apr-Jun 1999, Vol. 24, PP. 143 ~ 166.

这又是它们必须全力以赴要去做的事,否则在全球的经济结构中,唯一留给它们的位置就是成为“中心”的附庸。

## 二、市场

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法宝。这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中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了。然而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实践中实现这一事实却又是前途茫茫。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工业化的优势和世界市场的广阔,而获得天然的市场空间;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自然经济的瓦解所提供的工业品市场,并不像以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成为发展工业的内部市场,相反却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附属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资源配置方面,而更在于为产品寻求一个出口,以获得下一个经济循环(生产、贸易、消费)的动力。

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不是对外部的依附,而是内部的效率低下。那些依据自己积极首创精神确立了有效的国内经济的不发达国家,才成功地实现了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可是,如果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不向它们的出口商品开放市场,即使作出这些努力,也可能枉然徒劳。<sup>①</sup>不发达国家之所以具有高度依附性,并且继续处于脆弱状态,就因为它们不发达,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过来,它们在强国中间显得很弱,它们是依附别国的,原因盖出于它们不发达。它们的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个开放的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意味着外部需求的扩大,更是使得它们能

<sup>①</sup>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339页。



够成功的进入经济发展的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正因为市场的重要作用,因此世界银行报告对经济衰退开出的方法才会特别强调这一点,“有远见的经济复苏战略所需的条件,一部分只能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实行政策改革,其余部分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工业国的责任。”<sup>①</sup>所谓工业国的责任,主要是要其更加开放市场。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经济发展“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实际上资本和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证自明的,本文在此强调资本和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根本原因是说明这两个因素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东亚在战后初期和其他的第三世界一样为经济发展的资本与市场而苦恼,当时人们不看好东亚发展的前景主要是因为东亚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获得启动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与市场,然而冷战和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凸现了东亚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因而受到美国的“恩赐”,从而较为方便的获得了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市场,较为容易的跨越了发展的桎梏,而不像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为了资本和市场而挣扎,因而东亚的发展也就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有人因此而把东亚这种发展称之为“赠与式”的发展。<sup>②</sup>正因为如此,巴雷斯和卡明斯才认为,“亚洲的经济增长一直依赖于核心国家的贸易、资本和技术。”<sup>③</sup>

### 三、技术

人们经常感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发展中所具有的种种优

① 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出版社,1983年,第3页。

② Dic Lo, “The East Asian Phenomenon: The Consensus, the Diss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sent Crisis”, *Capital & Class*, Spring 1999, PP. 1-23.

③ (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王燕然、王逾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势以及它们能够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于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所作的探讨中,通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技术。人们通常认为生产和贸易更能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是技术变化,国际贸易是润滑油而不是燃料,达到技术变化的途径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者是互相依赖的,国际贸易不能代替技术变化,所以,依赖国际贸易、把它作为主要希望的那些人必然要受到挫折。”<sup>①</sup>而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依赖的前提或称之为典型特征就是技术变革或进步。

与外国直接投资相比,获得国外技术对于经济发展更为重要,例如,日本半导体工业如果没有从美国公司获得技术特许而想得到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同样如此。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因此而认为,后发型工业化的关键是学习和适应发达国家技术与劳动过程的能力。虽然“通过学习获得工业化”是真正的中心,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如果外国公司不愿意通过多种方式转移它们的技术,那么这一“学习的过程”将特别困难而且比现实情况缓慢得多。<sup>②</sup>

因此,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比任何单项因素的作用都大。技术革新使农业、工业和服务行业大踏步前进,“西欧在19世纪中叶消灭了饥荒,东欧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在20世纪70年代也消灭了饥荒。在非洲,根除饥荒的挑战仍然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国家趋向于将工作重点放到业绩较佳的某些方面。”<sup>③</sup>的确,技术对60年代后半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为此,有人测算说,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约有

① (美)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第52页。

②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Inc., 1992, P. 12.

③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13页。

30%来自技术。<sup>①</sup>

发达国家经济的一个优势在于其掌握着较高的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缩短在技术方面的差距。因为技术的进步,不仅能够减少资源的消耗,提高生产的效率,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技术所带来的变革能够缩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因落后而拉下的历史时间距离,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言,“本世纪(指20世纪)的技术革新使各国能够以比以前高得多的效率来使用其资源。不仅是工业国,就连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条件也变得今非昔比了。这种改善的速度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英国从1780年开始,花了60年才使其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1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年内就做到了这一点。”<sup>②</sup>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好似发达国家数十年之前的情景,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够真正在一个共同的层面上生活成为可能,即达到历史的共时性,至少给它们带来了希望。

所以说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么什么叫技术?概括地说:技术是为了商品、服务、信息的生产、分配、利用、消费,而有意识、有目的地加以利用的科学知识,特别是与设备和结构有关的一切知识。<sup>③</sup>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主要由以下五要素构成,可以称作技术的5M:<sup>④</sup>

---

① (日)林武:《技术与社会:日本技术发展的考察》,张健、金海石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②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2页。

③ (日)林武:《技术与社会:日本技术发展的考察》,第78页。

④ (日)林武:《技术与社会:日本技术发展的考察》,第80页。

1、原料及材料(包括各种能源)(Materials);2、工具及机械设备(Machines);3、技术工人及技术人员(Manpower);4、经营(技术管理和管技术技术的总称)(Management);5、对技术及技术产品的需求(Market)。这五个要素无论缺少哪一个,近代技术都不能发挥作用。

技术进步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才能缩短历史因素造成的差距。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生产率的提高呢?答案是技术进步,它又相应地受到历史、文化、教育、机构和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国开放政策的影响。技术是通过物质的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贸易得到传播的。生产率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经济环境的质量有着明确的联系——尤其是从市场扭曲的程度这个意义上讲,更是如此。<sup>①</sup>从总体水平上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都经历了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总量迅速增长的时期。1965~1990年间,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地区的情况正是如此,其“人力资本也迅速增长:1965~1990年间小学总入学率从92%增至102%,中学总入学率从27%增至37%(总入学率中包括年龄超过了通常意义上的就学年龄的学生,因而其结果可能超过相应人口的100%)。”<sup>②</sup>正是由于教育等因素导致了东亚地区技术普及与开发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见成果。

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在技术方面取得进步,除了从国外引进技术,从而减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研发的时间,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重教育的作用。

①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4页。

② 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毛晓威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对于发展理论的回顾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初,发展理论的定位是由两种不同的倾向决定,第一,西方工业社会的经历深深地影响理解全球范围发展的努力;第二,只有在最近才被认识到,世界上不同部分的发展并不是由一系列独立的发展过程组成的,这引起人们更加理解到,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或然性,受国内外条件的支配。<sup>①</sup>为此,学者们为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提出了种种方案。刘易斯在评论近五十年来的发展经济学时说,“对于工业化有三种战略可以利用:1、出口更多的农产品(或矿产,对此将不再讨论);2、发展自足经济,强调国内市场的作用;3、出口工业产品,三种战略都包含着强有力的工业政策和农业政策,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对外交换的条件和收益的不同。”<sup>②</sup>事实上,学者们提出的方案,不管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农业、对外贸易等方面,本质上都是希望藉此使第三世界国家而获得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本、市场、技术,他们之间的差别不是目标,而是达到目标的手段或途径。无论是强调工业还是农业、对外贸易,其本质都是为了获得发展所必须的这三种基本要素。

通过对发展理论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落后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桎梏,才能真正认识到资本、技术和市场援助对于其发展的重要意义。本章对战后发展理论研究所作的回顾与概述,主要目的是寻求发展所必须的基本要素,但是,这些基本要素的提出与获得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归纳,在现实社会中,这些基本要素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无法获得的因素,是它们发展的桎梏,因此,仅仅对战后发展理论作这样的梳理,仅仅找出发展的

①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194.

② 阿瑟·刘易斯:“五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刊载于(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108页。

基本要素,并不能解释战后东亚奇迹般的发展迷津。对本文而言,要构建解释东亚发展的理论框架还缺少一个支撑点,即东亚是如何获得这些基本要素的。本文认为,由于战后冷战的国际背景使得东亚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恩赐”,从而方便的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本文并不否认东亚在发展过程的多因素作用,但是,本文认为根据战后初期东亚的实际状况,东亚原本不可想象能够获得如此的成就。

### 第三章 依附性发展与战后 东亚的整体变迁

战后东亚地区曾被认为是最没有发展前途的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看不到美好的未来,但是,仅仅过了半个世纪,东亚就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最成功的地区,“经济奇迹”等各种赞誉的桂冠也落到东亚的头上。那么东亚为什么能够发展,并且获得如此的成就?为什么大分别的第三世界国家没有能够象东亚一样获得发展呢?在新世纪来临之前东亚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又如何解释呢?这是任何论述东亚发展历史与理论的文章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传统的依附论在解释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时认为依附导致不发达,到卡多索提出依附性发展的概念后,学者们认为依附也可以发展。本文认为东亚的发展就是属于依附性发展,它能够发展,是因为它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但是由于这种发展具有依附性的结构,而不同于自然的发展过程,因而就隐含了结构上的问题。也就是,依附能够发展,但正是因为这种依附性使得发展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东亚由于冷战这一特殊的国际背景而能够依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获得了发展,但是也由于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属性使得东亚经济与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然而,由于东亚的依附在于冷战这一独特的国际环境中产生,因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依附,即不完全是主从式的依附,而是具有互惠的性质。这就使得东亚的依附性发展存在着向自主发展转变

的可能性。

本章首先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在论述依附论演变的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则用历史发展的现实描述东亚战后 50 年来的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从而用事实证明依附性发展在战后东亚所起的作用以及东亚依附性发展能够演化成的自主式发展的可能性。

## 第一节 从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

发展理论最初一般涉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因此,传统的不发达国家往往认为各处都有发展的可能性;资本和技术可以从发达国家下渗到欠发达国家,它相信资本主义的扩散将解决贫困、饥饿、保健等问题。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观点显然不能解决欠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愈来愈大。

左翼知识分子通过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观点而对发展理论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就是韦伯所构想的、帕森斯所系统化的、伯特·霍赛利兹等人所阐述的理想类型观点,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错了,因为他们把理论应用于不发达国家的企图证明完全无效;罗斯托的阶段论之所以受到批评,就是因为它认为不发达是传统社会的原始阶段,而事实上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是 15 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与政治扩张的结果,阶段理论忽视了历史情况,也忽视了不发达国家与今日发达国家的关系;第二种观点的谬误被揭露——那就是扩散论观点所认为的发展可以通过由世界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知识、技能、组织、价值观念、技术和资本推动第三世界的发展;最



后,发展理论的心里观点的弱点也被揭示了。<sup>①</sup> 弗兰克使用他要推翻的那种理论的术语和用词来揭露主流发展理论的弱点,他认为解决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办法在不发达国家自己的手中。弗兰克认为,“如果发达国家不能向不发达国家扩散发展、发展理论或者发展政策,那么这些国家的人民就必须靠自己来发展。这三种方式都是皇帝的新衣,用来遮盖它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这些人不是给皇帝披上一套新衣服,而是要把他拉下马,自己穿戴起来”。<sup>②</sup>

人们对传统的发展理论研究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发展研究,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增长、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也影响了其发展的过程。但是,现存的发展研究及其理论成果大多来自社会科学,而很少察觉到其中不同国家在发展中所体现的根本差别。<sup>③</sup> 有一些学者从第三世界的角度开始思考新的发展思路。不能否认得的是,早在 1866 年,印度的学者 Dadabhoy Naoroji 就详细论述了印度农业和商业资源的渐渐枯竭,被用来促进英国的经济发展,这种解释最初被称为“外流理论”(The Drain Theory)。<sup>④</sup> 而在拉丁美洲,这种从第三世界自己的角度思考发展问题的流派,最有影响的就是依附论。

依附论学派源于两种倾向知识分子的集中,即联合国拉美

---

① (美)R. 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钰、潘世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311 页。

② Andre Gunder Frank,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Catalyst*, III (Summer), 1967, P. 73.

③ A. H. Somjee, *Development Theory: Critiques and Exploration*, 1991, 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P. ix.

④ A. H. Somjee, *Development Theory: Critiques and Exploration*, P. 51.

经济委员会传统和新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依附论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来源。新马克思主义反映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二元主义,一方面是传统的观念,集中于发展的概念和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是离当代世界较近的,关注不发达和第三世界的概念。而拉美经济委员会则关注不发达的讨论。<sup>①</sup>

1950年,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提交了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又被称为“拉美经济委员会宣言”),从而奠定了依附论的理论框架。

普雷维什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他认为,中心国家向边缘地区输出工业品,边缘国家则向中心出口原材料。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仅赞同这种国际分工的合理性,强调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在给第三世界开出的发展“药方”也是遵循这一思路。普雷维什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对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贸易理论进行了驳斥,他认为,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实际上是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普雷维什进一步分析了贸易关系不利于边缘的根源在于中心和边缘对于收入弹性需求的不平衡,他认为,中心地区较低的收入弹性对初级产品需求必然导致边缘出口的缓慢增长……边缘出口部门技术进步的结果,必然是这些部门产量的上升和相应的价格下降,并且(或者)是雇佣的下降。<sup>②</sup>

在普雷维什看来,一方面由于中心地区技术的进步、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以及保护关税的政策,使得中心对于边缘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而边缘对于中心工业品的依赖却在加深;另一方

①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27.

②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40.

面,较高的价格弹性需求,工业品由于技术的进步,不会因为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重大的价格下跌。这些机制意味着,在“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边缘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引起了“出口价格下降和由此而导致的对贸易关系的破坏”,由此,“技术进步的成果就被转移到了中心”。普雷维什对此而提出的对策是以进口替代、国家干预、整体规划和区域整合作为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在他看来,实行进口替代,那么传统的进口商品将逐渐地由国内生产;而实行工业化,则会导致出口部门的工资(及成本)的上升,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出口部门技术进步的结果将不会引起出口商品产量的上升。<sup>①</sup> 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因为边缘地区工业部门劳动生产力较低,这就需要税收或者其他形式的干预保护措施,特别是应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当时拉美经济委员会其他成员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这一观点和巴兰对不发达的认识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讲,各国发展所需要的资本都应该从本国的经济剩余中获得,然而,事实上西欧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利用了本国的经济剩余,而且从第三世界国家中拿走了不属于它的、并且是最大的份额,“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sup>②</sup>,而这一过程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却是苦难的开始。巴兰由此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和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掠夺了第三世界的经济

①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41.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剩余才导致了其发达和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巴兰首先辨析了经济剩余的概念,他将经济剩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经济剩余,就是社会当前实际劳动产品与社会当前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从而与当前节余和积累同义,具体体现在该时期社会财富所增加的各种资产;二是潜在经济剩余,指的是在一定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可认为必需消费品之间的差额,它的实现必须以或多或少对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重大的改组为先决条件,并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sup>①</sup>

在巴兰看来,要回答落后的第三世界地区为什么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这样的问题,关键就要看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剩余的流动过程。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它们的国家贸易、造船业、航海业发展迅速,并且将这种优势与武力相结合展开了对第三世界的掠夺,把第三世界变成西方的殖民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厂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sup>②</sup> 这些被掠夺来的资本对于西欧的发展和对于现在不发达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它们的性质,也就是说这种资源的经济地位……它们毕竟使得西欧自由支配的经济剩余成倍增长,这样,来自外界的资本积累所产

①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107~10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2页。

生的对西欧发展的巨大促进力是不会言过其实的。<sup>①</sup> 西欧从这种掠夺中获得了发展,但是,从被掠夺的国家看,“我们认为已经阐明了这一基本问题:不发达不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依附性资本主义;这不是一些国家变为附庸的问题(安德烈·G. 弗兰克试图证实这一点),而是受依附性国际地位制约的某种内部结构的形成问题。”<sup>②</sup>

正是这种对第三世界经济剩余的掠夺才使得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必要的资本,而这种掠夺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阿尼瓦尔·基哈诺阐述得更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问题受到依附这一事实的根本性影响,依附不是一个参考性外部因素,而是解释我们历史的一个根本性因素。<sup>③</sup> 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剩余主要来自农业部门,积累缓慢,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把这些受害国家以前积累的和现时生产的剩余的一大部分掠走,给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阻碍,从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巴兰认为如果西方文化、科学和技术向不发达国家采用和平的移植就会在各个地方成为经济进步的强有力的促进剂,但是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却是残暴地、破坏性地和掠夺性地打开了落后国家的大门,不可估量地扭曲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巴兰为此以英国科学技术对美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英国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而作了形象的比较

①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229~230页。

②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白凤森、杨衍永、齐海燕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③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297页。

说明。<sup>①</sup>

巴兰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只有通过必要的社会革命才能最终解决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即使资产阶级作家们也偶尔承认,在不发达国家,向一个理性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变是极端迫切的……发达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变不仅将为它的人民开辟一条通向经济、社会和文化空前发展的道路,而且也同时可以使得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能够迅速克服现在的贫穷、停滞状态”。<sup>②</sup> 在巴兰看来,这不仅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有益,而且也可以使得发达国家巨大的生产资源得以合理组织和充分利用。

普雷维什所领导的拉美经济委员会和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拉美不发达的分析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对于依附论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1960年代初拉美社会经济、政治的现实情况也为依附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土壤,一方面,正如普雷维什所宣称的那样,“从1870年到1930年,边缘地区的贸易关系一直在恶化”;另一方面,由于拉美在1950年代早期进口替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资本货物的强力上升,导致了支付危机。<sup>③</sup> 不仅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产生人们的预期后果,收入分配更加恶化,而且频频发生的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动荡。从而产生了一些比较激进的理论,依附论就是其中最有一派。

要论述依附论,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关于依附的概念。伊文思曾经给依附下了一个定义,即“依附通常被简单地界定为

①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252页。

②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343页。

③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43.

一种积累的速度和方向基于外部条件的状态。”<sup>①</sup>因此,人们在使用依附一词来分析发达与不发达的问题时往往集中于外部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政治经济的渗透问题。外部经济与政治的影响触及本地发展时,常常牺牲贫困阶级而加强统治阶级,对此,松凯尔加以解释道,“外国因素被视为制度的内在因素而非外来因素,在不发达国家内具有多方面、有时是隐蔽或微妙的政治、金融、经济、技术和文化影响……因此,就我们所知,‘依附性’的概念把国际上的战后资本主义演化同当地发展进程各有区别的性质的性质联系起来,取得发展手段和发展好处是有选择的;这种进程不是广泛普及,而是往往保证一些特殊集团能够自行加强特权的积累并保证贫困阶级的继续存在。”<sup>②</sup>

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形式上是保持政治独立的,但是,实质上是陷在金融依附和外交依附的网中。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非常微妙,这些依附国家可能发展,那是统治国扩张的反映;而那些处于依附地位国家也有可能不发达,那正是由于它们和资本主义之间从属(或者依附)的后果。桑托斯对此曾有过深刻的论述,“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这样的情况: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它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些经济社会与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有些国家(统治国)只能以此作为扩张的反映时,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这对于它们当前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sup>③</sup>

①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 27.

② Osvaldo Sunkel, “Big Business and Dependencia.” *Foreign Affairs*, 1972, Vol. 50. PP. 517 - 531.

③ 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Vol. 60. PP. 213 - 236.

由于依附理论的种类繁多,因此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而赢得所有学者的同意,虽然如此,根据方法论,一个典型的依附论者的态度应该包括强调外在因素、社会政治分析、地区矛盾、发达与不发达的两极分化以及历史中主观因素的作用,这种态度概括如下:

1、发展最重要的障碍不是缺乏资本或企业技能,而是国际劳动分工,简而言之,不发达经济是外在的结果,而非内在的;2、根据中心与边缘关系分析的国际劳动分工特别重要,因为经济剩余是由后者向前者转移;3、因为边缘被剥夺了它的经济剩余,并且中心利用这一剩余而达到发展的目的,所以在中心的发达就意味着边缘的不发达,这样发达和不发达就被描述成一个单一全球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参与这一过程的地区因此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尽管有着中心和边缘资本主义的区别;4、既然边缘因为连接到中心而注定不发达,那么一国脱离世界市场而努力寻求自力更生就显得必要了,为达到这种可能,或多或少的革命性的政治变革也是必须的,一旦外部障碍被清除,发展被想当然的看作是或多或少的自动的和固有的过程。<sup>①</sup>

对依附的定义并没有解答人们的疑惑,相反,对依附定义的界定使得许多学者越发感到困惑,因此面对依附论中纷呈的各种观点,为了更好的叙述这一理论,许多学者试图将其分门别类,以便更好的理解这一理论。如帕尔马等人将拉美的依附论区分为三个主要流派。一个是起源于拉美经济委员会内部,它重点关注阻碍边缘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障碍尤其是市场约束等问题,主要代表为塞尔索·富尔塔多和奥斯瓦尔多·松凯尔;第二个流派基本上否定了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它的

<sup>①</sup>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76.



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导致“不发达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是边缘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以弗兰克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第三个流派承认资本主义在拉美发展的可能性，它的分析集中在拉美依附的具体形势上，强调边缘地区的发展所具有的隶属形式，主要代表为费尔南多·卡多索和恩佐·法莱图。<sup>①</sup> 而理查德·巴思和迪尔穆斯·詹姆斯则根据内外因素的重要程度将依附理论的流派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保守主义，强调内部改革；二是激进主义，主张外在的依附必须被打破；三是温和主义，强调外在的依附限制了经济、政治的功效。<sup>②</sup> 虽然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依附论进行不同的划分，但是还是可以看出，这两种划分并不矛盾，根本主张基本上可以彼此吻合。

富尔塔多和松凯尔被认为是依附论学派中的保守主义者，不仅因为他们来自拉美经济委员会内部，关键是他们继承了普雷维什向内发展的战略，主张通过内部的改革而获得发展。拉美经济委员会的观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论点，即一方面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社会的结构，在国家利益自主的前提下有可能建立独立的经济基础结构而走向工业化之路；另一方面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和边缘两个部分，在不受约束的竞争下，中心地区往往占有全世界收入增长的大部分而使外围地区受损。无疑，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立场是反帝的，它把拉美不发达国家的原因和国际经济体系联系起来。但是，富尔塔多和松凯尔却不认为只有革命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松凯尔首先在1966年的一次演讲中区分了四种依附机制：1、因保留传统社会结构而出现传统农业的停滞，由于粮食进口越来越多以及出口缓慢

①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123页。

②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70.

而导致贸易失衡;2、出口商品持续高度集中;3、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对外国技术与外国资本日益依赖,包括外国所有权的高比例及工业化的外汇成本越来越高;4、公共部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预算赤字不断增加,因为政府开支过度依赖出口税,但是税收不够维持,因而诱发外债的稳步递增;松凯尔由此而认为,“正是由于不得不求助于获取外国资金,最终形成了依附的形势”。<sup>①</sup> 而要改变这种依附的情形,松凯尔认为进行变革是必要的,他认为现有结构的变革对于自主发展是必须的,不发达并不是自然社会演进的一个必需的阶段,“我们设想发达与不发达是同一普遍进程的两个面……它在地理上表现为两大阶级分化:一方面是世界上工业化的、先进的、发达的、宗主的国家与不发达的、落后的、贫穷的、外围的、依附的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国内根据地域的、落后的、原始的、贫困的依附的集团和活动的两极分化”。<sup>②</sup> 由此可见,松凯尔认为不发达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一个局部,一旦把局部放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进程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结构的变革趋势,所以,松凯尔反对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政策,他希望通过计划和控制来实现结构的变革并最终实现发展。

富尔塔多研究了巴西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平等现象,认为对于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收入集中到特权阶层,只有把市场扩大到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并且促进技术变革,国家才能够为群众服务。因此,富尔塔多和松凯尔把增长和发展做了重要的区分:如果增长伴随着越来越恶化的收入分配,未能增加社会福

①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125页。

② Philip J. O'Brien, "A Critique of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pendency." In Ivar Oxaal, Tony Barnett, and David Booth eds.,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197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 14.

利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仅仅与人口统计学的增长等同,并且是通过减少国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社会控制而获得的,那就不能认为其经济是发展的了。<sup>①</sup>

松凯尔被认为是保守的依附论者还在于他相信国内群众的力量,他相信来自内部群众的力量是变革的根本,他认为群众参与,包括贫困群众的参与至为重要,因此,松凯尔相信在资产阶级和农村与城市贫民中达成政治联盟的可能性(主要指智利),根据这些联盟,能够执行“民族的发展政策”,对此,松凯尔的定义如下:“民族主义的发展是民族肯定的一种力量,是对自决和统治的一种鼓舞,是现代的、普遍的文化与科学的利益和创造的一种愿望,期望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机会和福利,而这一切都是较为工业化国家或多或少享受到的”。<sup>②</sup> 因此,富尔塔多和松凯尔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依附论者研究的重点是国内的改革对于拉美国家发展的作用。

弗兰克对依附的后果十分悲观,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于边缘,将增加边缘对中心的依赖,而边缘对中心依赖的增强意味着边缘不断增加的贫困化过程或不发达,这就预示了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投资将使边缘陷入到资本主义的中心网络;这些投资作为剩余将被转移到中心,加重了边缘的贫困。<sup>③</sup> 而弗兰克之所以被认为是依附论中的激进主义,不仅是因为他对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原因地分析,更在于他开出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弗兰克用巴西等拉美国家的例子证明,拉丁美洲从来就没有封建主义,葡萄牙人入侵而导致拉美经济为出口而生产,已经是资本主

① 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战后发展理论》,第 127 页。

② Osvaldo Sunkel,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External Dependency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69, Vol 1, No. 1, P. 32.

③ Rune Skarstein, *Development Theory*, P. 44.

义了,拉美的低度发展是资本主义在这里“创造”出来的,因而低度发展或者不发达并不是“第三世界”,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结构,将自己从帝国主义的整个体系中解放出来,才可能真正解决不发达问题,弗兰克由此而断言,只有通过武装革命,向着社会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迈进才有前途。<sup>①</sup>

桑托斯批判的接受了弗兰克的有关观点,但是对于弗兰克强调外部剥削第三世界剩余是产生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表示反对,他认为问题是“由国际依附关系决定某种内部结构的形成情形,而不是弗兰克所认为的卫星化问题”。<sup>②</sup> 桑托斯由此而勾画出多种的依附,1、殖民依附,其特点为欧洲人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依附中有贸易垄断,加上殖民地国家的土地、矿山和人力垄断;2、金融与工业依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控制着资本而第三世界生产原材料,在产业结构上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附于发达国家;3、以跨国公司投资为基础的新依附。在桑托斯看来,拉美不发达是内在结构的结果,而这又是依附的国际关系所决定;而且,即使在第三世界存在着资本主义,也和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一样,桑托斯因此而区别了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正常的”和“依附的”资本主义,前者能够获得“自发的增长”,而后者的发展仅仅作为前者的反映。<sup>③</sup> 这样,桑托斯的新依附概念就表明,附属国对统治国的关系,如果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不变,是不能改变的,而且随着附属国遵循深受跨国公司和国际商

①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第256~257页。

② Philip J. O'Brien, "A Critique of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pendency." In Ivar Oxaal, Tony Barnett, and David Booth (eds.),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197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 71.

③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87.

品与资本市场的国际国内结构,依附性结构就加深了,附属国就越发不发达,除此之外,桑托斯认为这种依附性结构还会特别容易影响生产率。<sup>①</sup> 桑托斯提出新依附的术语来解释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北美对拉美的投资产生了工业部门,虽然整个边缘的现代部门溶进了资本主义体系,但是这种发展是部分的,并且因为依附关系而没有自己的动力,所以,从1968年起,桑托斯就开始批评主流的发展理论而代之以依附论。<sup>②</sup>

卡多索和法莱图之所以被认为是温和的依附论者,关键在于他们能够从拉丁美洲的实际情况入手进行分析,而不仅仅以意识形态的观点代替经济现实,在他们的理论中,更多的是理性的因素,而较少感情的成分。与弗兰克和桑托斯不同,卡多索和法莱图承认资本主义在拉美发展的可能性,分析集中在拉美依附的具体形势上。

卡多索和法莱图对于资本主义加深了第三世界不发达的观点表示怀疑,相反,他们认为在依附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相信依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内垄断扩张的一种新的形式,因此,在新依附内可以出现发展。

卡多索在1974年提出的依附性发展(又译为“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Associated - Dependent Development)的概念,就把依附理论从“停滞模型建构”推向对依附性发展的分析,从而将依附论推向另一个发展的高度。<sup>③</sup>

弗兰克认为,“我们强调,这些地区(亚非拉)在世界资本主

① Theotonio Dos Sant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Vol. 60, PP. 213 ~ 236.

②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64.

③ 张教福:《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义进程中的从属性依附地位就是它们不发达的发展的原因所在”。<sup>①</sup> 如果按照弗兰克的理论,就不能解释战后第三世界出现的经济发展现象,特别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而卡多索的依附性发展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依附论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如果我们同意卡多索将发展定义为“资本积累和它对不同生产体系的影响”,那依附性发展意味着边缘地区的资本积累和一定程度上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个特例,表现为国内外资本的结合或者联盟。<sup>②</sup>

伊文思接着卡多索的思路进一步分析了依附性发展的概念,他认为,外国资本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力量,它们的利益通过买办和农业出口商而内在地表现出来。外国资本通过控制私营或国有企业,与本地资本一同分享当地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利益。这并不否认本地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工业结构中的差异,而仅仅是说这种利益冲突如今更加微妙了。对于依附性发展的观点,伊文思提出了四种看法:1、应该尽量避免让人觉得依附性发展是一些与过去决裂的重大变革所导致的;2、国外资本在当地制造业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那时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出口导向的增长”;3、没有来自本地精英维持的体制刺激与压力,国外资本不可能主动地发起工业化;4、最后,依附性发展不是一种与过去的隔绝是因为许多传统的阶级依附仍然存在。<sup>③</sup>

伊文思详细地阐述了他对依附性发展的看法,从而将依附论上升到依附发展理论。在此同时,伊文思还驳斥了一种对依

---

①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钰、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②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P. 31 ~ 32.

③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P. 9 ~ 10.

附性发展概念的误解,即认为国际帝国主义意味着“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终死亡。伊文思认为,“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不仅活着而且还活得不错,其部分成员已经相应地融合进国际资本之中……这种边缘整合进国际资本体系的最终结果,就精英而言,是在当地精英资本、国际资本和国家资本之间创造了一个复杂的联盟,也就是(伊文思称之为)‘三角联盟’”。<sup>①</sup>

在依附性发展概念的提出之前,依附论曾经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因为它确实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第三世界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迅速发展原因。其中以劳克鲁(Laclau)和科林·利斯(Colin Leys)的批评最为典型。劳克鲁早在1970年代就批评弗兰克,他认为拉美并不存在封建主义,或者更简单的说,没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弗兰克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的概念,并且他拒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两个概念。<sup>②</sup>而科林·利斯则比较全面的总结了对依附论的批评,他认为依附论因为如下的理由而应该被超越:1、它是重复的、理论上是停滞的;2、它不能提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3、缺乏现实主义;4、“发展”的含义是模糊的,几乎没有多少积极的发展内容的原创思想;5、有一点并不清楚:是不发达国家还是这些国家的群众遭受剥削?明显的答案自然是“两者”,但是分析的重点有理论上的牵连;6、理论上的一些概念,如“中心”和“边缘”等是粗糙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发展理论(传统-现代等等)过分简化的争论版;7、理论倾向于经济学,而对于社会阶级、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等关注太少;

①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 11.

②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P. 44.

8、对不发达的原因没有能够辨别,除了说这是中心造成的。<sup>①</sup>弗兰克为依附论进行了辩护,他承认在1970年代依附论已经过时,但是他认为依附论过时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的变化而不是因为对它的批评。<sup>②</sup>1972年,弗兰克在拉美社会学大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依附论死了,依附和阶级斗争永存”(Dependence is Dead, Long Live Dependence and the Class Struggle),认为依附本身仍然存在,但是依附论对政治行动的指导作用则来了又走了;1972年在罗马,弗兰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开始被重新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也再次强调没有依附论,只有对资本积累的世界性危机的分析。<sup>③</sup>弗兰克的辩护,也是力图将依附论更加完善,但是他始终无法经受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发展事实的检验,<sup>④</sup>而卡多索所提出的依附性发展的概念恰恰弥补了弗兰克理论的缺陷,而且在现实中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但是,要记住的是,卡多索和伊文思所提出的依附性发展,仍然不是真正的、自主式的发展。彼得·伊文思在讨论巴西的情况时,明确提出了发展的外部限制,“只有在得到更大的帝国主义制度的支持时,依附性的发展才是可行的。依附性发展的全部成功要看跨国公司是否愿意投资以及国际银行家是否愿意扩大信贷。”“像传统依赖一样,依附性发展终将达到它的极限

①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90.

②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184.

③ Andre Gunder Frank,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C. Chew Sing, A. Denmark Robert, Edit.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1996, Sage Publications Inc. PP. 32 ~ 33.

④ Y. So. Aluin,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Publishers, 1990, PP. 164 ~ 165.



……如没有核心国家的盟友,巴西模式就无法生存。”<sup>①</sup>日益增多的政治上的不满,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受排斥部分的不满,成为持续的依附性发展的政治上的限制。

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依附论的一些具体观点与国际现实的发展有了不同,但是,从依附的角度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方法,却被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都深受依附论的影响。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依附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方面是传统的依附面孔,即不发达国家依靠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与市场;另一方面,所有的国家都依附于世界体系(当然,发达国家认为它们也处于依附的地位,但事实上,世界体系的一切规则都是由发达国家操纵和制定的)。尽管依附理论的主题丝毫未变,但有些作者已经对这个理论作了微妙又重要的修正,他们在承认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显著进展的同时,把该理论的重点从解释“不发达”转变为解释“依附性发展”。<sup>②</sup>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附的程度更深,依附的范围也将更广。

因此,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是依附论包括依附性发展理论所没有能够解释清楚并因此而屡次遭到批评的一个概念:“中心”是什么?这既是依附理论者回答模糊也是批评依附论者所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之一。

卡明斯的观点显然比较含糊,“什么是‘世界上层阶级’或核心国家?我用‘霸权’一词特指核心国家的行为。我所指的霸权,……意思是经济、政治、国际安全关系给其他非霸权国家带来严重威胁和侵犯的外部界限的划分。以战后的美国为例,

① (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7页。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321页。

霸权意味着‘重要地区’，在这个重要地区中，各个国家都朝拜华盛顿，而不是莫斯科；每个国家都陷入经济政治实力排列的等级制度中，而这种制度的理论目标是自由贸易、开放制度和自由民主，但这种制度还包括着新重商主义国家和强权政治；美国采用从认真的谈判和平等交换（针对那些与美国共享西方传统，与美国有近似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到战争和干预的手段（针对外圍和第三世界国家），来保证这些国家服从华盛顿。<sup>①</sup>

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回答的是沃勒斯坦。1974年，沃勒斯坦的名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出版，标志着世界体系理论的诞生。虽然沃勒斯坦认为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对当时在各类社会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主要是60年代似乎要支配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sup>②</sup>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体系论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依附论，这不仅因为它所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研究思路类似于依附论，而且它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来源于依附论。依照阿尔文的看法，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依附论的翻新，如半边缘、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就是从依附论那里继承来的；二是法国年鉴学派，注重整体历史的研究。<sup>③</sup> 此处不是要论述世界体系理论产生的过程和其具体的内容，而是通过对世界体系概念的辨析以说明依附论中所不能明了的关于“中心”的含义。

“中心”和“边缘”是依附论的两个核心概念，通常，边缘就

①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48页。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法的第二阶段》，《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12期。

③ Y. So. Alvin,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 171.

是第三世界或者不发达国家的代名词,这是绝大部分学者都能够接受的解释;但是,中心是什么呢?是具体的几个发达国家还是别的什么体系或结构?这是依附理论所一直含糊不清的问题,而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却较为清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在沃勒斯坦看来,中心或世界体系不是指具体的国家而是指一种社会体系,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自己时,又使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而在另一方面保持稳定。”<sup>①</sup>

换而言之,中心是一个变动的过程,而不是停滞不动的具体社会结构。但是,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中心的具体含义是否发生了变化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中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对此,沃勒斯坦的观点是:“我们一直主张,现代世界体系是而且只能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sup>②</sup>这样,依附论所论述的依附的客体就是一个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心不再是指具体的国家,而是这些发达国家所控制的体系。同时,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建立在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基础之上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它是经济的,而不像帝国、城市国家和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政治实体,”因此,沃勒斯坦有时候将世界体系(World-System)称之为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在他看来,“它(指世界体系)是一种世界经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路爱国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0页。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464页。

角色,它受核心剥削,但同时又剥削边缘”。<sup>①</sup>

半边缘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变动表明不发达地区是能够发展的,也就是说,依附性发展不是对依附的否定,而是一种与发展相联系的依附。然而同样要注意的是,依附性发展并不是所有边缘国家都将经历的一个阶段,而只有很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获得这样的发展机会。<sup>②</sup> 这一方面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和四小龙在处于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地位却仍然能够获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获得发展,而其余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地区没有获得发展。

## 第二节 依附性发展与战后 东亚的整体变迁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回顾的那样,几乎所有发展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不发达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对于不发达的根源,各种理论流派的分歧较大;但是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讲,资本、市场和技术是发展的动力或者最基本的因素,却是各种理论都能接受的观点。本文对发展理论研究的回顾和论述依附论演变过程的根本目的都是在于探讨东亚战后能够发展的原因。

① (澳)尼哈莱难:《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依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第174页。

②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P. 32 ~ 3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地区遭到了战争的严重伤害,其发展前景远没有其他第三世界地区那么乐观。到1960年,日本已经在现代化的路上走了近一个世纪,但是每个日本人只有每个美国人收入的1/8,就是这样,日本仍然是当时是亚洲最富裕的地方,而韩国没有苏丹富,中国台湾大致和扎伊尔一样穷,在1960年,要打赌说非洲会在未来的30年内超过亚洲,似乎不完全是疯狂。<sup>①</sup> 战后初期的东亚所要面临的发展问题就是传统发展理论所要解决的难题:如何获得资本、市场和技术?如果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或者奇迹发生的话,东亚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无疑,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是靠野蛮的对外掠夺而搜刮来的,现代发展中国家本来就穷,上哪里去搞到这一笔“原始积累”呢?上哪里去找到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呢?<sup>②</sup> 战后初期的东亚首先就面临着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必然要解决的“原始积累”的问题。

然而,战争的破坏使得东亚在战后看不到经济发展的前途。韩国和台湾的殖民经济原本就脆弱,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陷入了另一场战争的泥沼;对于日本而言,战败后面临的惩罚性战争赔偿更是雪上加霜,以美国代表埃德温·鲍莱为团长的赔偿调查团在1945年12月正式发表了第一个日本赔偿方案(也称“鲍莱赔偿方案”),企图通过拆除日本现有设备的方法限制日本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坚持要把日本经济限制在轻工业的发展阶段,按照这个方案,日本的工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战争器材工业,全部拆除;第二类是重工业,部分作为赔偿物资,

① (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第20页。

② 高粱等:《崛起的奥秘:东亚经济起飞的经验及其给我们的启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予以拆迁；第三类是基本工业，准予保留。法案指定日本国内 1 千多家工厂用来赔偿，予以拆迁。接着，1946 年 1 月 20 日，美军占领当局提出备忘录，把约 400 家军需工厂作为第一批的赔偿设施置于盟军总部的管理之下。1946 年 11 月，经过修改公布的鲍莱赔偿报告更是企图通过拆迁赔偿把日本的生活水平保持到 1930 年的水平。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美国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原因从而改变对日政策，日本就不可能有后来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了。到 1948 年 6 月，美国占领当局发表了美国国务院关于放宽日本赔偿的指令，正式宣布了停止拆迁作为赔偿目的的大工业设备，从此中止了战争赔偿。<sup>①</sup> 日本得以保留的这些工业设备成了其经济起飞的最基本的前提，

那么为什么经济的迅速发展首先发生在东亚而不是其他地方呢？要知道，在 1940 年代，经济学家认为印度和加纳比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做的更好；在 1955 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以及两个著名的合作者威尔伯特·E·穆尔（Wilbert E. Moore）和约瑟夫·J·斯彭格勒（Joseph J. Spengler）出版了一本著作《经济增长：巴西，印度，日本》（*Economic Growth: Brazil, India, Japan*），他们认为在那个时候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处于同等水平的。<sup>②</sup> 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为了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的需要而选择东亚作为冷战的前沿阵地，从而开始扶植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地区，那么东亚地区能否发展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出于政治利益（冷战）的需要而扶植日韩等东亚地

① （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 51 页。

② Nathan Glazer, "Two Cheers for Asian Values",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9, PP. 27 ~ 35.

区,日韩等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够发展也是因为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正是因为美国以经济援助换取政治支持的做法才导致战后 50 年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因此,当人们讴歌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获得巨大成功时,劳伦斯却一口道出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历史动因,“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最初这样做(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因为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sup>①</sup>

以台湾的发展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如果不是美国的援助,台湾经济的发展至少要推迟 20~30 年。另据美国学者 N. 雅各比的推算,美国的援助使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 1 倍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 3 倍。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台湾当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 3.5% (而实际为 7.6%),1964 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实际数的 58%,到 1980 年才能达到 1964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使到 1995 年也难以企望达到。也就是说,美国的援助使台湾 1964 年的生活水准超前了 30 年!<sup>②</sup> 美国的援助同样也对日本和韩国的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爱德华·梅森和他的合作者估计,1953 到 1962 年间,美国对南朝鲜的援助约等于其国内资本形成总额的 80%,美国的援助还占了南朝鲜 5/6 的进口。<sup>③</sup>

① Robert Z. Lawrence, “Blessing or curse?” *Brookings Review*, Summer 1998, Vol. 16, PP. 33~36.

② 转引自赵春明:《从神话到现实:东亚崛起与现代化模式》,武汉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③ 彼得·埃文斯:“东亚的阶级、政府和依赖性:拉美主义者可吸取的教训”,参见(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239页。

### 一、东亚依附性发展的特点

东亚在 1945 年以后的工业发展与出口增长和战后出现的冷战的国际格局有关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推进了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经济,同样,反共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到了美国的支持……作为报答,美国以及很不情愿的西方盟国允许它们进入其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了东亚地区迅速的工业化,或者如一些人称呼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发展”。<sup>①</sup> 因此说,冷战的地缘政治是日韩等东亚地区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为了构建反对共产主义堡垒而对东亚提供援助并进行技术转移,从而导政日本的经济以及台湾、韩国的经济军事的发展;此外,日本的工业得益于朝鲜战争中美国日益增长的钢铁、军事装备和制服的需求;而越南战争也给韩国和台湾的制造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sup>②</sup>

因此,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东亚遭到惨重的打击,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征途中依附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东亚的依附因为其独特的地缘政治背景和冷战的国际环境,从而不同于一般第三世界对“中心”的依附。具体来说,拉丁美洲的依附是一种典型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依附,边缘对于中心的依附和中心对边缘的控制,完全是中心为了工商业利润的目的而进行这种不平等的依附性交换。对于东亚地区而言,这种依附有着特殊性的一面,即这种依附带有明显得庇护特征。换言之,美国对日本进行经济、技术援助,虽然是着眼于直接利益,

<sup>①</sup> Stephen Gill, "The Geopolitics of Asian Crisi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Mar 1999, Vol. 50, PP. 1 - 9.

<sup>②</sup>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 9.



如直接获得贷款利息、特许权使用费、专利费等；并且接受美元和技术的日本企业必须承担购买指定的美国企业制品的义务，以开拓美国商品的销路；但从更深层次上看，这又是美国想把日本垄断资本培育成美国垄断资本的“附属同盟者”战略的一个步骤。因而，美国在促进日本垄断企业积蓄力量的同时，也不断地将其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是由一系列依赖关系构成的。首先是在日美军基地和自卫队受美军支配为基础的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其次是在经济上除资金、技术方面依赖美国外，销售市场要依赖美元圈，原料、能源的供应要依靠美国跨国企业等。<sup>①</sup>正因为如此，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东亚的控制也不同于一般地掠夺，而是出于明显的地缘政治的目的和战后国际战略的需要。除此之外，东亚的依附性发展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地区内部的依附，也就是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对美国的依附外，还对地区内的主导国家日本存在着依附。

因此，东亚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依附就具有独有的特征，这是一种全方位的依附，这样东亚的依附就具有其自身的特征，而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依靠美国提供的资本、市场和技术。战后初期美国通过“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恢复基金”的“复兴援助”等方案帮助日韩等东亚国家（地区）迅速的稳定了局势、恢复了经济，使得它们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为它们的出口提供了完全开放的和自由

---

<sup>①</sup>（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5～96页。

的市场。<sup>①</sup>

自1945年以来,南朝鲜已经接受了美国13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台湾接受了56亿美元援助(南朝鲜人均600美元,台湾人均425美元)。要衡量这种慷慨赠予的实际规模,比较一下统计数字是很有用的。1946年到1978年,美国对南朝鲜的赔款和贷款近60亿美元,而同期非洲得到的共有68.9亿美元,拉丁美洲共148亿;只有17倍于南朝鲜人口的印度,得到的比较多(96亿美元)。1955~1978年(除了朝鲜战争)美国给台湾和南朝鲜的军事赠予为90.5亿美元。全拉丁美洲和全非洲共得到32亿美元,只有伊朗得到的更多,且大多数是1972年以后提供的(数字为100.1亿美元)。1954~1978年,苏联陆陆续续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为76亿,稍微多于美国对南朝鲜的援助;1954~1978年,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援助为134亿美元,比1945年以来台湾、南朝鲜得到的全部援助多25%。1955~1978年,苏联对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军事赠予总额达253亿美元,约为台湾和南朝鲜得到的全部军事赠予的280%。<sup>②</sup>

如果说这些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是其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原因,那么美国为其开放的市场就是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的前提,这种作用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是不过分的。

第二,东亚不仅在经济上依附美国,而且在政治、社会、军事上完全依附于美国。这在战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是绝无

① George J. Viksnins, "The Baltic State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Society*, Jan/Feb 2000, Vol. 37, PP. 42-48.

②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71页。

仅有的。美国对日本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控制日本的经济与政治,在日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和土地改革;而为了对抗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更是直接出兵南朝鲜,朝鲜战争后又对其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控制;台湾被美国认为是对抗社会主义中国的前沿哨兵,国民党政权能够维系统治,就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与支持。

第三,东亚的依附性发展存在着地区内依附的特征。即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依赖于美国所提供的资本、市场等因素,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日本提供的技术、资本与市场等,日本的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亚和东南亚等国家的市场,这样,东亚的依附性发展就有着双重依附的特征。

第四,东亚的依附是一种特殊国际环境中所产生的互惠式的依附。即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相抗衡而凸现了东亚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从而使得东亚在依附于美国的同时,获得了一些较为自主的权利;而东亚对于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的依附,也是出于一种发展的需要所做出的明智选择。因此,东亚这种互惠式的依附完全不同于拉美以及世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的那种主从式的依附。

拉美和东亚依附性发展的差别也体现在美国对东亚的援助上,援助的使命在台湾通过推动土地改革来完成,在韩国通过强制完成;简单地说,这就是沃勒斯坦所称作的“邀请式发展”的世界上最好的范例。如果在这种体系中经济地位上升的原则是“大多数有机会,极少数能成功”,台湾和韩国明显地是被选中而成功的极少数幸运者中的一部分,假如从体系中的更高层次看,日本也是被选中者:不仅得到的

援助总额高,而且美国允许其在50年代实行“同步技术输入”;这使日本落后的工业结构迅速地开始了建立新工业阶段。美国在50年代安宁的岁月中,所推行的霸权主义中还包含迁就的因素——当有人谴责美国卷入韩国和台湾经济太深时,美国的官员容忍了台湾和韩国的进口替代(即共和党政府的典型政策)。因此,三个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在50年代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世界上几个不多的民族得到了经济起飞的酝酿期。<sup>①</sup>

第五,东亚依附于美国既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又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依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主要体现在东亚在工业生产领域内的成功。东亚从1960年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特别是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中占了很大的份额,甚至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也发展的较为出色。但是这种把生产领域发展看作是经济成功的标志,仍然是一种传统的观念,东亚的产业结构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相比处于较低的层次。同时,人们日益认识到亚洲在工厂和固定资产方面的过度投资已经产生了潜在的、更显著的问题。<sup>②</sup> 随着全球从钢铁到纸张生产等所有物品生产能力的过剩,工资被削减,并且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公司的收益越来越差,这更提醒了我们应该反思“世界工厂”的真正涵义。

资本主义世界从本质上讲就是资本循环运作的过程,生产不过是资本增殖过程的一个部分而已。东亚奇迹是战后资本主

①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72页。

② Robert Z. Lawrence, “Blessing or curse?” *Brookings Review*, Summer 1998, Vol. 16, pp. 33-36.

义世界发展特定历史条件的结果,战后工业活动以较大的比例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地区向东亚地区转移,同时,美国也支持东亚利用世界范围工业调整的机会,而工业调整是生产长周期阶段的征兆,美国的支持主要是由于数十年来东亚是冷战的最前线并且服从于美国,但是在1980~19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性阶段逐渐结束而被金融扩张阶段所替代,并且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政策也转变为再三地打击东亚国家以迫使东亚开放市场。<sup>①</sup>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东亚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成功,仍然是依附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东亚奇迹”不过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也就是流动资本追逐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东亚边缘地区的经济已经沦落为世界范围内金融扩张的牺牲品,因此,虽然东亚成为了“世界工厂”,甚至发展了高技术产业,如果在金融领域内未能实现自主化,那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仍然处于依附地位。<sup>②</sup>由此我们认识到,东亚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仍然是属于依附的行列,从这一角度或许更能合理地解释东亚在20世纪末所遭受的金融危机。

对于这一点,阿明也曾经做出评论,他认为,在1800年到1950~1980年间,人们讨论依附的角度是工业化经济和非工业化经济,但是今天,则以新的、不同的标准来分析依附,阿明认为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对西方大国掌握的五种垄断进行分析来加以界定,即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讯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sup>③</sup>如果我们按照阿明的标准来分析东

① Dic Lo, "The East Asian Phenomenon: The Consensus, the Diss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sent Crisis", *Capital & Class*, Spring 1999, PP. 1~23.

② Dic Lo, "The East Asian Phenomenon: The Consensus, the Diss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sent Crisis", *Capital & Class*, Spring 1999, PP. 1~23.

③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钰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文序)第4页。

亚在国际体系的地位,无疑,日韩台仍然属于比较典型的依附性发展。同样,在弗兰克看来,“真正的发展不是一个阶级或一个国家,而是包括经济、社会和技术转变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类的福利得到提高(我们希望,这不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并且润色了它的政治、文化甚至精神方面”。<sup>①</sup>然而我们在东亚却没有发现这种意义上的发展迹象。因此,世界银行亚太地区的副总裁拉塞尔·奇塞恩(Russell Cheethan)认为,东亚经济根本没有奇迹可言,而且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更接近发展的开始,而不是发展过程的终结,对于东亚经济,他认为“奇迹不过是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投资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中的产物;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未来面临的挑战将超过那些已经过去的困难,另外,东亚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相对贫困的国家;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克服四个主要的障碍,即满足基础设施的需要,发展现代市场机制,保护环境,处理好贫困、人力资源的发展以及社会安全。”<sup>②</sup>这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表明东亚经济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揭示了东亚在战后50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依附性特征。应该强调的是,虽然东亚奇迹的称号遭到了批评,但是人们并不应由此而否认东亚在战后取得的经济成就。

虽然卡多索坚持认为,即使是处于依附地位的第三世界,仍然可以发展。但是东亚在战后作为一个落后的地区,其发展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即首先要获取发展的资本。无论是古典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等都突出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汉斯·

① C. Chew Sing, A. Denmark Robert (eds),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Preface) PP. 12 ~ 13.

② Russell Cheeth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Presidents & Prime Ministers*, Jan/Feb 1996, Vol. 5, P. 38.

辛格的“经济发展机制”，更是强调了资本积累和储蓄在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战略作用。<sup>①</sup>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观点也不例外，他对于早期资本主义为了经济发展而筹集资本有过精彩的论述，“剩余价值既是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基金，也是积累基金，只有他没有把剩余价值吃光用尽，也就是说，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他才有历史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所以，马克思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资本积累）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sup>②</sup>同时，就欧洲工业化的历史而言，依靠外来资金也是较为常见的事情，“欧洲国家在工业发展早期的数十年中严重的依赖外国资本。”<sup>③</sup>当时人们对东亚前途地担忧，也正是因为看到东亚受战争蹂躏的经济无法提供发展的资本。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冷战的发生使得美国向“饥饿的”东亚无偿的馈赠了一块“蛋糕”。因此战后东亚经济和社会在不到半个世纪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就像“上帝之手”，给东亚发展以最初的动力，使得东亚在经济发展的最初进程中跳过了资本困扰的噩梦。而不像其他不发达地区那样始终在发展的门槛外徘徊。因此，乔根森在总结战

① Hans Singer,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dian Economic Review*, 1952. Vol. 1, No. 2.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649、652页。

③ W. Lockwood ed., *The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95～97.

后美日经济发展时首先强调的是资本的功能,他在《生产率》(第1卷:战后美国经济增长)中揭示了投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并(在《生产率》第2卷: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将这一观点具体应用到日本战后的发展过程中检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日本和美国经常被描述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但是两国战后的发展经验都表明将资本形成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sup>①</sup>只不过两者的区别在于,日本经济发展最初的资本形成来源于美国的援助。

从这种意义上讲,卡多索的依附性发展的理论在东亚体现的最为明显。而东亚依附性发展的结果就造就了战后近半个世纪的东亚经济奇迹。东亚依附性发展成功的方面,从如下可见一斑。据东京 Nomura 研究所的一名经济学家克万(C. H. Kwan)计算,7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1%涨落会引起日本以外东亚增长率同方向的1%的变化,而在1983年到1992年这段持续10年的衰退之后,美国增长率的1%变化只能引起东亚增长率0.3%的变化;从根本上说,80年代中期,美国吸引了亚洲(包括日本)出口的大约1/3;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出口大致也是1/3;到1992年,亚洲是43%亚洲出口的终点,美国是不到25%亚洲出口的终点。<sup>②</sup>

战后东亚依附性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方面。

① D. W. 乔根森:《生产率》(第2卷: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李京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1~2页。

② (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第99页。



## 二、战后东亚经济领域的变迁

在现代历史中,东亚获得了最为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没有其他任何国家群体曾经经历过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并且显著的降低贫困。<sup>①</sup> 战后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东亚地区的经济变迁首先表现在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方面。

关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奇迹般的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无需再作更多的证明。此处仅作简单的叙述,即在1960~1990年间,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增长率快于世界上其他的地区,它们平均每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东亚是6.3%,东南亚是3.7%,而经合组织是2.8%,这一人均实际收入增长表明东亚经济正在迅速的赶上经合组织的经济。<sup>②</sup> 其中日本的经济增长高峰是1960年代,一度超过了10%,到七八十年代下降为4%~5%;而大多数发展迅速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增长高峰时,也高达10%,随后虽然有所下降,也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增长率。<sup>③</sup> 表3.1是关于韩国和台湾在1960~199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工业发达国家的比较,由此而不难看出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三十年经济发展之迅速,经济成就之斐然。

---

① Todd Avery, "Asian financial crisis demonstrates need for short-term support and long-term change", *Business America*, Jul 1998, Vol. 119, PP. 22 ~ 26.

② Toh Mun Heng, Tiew Chee Siang,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of the ASEAN and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Aug 1999, Vol. 16, PP. 149 ~ 166.

③ Sudipto Mundle,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Some Asian Lessons for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Spring 1999, Vol. 10, PP. 15 ~ 37.

表 3.1: 工业发达国家与韩国、台湾(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1960 - 1994 年)

国家或地区	1960 ~ 1970 年	1970 ~ 1980 年	1980 ~ 1990 年	1990 ~ 1994 年
工业发达国家	5.2	5.3	3.2	1.7
韩国	8.6	9.5	9.4	6.6
台湾	9.3	9.7	9.1	6.8

注: 台湾为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82 年世界发展报告》, 第 112 ~ 113 页; 《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 第 210 ~ 211 页。国家统计局国际信息中心《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 年, 第 27 页。台湾《经济日报》, 1995 年 8 月 14 日。

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东亚发展中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提高。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973 到 1993 年间有了很大的提高。详细情况参考表 3.2:

表 3.2: 日、韩、台与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单位: 美元)①

国家/地区	1973	1975	1980	1985	1987	1990	1992	1993
日本	3470	4940	10440	10950	17270	26100	28750	31490
韩国	430	640	2330	2260	3230	5770	7210	7660
台湾地区	700	964	2344	3298	5888	7954	10202	10566
世界平均	1130	1490	2570	2520	3190	4010	4360	4420

其中, 在 1960 ~ 1995 年间, 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80 美元增至 10128 美元; 新加坡由 428 美元增至 28245 美元; 香港由 310 美元增至 23090 美元; 马来西亚由 278 美元增至 4160 美元; 泰国由 97 美元增至 2772 美元; 菲律宾由 254 美元增至 1035 美

① 资料来源: World Tables, 1995;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0; 转引自郑励志主编: 《快速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经济》,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第 24 页。

元;印度尼西亚由 73 美元增至 1014 美元;而中国台湾则由 159 美元增至 1995 年的 12401 美元。<sup>①</sup>

一般而言,一国或者一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的大小是衡量该国、该地区经济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志。日韩台三地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升的很快,在 1980 年这一比例是 10.75%,到 1993 年就几乎增加一倍,达到 20.19%。详细情况参考表 3.3:

表 3.3: 世界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格)(单位:亿美元)<sup>②</sup>

年份	1973	1975	1980	1985	1990	1993
日本	4140	4998	10593	13433	29321	42141
韩国	137	212	637	943	2537	3308
台湾地区	108	155	414	621	1570	2164
以上合计(A)	4385	5365	11644	14997	33428	47613
世界(B)			108302	123346	210205	235780
三国(地区)所占的份额(A/B)(%)			10.75	12.16	15.90	20.19

## 第二,制造业发展迅猛。

虽然依附论者对现代化理论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在论述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时,依附论仍然借用了现代化的许多概念。其中之一就是以制造业(工业化)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我们知道,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发展——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们是受到美国地缘政治支持的出口平台,但是这种从出口到收入或产量增长的因果链条需要被颠倒,尽管它可能在两种方向上进行;换言之,只有当国内产量发展充分时,

① 世界银行:《1982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114 ~ 115 页;台湾 1960 年的人均 GNP 是根据(美)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年,第 137 页;1995 年的人均 GDP 数字引自(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996 年 10 月 22 日。

② 资料来源:World Tables, 1995;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0; 转引自郑励志主编:《快速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经济》,第 22 页。

出口发展才成为可能——如果当地经济吸收了所有的产品,那么就没有东西留下来出口到外国了,反过来,当地经济的增长依靠一系列的因素,其中货币和金融制度至关重要。<sup>①</sup>因此,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往往首先从生产的角度考察。在这一点上,沃勒斯坦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短期内,那些赞成投机的人占了上风,但是从长期来看,正如我们以前所认为的,生产的剥削利润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占据领先地位的唯一坚实的基础。”<sup>②</sup>

故而,生产领域尤其是制造业的变化便是东亚战后经济的变迁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这也是东亚发展区别于其他区域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1970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发生了一场历史上最快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革命。据设在巴塞爾的国际结算银行(中央银行的银行)的计算,如果把一个单一大陆区域内的贸易流量从世界的数字中去掉,那么现在亚洲供应世界制造业出口的40%以上,而西欧和北美每个区域都只供应25%;在70年代早期,亚洲的这种份额只是25%。这使东亚和东南亚成了一个工业的源泉。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东亚和东南亚1970年制造业产值约为3000亿美元(以1980年美元和1980年实际购买力衡量)。同年,西欧比这个产值多一倍,北美略低于这个产值。世界银行1995年的发展报告也表明了类似的观点,1970~1990年间,以实际价值来计算,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一组东亚国家和地区中的制造业工资增长了170%,而制造

① George J. Viksnins, "The Baltic State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Society*, Jan/Feb 2000, Vol. 37, PP. 42 ~ 48.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吕单、刘海龙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业就业增长了 400%；印度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了 70%，但与此同时，在一组拉丁美洲国家，工业工资仅增长了 12%，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下降了。<sup>①</sup>

到 80 年代中期，亚洲的制造业产量赶上了美国和欧洲，而且过去 10 年比 1970 年到 1985 年间增长得更快。到 90 年代早期，亚洲的制造业产值约为 14000 亿美元，而西欧是略多于 9000 亿美元，北美是略低于 9000 亿美元。亚洲占生产世界制造业产品的 40% 以上，欧洲和美国的比例都不到 1/4，拉丁美洲是 3% 左右。<sup>②</sup>

第三，国际储备的大幅度增加。

亚洲极高的储蓄率——东亚，其储蓄率在经济产值的 30% 以上——已经筑成了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可投资资本库。1994 年终，亚洲最大 10 个外汇持有者的官方储备，已暗示了这笔资本量的一点儿消息。日本、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储备加起来，高达约 4570 亿美元——大于世界总储备的 40%。到 2003 年 10 月底，全世界外汇储备是 3.01 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24%；亚洲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达 1.81 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31%。<sup>③</sup>

仅 80 年代，亚洲（包括日本）占世界产量的份额，以美元计就从 17% 增加到了 22%。制造品出口份额，从 12% 增加到了 17%。如果根据国家实际生产和消费了什么（术语是“购买力平价”）而不是根据有时令人误解的汇率暗示国家作了什么来

① 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第 3 页。

② （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第 96～97 页。

③ 《日本经济新闻》1 月 14 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2004 年 1 月 24 日。

计算世界经济的规模,亚洲的份量就更大了。IMF的一项基于实际购买力的计算表明,亚洲经济产量的份额,1995年是25%,而同年北美和欧洲加起来是46%。<sup>①</sup>

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20年间。流向亚洲(主要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年平均增加12%,而流向拉丁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每年平均只增加3%,流向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则在减少。<sup>②</sup>从80年代末期开始,东亚地区约占每年流向发展中国家(地区)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1990~1994年,流向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的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私人直接投资累计金额由1309.1亿美元增至2817.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1%,这使东亚在流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中所占的比重由70年代的20%升至80年代的31.4%,并在90年代上半期进一步升至44%,<sup>③</sup>从而使东亚成为超过拉丁美洲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因贸易顺差或外资的流入,亚太地区的国际储备进一步增加,其在全世界国际储备总额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从1961年的5%,上升到1994年的35%。1993年,日本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台湾成为第二大地区。(目前已为大陆所取代)

#### 第四,对外贸易的变化。

到90年代初期,东亚和东南亚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已经显得足够大了,其贸易值等于全区域的经济值。而在1992年,贸易

① (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第21页。

②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95~96页。

③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编):《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贸易与国际政策安排》,储祥银等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1~405页。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美国是 16%,日本是 14%,德国是 42%——即使德国的比率,也比亚洲低一半。<sup>①</sup>

东亚地区贸易能够获得迅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开放的市场密切相关,尤其是四小龙,它们从中受到的利益最大。1992 年,美国吸收了“四小龙”25% 的出口产品,成为吸收“四小龙”产品的“巨大容器”。相反,“四小龙”的对日出口则没有那么多。如,1992 年,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对美出口的依赖程度分别为 23.6%、29.1%、23.0% 和 21.1%,但对日出口的依赖程度则分别只为 15.1%、10.9%、5.2% 和 7.6%。这些数字表明,日本对“四小龙”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远低于美国。<sup>②</sup> 到 1990 年代初期,尽管国际竞争已经由意识形态的斗争转向以经济竞争为主,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从出于冷战需要而支持、扶植东亚地区的战略转变为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敲打亚洲”,但亚洲各国的出口总体上仍在增加,1991 年,亚洲出口额(5794 亿美元)就已经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5523 亿美元)。<sup>③</sup>

从出口规模看,1960 年东亚 8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额仅为 5.085 亿美元,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只占 4.3%;而到 1995 年,其出口总额已增至 722.069 亿美元,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占的比重相应提高到 14.4%。在 1995 年的整个世界出口贸易中,工业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为 67.7%;包括东欧和前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所占的比重仅为 32.3%,而其中东亚 8 个发展

① (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第 95 页。

② (新加坡)林华生:《亚洲四级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黄晓勇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年,第 41 页。

③ 宫崎勇:《世界经济图解》,岩波书店 1993 年,第 65 页。

国家和地区就占 14.4%，足见其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迅速提高。<sup>①</sup>

东亚地区这种非凡的出口业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它的出口结构也随着生产结构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60 年，除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以从事转口贸易为主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皆以出口农业和矿业原料为主，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则几乎与它们无缘；然而到 1990 年代，东亚不仅有能力出口多种档次的纺织品、服装、食品、玩具和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也有能力大宗出口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以及电子、电工器材等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下表（表 3.4）反映了韩国和台湾地区从 1960 年到 1993 年出口商品结构的变迁。

表 3.4：韩国和台湾地区出口商品结构(%) (1960~1993 年)<sup>②</sup>

国家或地区	燃料、矿产品和金属		其他初级产品		纺织品和服装		机械和运输设备		其他制成品	
	1960	1993	1960	1993	1960	1993	1960	1993	1960	1993
韩国	30	3	56	4	8	19	0	43	6	32
台湾	2	2	22	5	29	15	17	40	30	38

注：台湾为 1970 年和 1993 年的数据。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电子工业领域的生产和出口的增长更为迅猛。当时，韩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和微波炉出口国之一。它所生产的电视录像机占美国同类商品销售额的 10%，个人用计算机销售额占 4%；<sup>③</sup>该国的半导体存储元件的出口额也居世界首位。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0 年和 1996 年。

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126~127 页；《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190~191 页。

③ (苏联)弗·安德里亚诺夫：《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参考《世界经济译丛》，1989 年第 10 期。



自 60 年代起,亚太地区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1965 年,亚太 10 国(地区)的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 10%,进口额占 9.6%,至 1985 年,出口比重增至 20%。进口亦超过 15%,达 16.8%,1993 年,出口比重超过 1/4,为 25.6%,进口超过 1/5,为 23.3%,出口比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亚太地区打入世界市场,并占有一定地位,尤其是工业制品的输出大幅度增加。<sup>①</sup>这样,到 1980 年,东亚三个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占第三世界出口到 OECD 组织的最终消费品总额的 72%,其他亚洲国家占 19%,只有 7%是来自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其中美国是这些产品的主要市场,占总数的 46%。<sup>②</sup>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 三、战后东亚地区社会人文状况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是帝国主义和宗主国剥削和奴役的对象。那里的农村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农业生产凋敝;城市里仅有的少数原材料初加工业,也无法满足当地居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不仅城市里存在着大量失业者,农村中也有众多的隐蔽和半隐蔽失业人口。人民的住房条件恶劣,生活极度贫困。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各种努力,经济不断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人文指标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数据参见下述两个表格:即东亚发展中地区的主要人文指

① 郑励志主编:《快速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经济》,第 28 页。

② Donald Keesing, Linking up to Distant Markets: South to North Exports of Manufactured Consumer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Vol. 73, PP. 338 ~ 342.

标(表 3.5)和日韩台地区社会发展指数(表 3.6)。

表 3.5: 东亚发展中地区的主要人文指标(韩国、台湾)<sup>①</sup>

项 目 国家 或 地区	预期寿命		下列人员负担的人口				每千个婴 儿死亡率		5 岁以下每 千个儿童 死亡率		安全饮用水 人口比例	
			医生		护理人员							
	1960	1994	1960	1993	1960	1993	1960	1994	1960	1993	1975	1993
韩国	54	71	3540	950	3250	450	78	12	90	12	71	78
台湾	65	75	880	775	3030	385	33	5.7	4	1		84

表 3.6: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社会发展指数(% )<sup>②</sup>

地 区	识字率		报刊订阅数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1970	1985	1970	1985	1965	1985	1965	1985	1965	1985
日本	99	99	520	569	100	102	82	96	13	30
台湾	85	92			98	100	59	80	8	18
韩国	88	96	136	192	101	96	35	94	6	32

正是由于依附于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东亚在战后的 50 年中才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就,世界所看到的最巨大、最快速的经济进步就是从这些灰烬中升起的。英国在 1780 年经济起飞后,使人均收入翻一番用了几乎 60 年,当时它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美国在 1840 年后作出这种成就用了几乎 50 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在 1880 年后的 33 年中翻一番;接着,在 20 世纪饱受战争折磨的前半叶结束后,伟大的东亚奇迹出现了,就人均收入翻一番的实现来说,印度尼西亚是在 1965 年后的 17 年中,韩国是在 1970 年后的 11 年中,中国是在

①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2 年、1991 年、1995 年和 1996 年;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台湾社会指标统计》,1994 年、1996 年。

② (日)市村真一:《日本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46 页。

1978 年后的 10 年中。<sup>①</sup>

东亚的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对第三世界等落后地区的看法,对于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三世界向来被依附论看着是注定不发达,但是在 1970 年代却展现了一幅增长的图景,这鼓舞了不同的资本国际化理论的发展……边缘地区的工业化是源自中心资本输出的结果……依附论不再是不发达的同义词,它更意味着发展,资本的出口不再阻碍边缘的发展,相反,中心“允许”一些(而不是全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但正如依附论文献所表明的那样,中心决定着边缘的积累过程,而且,即使第三世界国家今日被“允许”发展,他们的未来仍然依靠相同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具有“阻碍发展”的特征。<sup>②</sup>这就表明虽然东亚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缘政治背景和冷战的国际形势而获得了特殊的历史机缘,从而得到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并取得了空前的经济成就,但是并不代表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区也能够获得如此的机会或者能够遵循这样的发展道路,而且,东亚的发展远远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即获得自主发展),特别是在金融资本领域,仍然严重的依靠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换而言之,“中心”仍然决定着“边缘”的命运。东亚真正的经验在于能够从依附中求得发展,正像鲁滨逊论述东南亚或者加勒比海地区发展的那样,“东南亚或者加勒比海地区的所见表明,被资本主义剥削地痛苦与根本不被剥削相比算不了什么”。<sup>③</sup>过渡的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不能解决发展的问题,反而会延误发展的机遇。传统的依附论认为边缘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被吮吸到中心发达国

① (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第 364~365 页。

② 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itne,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P. 182.

③ J. Robinson, *Economic Philosophy*, 1962, London: C A Watts and Co. Ltd., P. 45.

家,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达的基本特征,也是其基本原因。在殖民地时期,殖民国家把殖民地的经济剩余转移到霸权中心,这就是殖民依附。对于依附论学者而言,在后殖民时期,这种不平衡的剥削关系继续存在,而且采取的剥削形式不仅是发达国家征收的过高的贷款利率,以及边缘地区初级产品渐渐恶化的贸易条件,而且把投资在边缘地区对工人阶级剥削获得的垄断利润转移到中心。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有着不可克服的力量和阻碍阻止边缘地区工业化。如果他们继续生产初级产品出口,这些依附国家将忍受恶化的贸易条件,因为初级产品出口的收入弹性需求较低,而中心国家出口的工业品有着较高的收入弹性需求。<sup>①</sup> 这些论述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目前仍然存在。不仅如此,一些激进的依附论作者不但寻求揭示依附性资本主义的规律,而且提出,人们不可避免地必须在野蛮状态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正如卡普托(Caputo)和皮扎诺(Pizzaro)所言,“我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发展我们的国家”。<sup>②</sup> 这就是当时人们的观点。但是如果象早期依附论那样过渡的强调国际贸易或者国际分工之间的不平等,从而闭关锁国,那将永远不可能获得发展。因而对于依附论主张打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提出独立自主的发展策略,林丛亚认为,“我很怀疑完全自给自足能够产生发展,特别是对一些较小的国家来说……而事实也表明,实行自给自足的后果是贫困和非常低的生活质量。”<sup>③</sup>接着,林丛亚以日本、亚洲四小龙

①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1991,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 Ltd., P. 105.

② (美)罗纳德·H. 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施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③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 107.

为例,详细论述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批评依附论把特殊的、不成比例的重点放在外国投资及其产生的贸易的消极方面,而忽视国内环境因素、提高政府和官僚机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力等方面的重要性。<sup>①</sup> 如果林丛亚就单纯的理论层而进行推理或者对另外的第三世界地区的发展进行辨析,那么他的观点还可能成立,但是在对于东亚这一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地区而言,林丛亚的观点在解释东亚的经济发展方面就显得不那么充分了。一方面,林丛亚解释了依附与东亚社会整体变迁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林丛亚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回答,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为什么能够成功的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呢? 而为什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成功呢? 问题就在于林丛亚忽视了东亚地区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地缘政治的特殊性。虽然美苏因为意识形态而殊死拼搏,但是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这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sup>②</sup> 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美国为了证明其体制的优越性,故而对它的东亚“盟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以经济退让来换取政治支持。在美国看来,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才能真正的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蔓延。同样的策略也见于日本对东南亚的论述,“促进东南亚的繁荣是与共产主义抗衡的最根本的方法。”<sup>③</sup> 正是由于冷战的需要导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依附性发展获得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的支持,从而轻

①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P. 106 ~ 107.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③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76页。

而易举的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因此,发展理论探讨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地区发展的条件时,并不能也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四五十年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事实,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才使日本等东亚国家或地区被挑选出来,有幸获得欧美抛出的发展“绣球”。

应当看到,虽然依附对于经济发展有着潜在的结构性问题,但是要获得发展必须依靠当今世界现在客观存在的经济体系,要知道,当今世界只有一个体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演说道,“在今天,任何‘封闭’社会的存在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对整个国际合作问题的认识进行激进地修改,而这种国际合作是普遍安全最重要的成分,世界经济正变成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正常地发展,不管该国属于何种社会制度,或它的经济达到何种水平。”<sup>①</sup>戈尔巴乔夫为他的“新思维”改革进行宣传和辩护,其根源就是他也认识到当今世界体系的实际情况。因此,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面前,必须要按照经济自身的客观规律和现实的国际状况行事。

在某种意义上,依附是现代世界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欧洲的瑞士和瑞典、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日本都在各种程度上为了它们高水准的生活成果而依附外部的世界,如果切断国际贸易,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都会逐渐凋谢。即使是美国,切断它的国际贸易也会破坏它的经济结构并且使它的人民对生活失

---

① Andre Gunder Frank,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C. Chew Sing, A. Denmark Robert eds.,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1996, Sage Publications Inc., P. 40.

望。<sup>①</sup> 因此,我们应该改变对于依附的一些传统看法,事实上,卡多索的依附性发展的概念,不仅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分析,而且对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也是一个很好分析工具。虽然,东亚的经验同依附论的讽刺性描述相矛盾,依附论提出停滞和排斥随着国际联系的增加而同比例的恶化,在现象上看,拉丁美洲的情况正是如此,而在东亚却恰恰相反;但是,正如伊文思所希望的那样,如果我们把东亚的经验与历史结构分析方法或依附论方法的卡多索变体相对照,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方法更多地得到了证实,而不是矛盾;拉美学者的研究工作在指明分析东亚成果的道路上具有显见的启发意义;东亚的结果体现出依附论思想令人感兴趣的方向。<sup>②</sup> 经济发展固然起源于有着独特自然地理环境的地区,也就是增长中心最初出现是因为一定的地理优势,如接近矿山、水源、运输便利和战略要地,并且能够得到大量肥沃的土地专门种植农作物。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他资源缺乏的地区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实际上,亚洲四小龙和日本这五个经济体本身都和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相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依附性经济,依靠世界市场和进口输入,包括食品和燃料,但是它们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尽管存在着不利的资源可能削弱成功的因素。<sup>③</sup>

最后,我们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依附我们能够发展吗?”答案在某种程度上依据依附的含义。在林丛亚看来,依附意味着在四个方面依靠发达国家:1、外部贸易;2、

---

①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 108.

② 彼得·埃文斯:“东亚的阶级、政府和依赖性:拉美主义者可吸取的教训”,参见(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253页。

③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 109.

外国投资;3、技术和知识;4、外国贷款和援助;外部贸易可以被分成有形贸易(商品贸易)和无形贸易(比如旅游、航运和国内航空等)。<sup>①</sup>无疑,这几个方面都和世界经济体的关系密切。而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验都揭示了战后该地区发展与依附的关系。本文将在以下的两章中分别论述日本、韩国战后50年的依附性发展经验与教训。

---

<sup>①</sup>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 107.

---



## 第四章 日本:依附性发展的成功者

东亚经济奇迹般的发展经历,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些探讨亚洲经济成功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在对东亚经济发展主要原因的分析上,学术界曾经有过如下种种的观点,如:儒教思想的影响;美国的经济援助(如日本、台湾、韩国);来自外部的威胁(外压);实施了土地改革(如日本、台湾、韩国);汇率改革;拥有素质良好的劳动力供应(如日本和“四小龙”),政府官员的效率性等等。此外,亚洲各国(地区)从工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引进资本、技术、经营诀窍,将竞争力强的工业产品销往以美国为中心的需求大国市场;日本自不待言,“四小龙”也是一样,它们将国(地区)内外的有利的客观条件因素巧妙地结合起来,顺利地将自己的产业结构由进口替代型转向了出口导向型。<sup>①</sup> 这些对于日韩台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分析的层面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历时性,而并不在同一个横截面上,比如,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时刻,首先需求的是资本;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工业品除了能够部分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外,这时经济发展的条件就进一步延伸到对市场的需求,产品开始寻求新的、国际的市场;当经济再进一步发展时,并且试图超越现有的生产水平,则技术、管理、经营等就将

---

<sup>①</sup> (新加坡)林华生:《亚洲四级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3页。

成为那个阶段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条件。

因此在分析战后日本经济与社会变迁时,必须将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等措施放在当时日本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找出日本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轨迹来。有些人把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完全归结为日本政府实施某些经济政策的结果,而忽视了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诸多客观条件和良好机遇,从而对日本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作了片面理解。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以及随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曾经获得了不可多得、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而这一切构成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如同前两章的论述,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筹集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这一点同样适合日本这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日本学者馆龙一郎曾经详细的探讨资本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日本政府为此而采取的种种金融改革措施。在馆龙一郎看来,一方面,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大力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为了筹集实现近代化必要的经费,政府进行了“地租修正”,强行“通过收缴地租积累资本”。但是,仅凭这些仍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本的需求,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多重措施,多方设法筹集资本;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是日本一国所特有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进程较为迟缓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sup>①</sup>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就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先进的技术、机械等,为此,首先面临的

---

<sup>①</sup> (日)馆龙一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金融制度改革》,载于王洛林等著《日本金融考察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39-354页。

问题就是如何获得进口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在二战以前,日本可以通过殖民掠夺而获得经济发展必要的资本,但是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不仅丧失了殖民地及其所提供的资本、原材料产地以及销售市场,本身更因为策动战争而受到惩罚,因此,仅就需要巨额外汇和资金才能引进新技术实现经济发展这一点而言,就成为日本迈出经济发展“第一步”最大的门槛。西蒙·库兹涅茨由此并不看好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潜力,而认为巴西、印度、日本的经济形势是处于同等水平的<sup>①</sup>,其判断的根本依据正是因为日本在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方面并不乐观。今天,我们回顾日本发展的历史,可以找出各种理由说明日本经济起飞的原因,但是在战后初期,没有人对日本的前途报有希望,因为“日本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于一个维持生存的水平,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则在一个较高收入的基础上;西方现代经济增长时,英国的人均收入为 227 美元,澳大利亚为 930 美元(按 1965 年的价格),而日本则是 74 美元,相当于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sup>②</sup>

一位资源专家,爱德华·A·埃克曼博士在战后不久作为占领当局的特别顾问对日本资源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其对资源情况的评价是比较悲观的,这可以从他在 1948 年给盟军统帅部报告的结束语中看出来:“根据对日本资源的一次分析,如果日本人口继续增加到 1 亿或更多的话,今后三十年它似乎会出现下列两种情况中之一:(1)如果外国财政援助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日本的生活水平也许会维持在相当于 1930~1934 年期

① Nathan Glazer, “Two Cheers for Asian Values”,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99, PP. 27~35.

②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3.

间的水平。(2)日本可以依靠‘自给’,但是国内会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灾祸,生活会逐渐接近于勉强糊口的水平。这两种情况比之通过外贸和改善资源利用使日本依靠自给而维持在1930~1934年的水平似乎更有可能。”<sup>①</sup>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自然资源,在盛田昭夫先生的笔下是这样描述的——除了水之外,我们的岛屿几乎没有任何原料,而且可耕地和可居住的面积还不到四分之一。<sup>②</sup>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从资本还是资源的角度,当时的人们对于日本经济的未来都是抱着较为悲观的态度的。

但是由于二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革,冷战的爆发,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使得东亚地区成为冷战的前沿阵地,其特殊的地缘政治作用日益凸现,在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冷战思维中,公理与正义让位于武力与强权,欧美资本主义以经济诱惑换取政治支持的政策导致了东亚地区在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同样,1940~1970年代世界贸易的扩张,给东亚提供了一个决无仅有的机会,因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在此期间持续的长期繁荣为东亚发展提供了一个以前没有、目前也不存在的“机会之窗”,因此,韩国和台湾才能够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sup>③</sup>这其中能够抓住机遇获得发展的国家,最突出的就是日本。正如竹内宏认为的那样,在美苏冷战中,美国因为抱有把日本扶植成位于亚洲的强大伙伴的意图,所

① (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② (日)盛田昭夫:《日本造:盛田昭夫和索尼公司》,伍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44页。

③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 10.

以开始积极援助日本的经济复兴；竹内宏由此而总结日本成功的因素，即：正因为美国陷入了这种不得不把旧敌国日本引为朋友的窘境才使日本幸运地得以实现战后复兴和成长。<sup>①</sup>

本章首先论述了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然后详细的阐述依附性发展与日本经济社会变化的关系，考察日本在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是如何获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揭示了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中明显的依附性特征；然而，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依附性特征，使得其发展呈现出不健康的一面，故而本章最后考察了依附性发展对日本经济与社会变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对日本依附性发展的前景进行探讨。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 政治经济形势

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原本是更多的掠夺殖民地的资本和自然资源，以之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并且在国际上确立日本的大国地位和霸权地位，然而，战争给日本带来更多的是伤痛与毁灭而不是希望。战争的结果粉碎了日本预期的国内外目标，而且给日本自身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日本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主要有如下两个特点。

---

<sup>①</sup> (日)竹内宏：《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吴京英译，中信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 一、战争给日本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社会造成了惨重的打击，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共有 252 万人丧命，包括伤员在内的受害者更是多达 875 万人；盟军的轰炸摧毁了大约 25% 的日本财产，并使大城市的住房严重不足。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的丧失不仅意味着日本无法再获得低价原料，而且几百万海外日本人也不得不返回祖国。<sup>①</sup> 就是说，曾经是日本产业最为有利的原料和产品市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在那里所投下的资本，统统荡然无存；军需市场完全破灭；军事设施以外的民用设施因战争破坏所受损失价值 42000 亿日元（按 1948 年官方价格）；战败后的两年内，从海外撤退到国内以及军事复员人员达 600 万人以上，加上军需公司大量裁员，因此，潜在和正式的失业人口高达 1300 万人。失业人口极多，流浪者遍布城市，“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无家可归和失业的人，他们变得极度虚弱，白天他们游荡于街头，四处寻找别人吃剩下的东西，晚上睡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车站或地下隧道中，仅靠一条单薄的毯子挡寒；即便他们有工作可干，那情形也没什么两样；因为一个临时工干一天挣得的钱超不过 1 日元或 2 日元，而一个小小的米团就花 10 日元，一块小面包要 15 日元”。<sup>②</sup>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得不依靠剥竹笋式的即变卖物品来维持生活。当时片山内阁的经济安定本部综合调整委员会副委员长都留重人，在他所公布的第一本《经济白皮书》中写道：当时日本完全是赤字经济，政府是财政

① （日）吉元国生：《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经济成功之道》，黄钢译，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 年，第 15 页。

② （英）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史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8~9 页。

赤字,民间企业和家庭开支也都是赤字,“构成国家经济的三个重要部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处于赤字状态。”<sup>①</sup>在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失去殖民地不仅意味着不能再通过特权获得自然资源,而且意味着数百万殖民地的日本人不得不回到已经拥挤的国内市场去寻找工作和住房。<sup>②</sup>

战争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了惨重的破坏,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物价上涨很快,但同以后几年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1946年消费品价格指数(以1945年为基期)上升515%,1947年上升1655%,1948年上升到4857%,1949年上升7889%。<sup>③</sup>经济破坏在生产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战争使得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如以1935~1937年的平均指数为100,则1942年为142.7,1943年降为113.5,1944年再降至86.1,1945年锐减到28.5,其中煤炭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78%,钢材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24%,而关乎民众基本生活资料的纤维工业生产,下降到只相当于战前的7%,基本上处于完全崩溃的地步;农业生产则下降到约为战前60%的水平。另外,潜在和正式的失业人口激增,达到1300万人之多,占总人口的18%左右。正是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生产环境的恶化,导致了物资奇缺,需求膨胀,消费品价格急剧上升,如以1934~1936年的物价水平为1的话,那么在1947年、1948年和1949年则分别猛涨至48、128和209。<sup>④</sup>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不仅恶化了人民的生活条件,而且阻碍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失业、通货膨胀、粮食

① (美)彼德·杜鲁克(Drucker, Peter F.):《迈向经济的新纪元:日本成功的代价》,林肇熙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1992年,第1页。

②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 20.

③ (日)吉元国生:《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经济成功之道》,第15页。

④ (日)都留重人:《现代日本经济》,马成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页。

等日用品缺乏就成为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三大特征。

## 二、战后初期的日本政治与社会状况

虽然战争给日本经济领域带来的变化或者称之为灾难较为明显,但是政治与社会领域变化的影响却显得更为深远。这不仅因为日本由一个雄心勃勃的独立主权国家沦落为美国的保护国,而且在于对日本发展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各种改革大都是由美国占领军主导下完成的,尤其是最为有名的三大改革:解散财阀,推行民主化和农地改革,正是这些改革使得日本战后的政治和社会与传统相比有着较大的差异,而带有明显的美国式印记;而且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当1946年元旦时,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声称:“天皇不是神,是和诸位同样的人”,使一般国民大为吃惊,显然,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最能体现日本社会新气象的无疑是民主的观念以及男女平等,这在当时却产生了现在看起来象是笑话的一件事情,那时香烟的配给量,按男性1个月130根,女性1个月30根的标准。这是根据90%的吸烟者为男性这一事实做出的决定。但是有人认为这样违反了新宪法的男女平等原则,向盟军总部要求赔偿损失。<sup>①</sup> 虽然事情似乎很可笑,从中却深刻的折射了日本社会一些与传统不同的方面。解散财阀的改革,充分体现了盟军希望能够在日本实现民主的、平等的社会构想,盟军的一个负责人曾说过:不能让财阀家族过上超出一般难民水平的生活。<sup>②</sup> 这种平等地准则,也是日本社会前所未有的现象。

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传统以来就是日本国民之神的天皇

① (日)竹内宏:《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第110页。

② (日)竹内宏:《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第112页。



被迫“重返人间”的情况,而且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其中,最大的改革就是修正宪法,但是这一过程却是在美国的指示下进行。首先近卫文麿以内大臣御用官名义拟定了宪法修正案,不久,币原内阁亲自任命国务大臣松本丞治考虑宪法的修正,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宪法修正案由占领军民政局亲自拟订,并将该修正案译成日文,作为日本政府的宪法草案。<sup>①</sup> 这样,不仅日本国家的性质被政变,而且其改变的具体过程也在美国的监理下进行,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却要由另外国家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巨变。这种外来因素主导型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的反映出来。虽然,战后日本的经济的发展是成功的,但是,日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展能够象日本的经济一样成功吗?或许目前判断尚言之过早,但是,我们由三岛由纪夫自杀一事就可以推之此种变革影响的深远。郑也夫认为,上个世纪最有才华和最惹争议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其实不仅是为军国主义殉道的,从更深刻的文化意义上他是为日本整个传统文化献身的;三岛由纪夫认为,日本的汽车打入了美国市场,然而日本文明被美国文明征服了,在一个日本传统文化沦丧的世界上,他无法生存。<sup>②</sup> 这就是战后日本政治与社会文化变革所潜伏的危机的一个缩影。

在这样的一个战败国中,对于普通的日本人民而言,战后的现实更多的是苦难的体验。通过当时的首相吉田茂的回忆,我们对此有着感性的认识,“人们没有满意的住房,只好在临时搭

① (日)中村隆英:《日本昭和和经济史》,刘多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② 郑也夫:《理性地批判与选择(读《知识分子与传统》)》,《读书》,1989年第4期,第5~10页。

起的小屋暂避风寒,高层建筑已被轰炸得片瓦无存,站在首相官邸的高岗上可以远望东京湾”,“粮食不足,人们经常出人黑市,或者乘坐拥挤的火车去购买白薯”。<sup>①</sup> 正如有关这一时期调查中叙述的那样:“的确,食物奇缺,许多人实际上在挨饿。在战争刚结束的那些日子里,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倒毙街头是常见的事。1945年11月18日东京主要的日报报道:自战争结束以来,东京已有300人饿死,神户148人,福岗100人,名古屋72人,大阪42人”。<sup>②</sup> 不仅如此,就连报纸也因为纸张缺乏,而都是十六开版的小报,表面登载有关占领政策的多少令人振奋的消息,而在背面则报道粮食不足和社会的混乱现象。<sup>③</sup>

虽然,日本战后的经济与政治情形不容乐观,但事实上,日本却获得了经济奇迹般的发展,在1955年,日本的国民财富总额为20.2970万亿日元,到1970年就增加到160.5450万亿日元,增长了约8倍。<sup>④</sup> 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在依附于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发展,换言之,依附导致了日本的发展。

## 第二节 依附性发展与日本社会的整体变迁

没有人想到过日本人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从战败中恢

①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第40页。

② (英)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第8页。

③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第66页。

④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53页。

复起来。“二次大战的胜利可是来之不易,胜利者都想把日本人限制在拥挤不堪的小岛上,框死在原始的农业生活之中;只是当出现了新的敌人的时候,美国才决定不应该使日本失去机械工业,也不应该解散日本的公司”。<sup>①</sup>正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美苏由二战中的盟国变成了争霸世界的对手,东西两大阵营的对抗,凸现了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美国由此而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由压制转变为扶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援助,使日本成为其冷战最前沿的哨所。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美国日益关注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开始寻求非革命的发展模式并且支持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以之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sup>②</sup>日本则充分地利用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顺势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取得了在依附下的发展,成为在不利条件下取得发展的一个典型,日本的经济成功也为发展理论提供一个新思路。

### 一、美国对日本的援助

日本在1956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有这样的一段话:“回顾一下战败后日本经济的历史,1955年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经济白皮书》在回顾这一年时,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即:‘现在,经济恢复的动力已经用尽,’诚然由于日本的贫穷之故,较之世界其他国家,它很可能潜在着很高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但与战后一段时期相比需求的炽烈程度已明显减弱,已经告别了战后。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靠恢复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后的经济发展必须依

① (美)乔恩·沃洛诺夫:《日本商业帝国》,徐国君、黎德祥、梁学宏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②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 vii.

靠‘现代化’这一手段。”<sup>①</sup>虽然白皮书留下了一句名言:已经告别了战后。但是“经济恢复的动力已经用尽”这一点却更令人感兴趣,它使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日本经济能够恢复战争的破坏而走向新的阶段,所依赖的是什么?经济恢复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根据当时的国际格局,不难推测,美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实际上,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是有一个转化过程的。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从1945年9月2日开始到1952年4月28日结束,共历时六年零八个月,根据美国政府对日基本政策的变化,又可以将这段时期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体现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到总统同意的一篇典型声明中,它说到“日本的困境是其本身行为的直接结果,盟国将不承担重建战争破坏的责任”;第二阶段的特点则为美国决心恢复日本战前作为“亚洲工厂”的地位,并且尽量维持日本经济,以避免社会主义的侵袭。<sup>②</sup>毋庸置疑,国际事件的发展凑巧给日本走向经济复兴铺平了道路。从宣布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以来冷战心理的加剧,再加上194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进军,美国政府明显地决定要把日本作为一个“反共堡垒”。在吉田茂看来,美苏对立日益加深,结果,美国重新研究了它的全球性对外政策,对日政策也转变为通过在经济上加强日本的复兴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方向。<sup>③</sup>结果使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加速了日本经济恢复的进程,而这一后果正如竹内宏所宣称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美苏对立使美国的远东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

① (日)桥本寿朗:《日本经济论:20世纪体系和日本经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② (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第44~45页。

③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第65页。

转弯。<sup>①</sup> 因此,日本经济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盟军占领政策的影响;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美国的占领政策有着一个显著的转变:从不负责任的态度到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这一政策转变的基本原因在于美国对日本在战后亚洲安全的作用持积极态度,并且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的政策对日本越发有利。<sup>②</sup>

因此,战后日本依附性发展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美国的援助是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第一大动力。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但是也正因为其发展依附于美国,从而带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或者称之为日本社会发展的依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

黄光耀曾经撰文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他认为,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扶持是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主要因素。<sup>③</sup> 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既是由于国际战略的需要,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故而,美国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其所需要的资本、技术和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推行其称霸和奴役全世界的“全球战略”,同时,为了与社会主义集团相抗衡,它将日本视为其在亚洲的哨所,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方向,在于培养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使日本在今后对远东可能产生的新集权主义(指共产主义)的威胁发挥防波堤的作用”,日本“在亚洲是关键的战略要地”,是美国侵略“亚洲的紧要堡垒”。<sup>④</sup> 而为了发挥日

① (日)竹内宏:《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第144页。

②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 22.

③ 黄光耀:《略论美国与战后日本的经济崛起》,《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④ 《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控制》,《红旗》,1961年第24期。

本在东亚的作用,就需要首先恢复和发展日本的经济力量。

同时,美国扶植日本的行为也符合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因为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的“第二个大主顾”。1962年9月间,前美国国务卿哈里曼在一次讲话中也曾露骨地说:“在1955年,我们对日本的出口是6亿美元,而去年是17亿美元,几乎增加为3倍。这意味着,由于日本的繁荣,我们也繁荣。”<sup>①</sup>由此可见,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也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考虑的。然而必须予以客观分析的是,虽然美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而给予日本经济援助,其根本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但是在事实上却给日本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战后的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占领和半占领状态之下,它的经济力量由于战时的削弱而极其不足,特别是资金有限,技术落后,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差。这就决定了日本政府和垄断资产阶级在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方面,必须依赖美国的扶植,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经济同友会”的代表干事川田一隆(日本电力公司总经理)在一次谈话中说:“(日本)企业虽然具备庞大的生产力,但是自己的资本比重很低,力量很小,出口虽然达到200亿美元,但在地区上有偏重现象。追随着美国而依靠东南亚市场、也勉强靠越南的特殊军需维持着,这是事实。不仅是企业,可以说,整个日本经济的根底是浅的。”<sup>②</sup>

因此,美国为了达到依赖和控制日本的目的,而从多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扶植。

①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的加深》,《红旗》,1963年第16期。

② 《日本经济新闻》,1971年8月17日,转引自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8页。

首先,保留了日本的军需企业,为战后初期日本资本主义的恢复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波茨坦宣言和盟国远东委员会的有关决议,日本的军需工业本应予以彻底摧毁,工业装备应拆除用作赔偿。按规定应拆除用作赔偿的日本军需企业有 850 个,但是在美国的庇护下,这些企业几乎全部没有拆除。到 1949 年,美国宣布停止日本的一切赔偿,并于 1952 年 4 月间将上述 850 个工厂全部归还给日本政府。这使得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保障。

其次,美国政府通过对日本政府的“援助”和贷款等形式,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必要的原料和资本需求。从 1945 年战争结束后开始,美国政府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的名义,将大量商品(粮食和原材料)给予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把出售这些商品的所得作为一笔财政收入列入日本贸易特别会计中,充当日本输出人的补助基金,这笔基金共达 21.28 亿美元。到 1948 年度,这种做法停止了。从 1949 年度起,将这种基金改为美元对等资金,即按 1949 年 4 月确定的 360 日元等于 1 美元的汇价,将出售美国政府以上述基金名义给予日本政府的物资所得到的日元收入,折合成美元,作为一笔预备金,以备将来一旦需要偿还美国援助时所用。这笔资金算是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一项贷款,款额为 8.6 亿美元。<sup>①</sup>

到 1953 年度,美元对等资金取消了。1954 年和 1955 年,美国政府又根据同日本政府签订的输出剩余农产品的协定和共同安全法,给予日本政府共 2.16 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此外,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和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银行,在 1958 年 6

<sup>①</sup> (日)垄断资本研究会:《现代日本垄断资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第 264 ~ 266 页。

月底前,共向日本提供了 2.5 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贷给日本电力、钢铁、机械等重工业部门。<sup>①</sup>

不仅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援助,就是美国私人资本在战后对日本的输出也不断增加。特别是 60 年代以后,由于美国迫使日本实行资本自由化政策,美国私人资本更是大量涌入日本。据统计,从 1949 ~ 1970 年,在日本的外国资本累计达 139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私人资本。<sup>②</sup>

而这一切都为日本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无法想象的条件,使得日本能够轻易的越过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过程的各种桎梏,从而轻松的开始了经济发展的过程。

其次是军事援助。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援助,一方面体现在美国将日本置于它的核保护伞之下,使得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一个稳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非军事化,特别是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日本得以减轻一定的负担,把它的资金用于设备更新,扩大固定资本的投资,从而加速了经济的发展。根据英国战略研究所编《军事力量平衡 1982 ~ 1983 年》等来综合的各国国防费支出的情况,我们发现,日本防卫费的绝对额相当于西德的三分之一,英国和法国的五分之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远远低于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sup>③</sup>根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964 ~ 1974 年度军费占国民总支出的比重,美国几乎为 6%,欧洲共同体(EC)各

① 《现阶段日本垄断资本经济关系》,《国际问题研究》,1959 年第 7 期。

② 日本总理府统计局:《日本统计年鉴》1970 年;日本通产省:《日本工业统计》1970 年,转引自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第 38 页。

③ (日)市村真一:《日本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第 28 页。



国平均为3.5%左右,而日本则为1.2%~1.5%(军费中包括旧军人的抚恤金、对军属烈属家庭的援助费用),很明显,日本军费占国民总支出的比重比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要低。仅就这一点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运用于其他生产性投资等方面的支出比重相对较高。<sup>①</sup>这样,非生产性的军事防卫支出少这个因素对于日本的高速增长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战后,美国和日本签订了片面的和约与一系列的条约、协定,把日本纳入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体系,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1951年的安全条约第一条规定:“日本给予美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陆、海、空军的权利,美利坚合众国接受此项权利。”由于日本被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不论驻日美军还是日本武装部队,其装备、设施主要靠美国提供(美国给予无偿援助,或者日本只要花一些补偿金、维持费以及为美军提供土地地段、负担地租和建筑物租金等);从1945到1971年,美国向日本至少提供了20亿美元以上的军事援助;根据“日本兵器工业协会”在1960年的调查:“防卫厅的主要武器的98%,是由美国提供”;这样,日本供应本国武装部队需求的军工生产费用就大为减少。<sup>②</sup>节余下来的资金就被更多的用于日本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去了。

国防开支的减少与军费负担的减轻,对日本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日本每次希望通过战争而获得富强的愿望不仅从来就没有实现,战争不仅给日本带来财富的损失和巨额的债务,而且伤亡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在1894~1895年日中战争中,日本死亡了17000名士兵,到1904~1905

<sup>①</sup>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62~63页。

<sup>②</sup>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第49~50页。

年日俄战争,死亡人数上升到 100000,但是,与太平洋战争相比,这些损失是很小的,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共有 230 万士兵和 66 万平民在战争中死亡。<sup>①</sup>除了青壮年劳动力在战争中大量的伤亡外,战争费用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甲午战争 2.33 亿日元,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 0.44 亿日元,日俄战争 18.26 亿日元,出兵山东 0.66 亿日元,“满洲事变”19.05 亿日元,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7558.89 亿日元。<sup>②</sup>这些仅是与战争直接有关的费用,还不包括经常性的军事开支,如果将后者也计算进来,则此类耗费将会变得更加庞大。尽管日本屡次靠战争发了一些“洋财”,但是这笔近乎天文数字的巨额开支,相对于日本的经济水平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这方面得到了彻底的解脱。大力压缩军事费用,减轻了财政负担,这样一来不但日本国民的赋税负担比先进列强减轻了,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财政支出能力(直接或间接地保护扶植费用、投资等等)也相对地增强了。例如,1960 年军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美国为 11.3%、英国为 7.8%、法国为 7.7%、西德为 4.9%、意大利为 4.3%,而日本仅占 1.3%;几十万青年被当做军人从生产第一线上虏走,后来又作为生产人口得到了解放。<sup>③</sup>

战争结束初始阶段,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和半占领状态之下。军事占领完结后,根据日美安全条约,日本又成为了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在军事上依赖美国。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日本的军

①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 125.

② (日)有泽广己主编:《日本的崛起:昭和经济学史》,鲍显铭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6页。

③ (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宋绍英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56页。

费开支绝对额虽在持续增加(从1950年的1293亿日元增加到1971年的6935亿日元),但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44年此项比例曾高达85.6%之巨,1950年则下降到3.33%,1955年和1960年再降到1.54%和1%,此后便在1%的水平之下波动,如1965年为0.97%,1970年为0.80%,1971年为0.85%。国防开支和军事负担的减轻,使日本有可能专心致力于经济上的发展,从而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而与此相反,美国为了承担日本军事保护国的责任,同时也出于与前苏联军事力量相抗衡的需要,不得不将大量资财用于军备扩张,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后来,日本当时担任首相的吉田茂对此作了回顾和解释,他说:“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杜勒斯认为,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日本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因此,作为媾和条件,主张重整军备。但是,我公开反对了这种重整军备论,因为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而且如上所述,当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这时,有非生产性的军备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地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那时,如果过早地重整军备,也许没有所谓令人惊奇的日本经济的发展。”<sup>①</sup>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日本的经济发展与美国的军事援助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正是充分利用了日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才能够实行它的“经济立国”的思想,美国在其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是廉价的能源与原材料。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进行增值出口,因此如何获得廉价的原材料与能源就

---

<sup>①</sup>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第69页。

成为日本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日本的资源消耗急剧增加。据统计,1969年生产每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资源(主要包括石油、铜、铅、锌、镍、铝和粗钢),美国为40.6美元,法国37.5美元,意大利56.0美元,原联邦德国60.1美元,英国58.5美元,日本则高达75.9美元,大大超过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sup>①</sup>日本是个岛国,资源匮乏,只能依靠进口,因此廉价的原材料与能源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性因素。

战后,当日本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而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它充分的享受到国际贸易体系给予它的优惠待遇,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公平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竭力地压低原材料与初级产品的价格,日本能够因此而进口大量的廉价原料,最典型的莫过于石油资源的消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为7.5%,而日本的石油消费增长率则达到20.4%,大大超出其他发达国家的石油增长率(美国为4.2%,法国12.8%,原联邦德国15.3%,意大利15.0%,英国8.5%)。<sup>②</sup>如此,“战后日本能源不足的时代宣告结束了。丰富而廉价的能源供应得到保证,成了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的时代。”<sup>③</sup>70年代后,世界经济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持续近2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阶段退出了历史舞台,并于1974年出现了战后唯一的一次负数增长(比1973年度下降1.4%),这就从反而证明了大量石油资源的廉价输入

① (日)都留重人:《现代日本经济》,第47页。

② (日)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陈小洪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39页。

③ (日)有泽广巳主编:《日本的崛起:昭和和经济史》,第701页。

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从而更加证明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所提供的特殊机遇,这是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想象的。

第四是日本对外贸易的依附性。

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就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因而,其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依附性特征尤为明显。事实上,日本人是靠出口起家的。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出口量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从1950年的10亿美元猛增到1980年的1300亿美元,这个惊人的增长率比世界任何地方的增长率都要高得多,这样一来,日本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1950年仅占3%,到1980年已达8%;在此进程中,日本也不断地吸收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它的贸易伙伴的行列中去,美国就是屈指可数的国家之一,占有日本出口总数的1/4,而亚洲作为一个地区则占了1/3。<sup>①</sup>因此,对外贸易对日本具有超乎寻常的意义。

对于战争刚刚结束后徘徊在饥饿线上的日本人来说,最难得的恐怕就是美国向日本商品敞开了本国的市场。<sup>②</sup>这样,一个开放的市场对日本而言,就是经济的生命线,日本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因素而免费的享受到美国为其提供的这份“厚礼”,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才是日本经济崛起的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这从表4.1中可见美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程度。

① (美)乔恩·沃洛诺夫:《日本商业帝国》,第124页。

② (日)邱永汉:《什么使日本人成为世界首富》,许晏平、李学良等译,金城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表 4.1: 1970 年日本部分出口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①

商品名称	出口总额 (亿美元)	对美国市场 的依赖(%)	商品名称	出口总额 (亿美元)	对美国市场 的依赖(%)
小汽车	9.0	50.7	鞋类	1.3	67.7
无线电收音机	7.0	57.2	大汽车、卡车	3.5	22.1
摩托车	4.1	71.2	针织品	1.3	51.7
磁带录音机	4.8	56.0	钢丝	1.1	53.3
电视机	4.8	69.0	钢材线材	1.0	56.5
薄钢板	8.0	25.0	缝纫机	1.3	42.0
钢管	2.7	56.4	刀具	1.0	54.4
通讯机械	3.2	40.1	照相机	1.6	31.8
玩具	2.1	59.6	三合板	0.8	67.0
外衣类	1.9	65.7	瓷器	0.8	58.5
合金薄钢板	2.1	47.5	毛织品	0.8	57.0
电子计算机	2.2	43.5	体育用品	0.7	65.5

从表 4.1 中可以看出,直到 1970 年代,日本经济已经进入相当发达地步时,仍然严重的依附于美国的市场,平均依存度超过 50%。事实上,不仅对美国,日本对整个发达国家的市场依附性都是十分大的,无论是在其经济开始起飞阶段,还是高速增长时期,发达国家的市场对日本而言都是特别重要的。日本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从 1960 年的 47.4% 到 1980 年的 47.1%,虽然变化不大,但是都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同时进口在此一期间从 57.5% 下降为 35%。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从 50.7% 降为 45.9%,进口从 39.1% 上升为 60.3%。同苏联、中国等目的贸易从出口的 1.8%、进口的 2.8% 分别增加为 7.1% 和 4.7%。日美贸易,从美国进口的是粮食、木材、废铁、煤等一次产品和飞机、电子计算机等超高级机械两大类。对美国的出口,近年来逐渐从各种机械类的中等加工制品向高加工度的相机、汽

① (日)《钻石》周刊 1971 年 8 月 28 日,转引自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第 41 页。

车、计算机、彩电转移。对美贸易收支自 1965 年转为黑字,1971 和 1972 年分别为 25 亿美元和 30 亿美元。自 1977 年以后的黑字每年达 70 亿美元,从而成为两国间的政治问题。<sup>①</sup>

日本对外贸易特别是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的依附性,不仅表现在其对美国市场的依附,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帮助日本成为国际贸易体系的一个平等的成员。日本作为 20 世纪体系核心成员国的预备成员,既是该体系的周边国,又位居东西两大对立势力的前沿,所以定位东亚地区,使日本在加入 20 世纪体系后,获得了既得利益。尤其重要的是有机会加盟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GATT(关贸总协定)。对此,可以这样说:在极力扩大日本贸易规模的各项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曾极力促使日本加入国际社会。……总而言之,由于美国政府的强力支援,日本才终于加入了 GATT。<sup>②</sup>正是由于美国的扶持,日本才能够由一个战败国转而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而且参加了有着无限特权的“上流俱乐部”,在美国主导的这一国际体系中,日本在紧随美国的行列中趁机发展了自己。日本对外贸易的依附,就不仅体现在对美国等市场的直接依附,更在于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地缘重要性和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独特性,依附于美国的同时而获得自身的发展。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也提高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潜能,因为日本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盟友,西方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合作随之而增加;技术转移的障碍被消除,日本更容易得到西方的新技术。<sup>③</sup>最为重要的是,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新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个支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象日本这样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

① (日)市村真一:《日本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第 42~43 页。

② (日)桥本寿朗:《日本经济论:20 世纪体系和日本经济》,第 45~47 页。

③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 24.

上依靠对外贸易的国家,这一新的经济体系对其特别重要。<sup>①</sup>日本就这样轻易的享受到国际体系的种种好处。

所以说,昭和时代的日本经济虽然发生了多种变化,但是,其中只有一点没有变,不仅没变,莫如说其性质越来越强,这就是,日本的经济如果离开贸易就不能成立,因为日本的产业仅仅依靠国产原料是不能生存的,几乎所有资源都必须依靠进口。<sup>②</sup>由此可见日本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严重依附性了。

## 二、依附性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展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简单的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战后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和 1955 年以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两个时期日本经济的变化均与美国的关系密切。认为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依附性发展,不仅是因为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依附于美国,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一方面,正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才使得日本经济获得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严重的依附性特点,这给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这不能否定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增长,日本正是由于依附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才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

依附性发展对日本社会的影响,通过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金森久雄理事长在《如何看日本经济》中的描述就会有深刻地认识,“昭和 20 年(1945),流浪者、流浪儿触目皆是;粮食配给延期、短缺;排着长队买粮、吃杂烩食堂;昭和 30 年(1955)时,电视还是奢侈品,城市家庭普及率也没有达到 5%;昭和 52 年

①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P. 24 ~ 25.

② (日)中村隆英:《日本昭和和经济史》,第 309 ~ 310 页。



(1977)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达98%，立体声组合音响为57%，小汽车55%。”更直截了当地说，发展的成果可以表现在腰包的虚实上；没有经济发展则个人收入不会增加，收入不增加则想要的东西到不了手。<sup>①</sup>

对于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见解，1984年11月《周刊东洋经济》开始了题为“日本经济恢复高速增长可能吗”的大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分析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因素，竹中一雄（国民经济研究协会会长）说：“最主要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当时以美国为中心积累起来的、日本尚未利用的大量知识的存在。”<sup>②</sup>虽然人们视竹中一雄为典型的知识（技术）增长论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早期日本发展的前提是美国的作用，这实际上表明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性。事实上，“美国决定对日占领政策并且归还日本主权的事实规定了战后时期日本经济的国内和国际结构。”<sup>③</sup>

尽管高桥龟吉认为“战后日本经济能够飞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前不得发展的重化学工业战后得以发展到世界第一水平”，但是他承认，“促其成功的首要的根本因素则是外因，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使日本的重化学工业有可能高度发展起来。”<sup>④</sup>这种国际关系变化所引发的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占领政策当初属于一种惩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日本经济的未来束缚在世界第

---

①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东洋奇迹——日本经济奥秘剖析》，王革凡、张来英、葛鸣、王明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②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东洋奇迹——日本经济奥秘剖析》，第108页。

③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 23.

④ （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源》，第19页。

三流国家的水平上(后来由于美苏矛盾激化,美国政策才发生了变化,转而企图扶植日本成为自己阵营的有力国家,才帮助日本恢复和发展经济了);结果是战败造成的灾难性大破坏和实行的占领政策,在很多方面反而变成了促进战后日本重化学工业迅速发展的重大因素。<sup>①</sup>同时,在卡明斯看来,“复兴的日本既是反对苏联的堡垒,又是改造和复兴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正像查尔斯·梅尔指出的,经济膨胀得如此之快,因为被打败的轴心国(日本和联邦德国)成为世界资本积累和增长的中心,而不是政治和军事权利的中心。所以,在日本政治和军事权力丧失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增强。”<sup>②</sup>显然,这就是美国政策的结果,而且达到了美国的预期目的。

正是由于日本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依靠美国提供的资本、技术与市场,战后日本的经济才获得恢复与发展。我们认为日本是依附性发展的成功者,从经济角度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日本战后经济顺利的恢复(1945~1955);另一方面而是指日本从1955年以后,经济迅速而平稳地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增长速度与总量方面。

日本经济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绝望的深渊中上升为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依居世界前列,这一戏剧性的复兴用“凤凰腾飞了”来形容,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只要举一个统计数字就足以说明这一惊人成就:以1950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00,日本1973年已达到1412,而美国为

① (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第20页。

②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65页。

210,西德为411。<sup>①</sup>

在1870年,日本的GNP是英国的25.1%,到1988年已是英国的164.1%;而GNP的年增长率在1870~1965年为2.2%,与瑞典同列为世界先进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在1965~1988年,日本的年增长率更是高达4.3%,成为发达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日本不仅GNP显示出特别高的增长,而且它还从贸易剩余中获得巨大的积累,在1960年,日本的贸易赢余仅仅为2.7亿美元,到1988年就高达949.9亿美元了,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3.2%,这种巨大的支付平衡在日元的汇率兑换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在1950~1970年,美元与日元的汇率大致稳定在1:360,从1971年以后,日元升值,到1988年,汇率为1:128.15。<sup>②</sup>

从1956到1965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特征首先体现在增长速度上面,从1956年开始,以平均为10%的年增长率,到1962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约一倍,制造业的生产净增长近两倍;在这期间,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是:美国14.9%,英国15.7%,法国25.2%;甚至被称为与日本并列为世界经济三大奇迹的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其增长也只分别为41.6%;苏联在这期间的经济增长为67.0%;比较起来,日本的增长水平最高。<sup>③</sup>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73年期间,现在所谓的工业七国(含日本在内)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7%,而日本则高达9.9%。<sup>④</sup>日本在1955~1960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8.9%,在1960~1965年则为10.1%,在1965~

① (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第1页。

②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P. 138~140.

③ (美)彼德·杜鲁克:《迈向经济的新纪元:日本成功的代价》,第38页。

④ 世界银行:《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1970年更是达到12.%。<sup>①</sup>

日本虽然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可是它仅仅用了121年(1868~1989)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它不仅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超过大部分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日本在1964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甚至有人预言在21世纪将会出现日本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Japonica)以取代19世纪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和20世纪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sup>②</sup>

其次,在产业结构上。

依附性发展导致日本经济的变迁,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上,最重要的标志在于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日本利用国际贸易的扩张和美国对其开放市场的契机,从而迅速的调整其产业结构,整个经济结构很快地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化,其中工业化的速度尤其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战前日本的重化工业也曾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二者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前的重化工业是围绕军需生产来发展的,而战后的重化工业则服务于民用消费品生产。对此,都留重人评价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也就是以耐用消费品为象征的消费结构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化的一种反映。”<sup>③</sup>

从1956到1973年,日本这个时期已经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平。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工业、化学工业率(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的出厂量与整个制造业产量

①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编:《日本经济的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页。

②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 138.

③ (日)都留重人:《现代日本经济》,第101-102页。

之比)最高的国家,达 68.9%,而同年其他国家的比率为:美国 57.4%,英国 61%,原联邦德国 62.4%,法国 65.2%,意大利最低,只有 51.7%。<sup>①</sup>

日本产业结构变化的第二个方面表现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曾因疏散、复员等战时的特殊情况而占到全体就业人员半数以上的第一产业就业者,在 1955 年已下降到 41%,其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进一步锐减,到 1980 年仅为 11%。就业者的比率上升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1970 年以后,其中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猛增,到 1980 年已达到 55%。经过高速增长时期的重化学工业化(的年代),日本的经济已进入了石油危机以后的服务经济化的时代。<sup>②</sup>

表 4.2: 1940 ~ 1988 年日本各部门的劳动力雇佣和 GDP 产量比例(%)<sup>③</sup>

年 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劳动力	产量	劳动力	产量	劳动力	产量
1940	46.2	24.0	25.0	36.0	28.8	40.0
1950	52.0	26.0	20.8	32.0	27.2	42.0
1955	38.7		23.3		38.0	
1960	31.2	15.0	27.0	45.0	41.8	40.0
1965	24.1	9.0	31.2	43.0	44.7	48.0
1970	17.8	6.0	34.8	47.0	47.4	47.0
1975	13.0	5.5	34.9	40.6	52.1	53.9
1980	10.6	3.7	34.6	41.9	54.8	54.4
1985	8.9	3.0	34.2	39.7	56.9	57.3
1987		2.0		41.0		57.0
1988	8.0		33.5		58.5	

① (日)《东洋经济》(周刊),1972 年 1 月 15 日,第 55 页。

② (日)安场保吉,(日)猪木武德编:《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史 8)》,连湘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年,第 301 页。

③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P. 141, 144.

与此同时,从各个部门劳动力的雇佣变化和 GDP 产量比率的变化也可以观之其产业结构的变迁。详细情况由表 4.2 可见,劳动力是从第一产业(农业部门)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非农业部门的扩张在 GDP 产量的结构上也得到了体现,虽然在 1950 年,这种趋势出现了战后唯一的逆转,但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工业遭到了破坏的结果,很快日本便从战败的废墟中恢复了经济发展。从 1940 年开始,特别是 1955 年以后,日本的劳动力雇佣和 GDP 产量的比率迅速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倾斜。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劳动力构成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这可以从三个部门的单位劳动力的相对获利能力来加以研讨。如以整个经济的平均获利能力为 1 的话,那么第一产业的获利能力则为 0.41,第二产业为 1.20,第三产业为 1.23。<sup>①</sup> 这样,日本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转移就不仅体现了其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构变迁,也表明日本经济发展具有更高的效益。

结构变迁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在 1868 年,日本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生丝,到 1900 年,主要有三种出口商品:生丝、丝绵(最早在出口 1887 年)和船舶(最早出口在 1900 年)。甚至到了 1950 年,日本工业产品类的出口商品占整个出口商品的比例也不过是 12.2%,但是这一比例从 1950 年以后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到 1975 年以后,主要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已经占总出口商品的 45.2%。战后日本的产业结构,在仅仅二十到三十年的短期内发生了很大转变,由以纤维工业为

<sup>①</sup> (日)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马成三译,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9 页。

中心的轻工业转为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从出口来看,重化学工业品的比重取代轻工业品,迅速扩大,到1972年竟然超过了77%。重工业产品在整个出口商品中的份额从1960年的50%上升到1965年的65%,1970年达76%,1973年达83%。<sup>①</sup>这种在出口方面所看到的重化学工业化率,远远超过在产业结构上的重化学工业化率。这清楚表明增长是偏于出口部门发生的,其中有两个因素对出口的扩大起了作用:第一,重化学工业品与其他商品相比,需求的收入弹性高。第二,由于在重化学工业领域内,存在着技术革新的余地,因此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上升的影响显著。由表4.3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出口商品构成中轻工业和重化学工业品比例的变化。

表 4.3: 1960 ~ 1972 年日本出口商品构成(特殊分类)(%)<sup>②</sup>

分类	1960年	1965年	1969年	1972年
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
食品	6.3	4.1	3.6	2.3
原燃料	2.2	1.5	1.1	0.9
轻工业品	47.0	31.9	25.5	18.8
重化学工业品	44.0	62.0	69.3	77.1
其他	0.4	0.6	0.6	0.9

资料来源:根据大藏省《外国贸易概况》算出。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从197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结构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逐渐地由重化学工业向电气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和高科技领域发展。详细参见表4.4:关于1950~1988年日本的一些主要出口商品变迁情况。

①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1981. P. 58.

② (日)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及其评介》;盛继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31页。

表 4.4: 1950 ~ 1988 年日本的一些主要出口商品①

年份	船舶	机动车辆	钢铁	科学光学器材	磁带录音机	办公设备	占整个出口比例%
1950	3.2	0.3	8.7	-	-	0	12.2
1955	3.9	0.3	12.9	-	-	0	17.1
1960	7.1	1.9	9.6	2.3	0.2	0	21.1
1965	8.8	2.8	15.3	2.6	0.9	0.3	30.7
1970	7.3	6.9	14.7	2.6	2.3	1.7	35.5
1975	10.8	11.1	18.3	2.5	1.1	1.4	45.2
1980	3.6	17.9	11.9	3.5	2.5	1.8	41.2
1985	3.4	19.6	7.7	3.9	4.8	4.4	43.8
1988	1.5	18.4	5.8	4.1	2.9	7.0	39.7

总的来讲,日本的产业结构从战后初期就开始发生变化,在 1950 年代,重点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陶、服装、餐具、纺织品、鞋类、纸张和玩具等;1960 年代,重点转向了重工业,如铝、化工、煤炭、橡胶、造船、钢铁以及消费品工业,如自行车、机动车等;1970 年代产业的中心是电气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如精密仪器、滚球轴承、机床、器具、相机、轿车、电子、医药和半导体等;1980 年代,日本产业发展方向瞄准了高科技领域,如电子、航空、生物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和机器人等。而日本产业结构转变的成功也可以从数量上体现出来,根据其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在 1967 ~ 1974 年间,轿车的出口量从 37 万辆猛增到 240 万辆,电视机从 270 万台上升到 630 万台,磁带录音机从 800 万台递增到 2200 万台。到 1984 年,日本上述的产品已经占据世界市场很大的份额,其中照相机、录像机和电子类产品占据世界市场的份额几乎高达 90% 左右。②

正是由于日本经济一方面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又不断

①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 145.

②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P. 159 ~ 161.



地利用美国提供的机遇而抓住国际经济结构转变的机会,趁机升级了自己的经济结构,日本经济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三、依附性发展与日本的社会变迁

依附性发展不仅导致了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日本的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不仅政治上出现了民主化,而且在社会领域内,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1945年战败的年底,日本社会一片凄凉的景象,美国新闻记者马克·盖因在《日本日记》中写道:“一靠近横滨,日本损失之大就一清二楚;视野所及,一片废墟,衣着褴褛的人们乱七八糟……看不到一座新建筑物;火车车厢和机车头残体横七竖八地散在铁轨上……丧魂落魄似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在路边行使;这里真是一片人造沙漠,到处都是难见景物的荒凉,在尘埃中升起的残垣断壁,依稀可见。”<sup>①</sup>整个社会一片凄惨,绝望的气息弥漫着全岛。但是,由于东西阵营关系的日益紧张,美国在令人难以相信的短短时间内变成了日本的头号盟友,而且也成了日本最大的,当然也是最富裕的市场。<sup>②</sup>日本通过依附于美国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依附性发展带来日本社会变迁首先表现在城市化方面。战后日本的城市化发展较快,根据日本总理府统计局《劳动力调查报告》的统计,高速增长伊始的昭和31年(1956年),农林业就业人数达1437万人,占全产业的34.5%,即日本全部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农林业;但在此以后发生了变化,平均每年有40万人脱离农林业;昭和45年(1970年)农林业就业人数下降

<sup>①</sup> (日)林武:《技术与社会:日本技术发展的考察》,第8-9页。

<sup>②</sup> (美)乔恩·沃洛诺夫:《日本商业帝国》,第6页。

到 842 万人,比重降至 16.5%,是全部就业人数的六分之一;昭和 49 年(1974 年)进一步降到 628 万人和 12.1%,即只占八点三分之一(1/8.3)。<sup>①</sup> 农业人数占一国就业人口比重从百分之三十几急剧降为百分之几,这在西欧各国是逐渐推进的,要经过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过程,但战后日本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在狭小的日本列岛上,发生了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移动。正是因为迅速发生的城市化,导致了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大流动。1955 年曾达到 3900 万人的村镇人口(44%),1980 年减少到 2800 万人(24%),相反,城市人口从 5000 万人(56%)猛增到 8900 万人(76%),任何工业国都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移动。<sup>②</sup>

第二,城乡差距缩小,农村生活水平日益上升。依附性发展带来的经济变迁,使得城乡矛盾逐渐地减少,城乡之间的差距变小。这一点从 1955~1983 年城市家庭收入与农村家庭收入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表 4.5)。

表 4.5: 1955~1983 年日本城市家庭收入与农村家庭收入比较(单位:千日元)<sup>③</sup>

	人口 5 万人以上的城市					农 村				
	家庭人口	实际收入	可处分收入	人 均		家庭人口	实际收入	可处分收入	人 均	
				实际收入	可处分收入				实际收入	可处分收入
1955	4.71	29.2	25.8	6.2	5.5	6.27	29.8	27.2	4.8	4.3
1965	4.11	68.4	62.3	16.6	15.2	5.28	63.4	58.4	12.0	11.1
1975	3.80	236.2	215.6	62.2	56.7	4.56	284.5	252.1	62.4	55.3
1983	3.75	408.3	345.6	108.9	92.2	4.37	426.8	341.8	97.7	78.2

①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 65 页。

② (日)安场保吉,(日)猪木武德编:《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史 8)》,第 301~302 页。

③ (日)中村隆英:《日本昭和经济学》,第 306 页。

城乡之间差距地缩小,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在日本(以及许多国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战前,人们的生活水平逢经济低潮便下降,而且经常呈现悲惨的状况。例如,在30年代初期的农村,“因无钱买米下锅,只得以榆钱、树皮、豆腐渣,甚至拉门上贴的高丽纸裹腹。不得不绝食、少食的儿童增多了,许多农户不得不让女孩子卖身”。虽然这种极端的情况不很多,但是,战前的日本农村确实是很贫困的。1935年前后,驱车在农村跑过的祖父江孝男写道:“印在眼底而不能忘怀的,是那乡村路旁、东倒西歪行将倒塌的、低矮黑暗的草顶小屋。外廊上的拉门,无一不是支离破碎满目伤痕,熏得黑黑的纸条,低垂着,在风中摇曳。”<sup>①</sup>

然而,由于日本战后经济依附性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随着GNP的高速增长,日本的收入水平急剧上升。人均实际收入在1955~1980年间增长了4.2倍。实际工资在此期间增加了2.7倍。1980年的平均工资为月244571日元。而且,收入分配比以前更平等化,社会福利也更充实,所以贫困者的收入显着提高。因贫困而挨饿受冻的儿童已不复有。虽然还有卖淫业,但将孩子卖给妓院的习惯久已断绝,在富豪或中产家庭中做帮佣(女佣人)的妇女也几乎消失。<sup>②</sup>

同时,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稻草屋顶的房屋几乎消失,彩色的镀锌铁皮和盖瓦取而代之,耕作的役畜也被农业机械所取代,农业作业的全过程皆由机械完成了。塑料大棚遍地兴起,工厂和工人住房也随处可见。太平洋沿岸地带曾经显得很协调的农村已不复存在,绵延不断的是杂乱无序的景观。地方之间的

① (日)安场保吉,(日)猪木武德编:《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史8)》,第295页。

② (日)安场保吉,(日)猪木武德编:《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史8)》,第303页。

收入差距也缩小了。以东京为大城市的代表,以岩手县为农村的代表,两者相比,1960年岩手县县民收入为东京的44%,但在那以后,岩手县的地位提高,1975年以前已经达到东京的62%。<sup>①</sup>

第三,文化和教育事业迅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社会的电话、电视和人均拥有的报纸等比例日益上升,半导体收音机和小汽车的普及率以及道路装备率提高的十分明显,这对1960年和1973年日本社会文化指标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详情参见下表(表4.6)

表4.6:日本社会文化指标(1960~1973)(单位:每千人/台或部)<sup>②</sup>

年代	半导体普及率	电视普及率	电话普及率	小汽车普及率	报纸发行份数	道路装备率
1960	133	73	59	5	397	(1962):3.5
1973	656*	229	357	134	519	25.2*

注:\*所指的年代是1972年。

与经济发展相对应,教育的普及也非常迅速。1960年和1975年各类学校的升学率——高中升学率从57.7%上升为91.9%,大学和短期大学升学率从10.3%上升为34.2%(包括在家待考的学生)——出现了飞跃性的提高。日本摇身一变成成为高学历社会。<sup>③</sup>

经济发展所取得巨大成就,使得日本整个民族显得相当地的自豪,日本人已经从对美国人的极度崇拜中恢复了正常,在他们的眼中,美国已经没有那么伟大了,正如一位日本朋友最近说:“这次回到美国,我感到似乎像去看一个阔别多年很稔熟的

① (日)安场保吉,(日)猪木武德编:《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史8)》,第308页。

②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55页。

③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56页。

女朋友一样,只发现她的姿色已衰退了。”<sup>①</sup>而对于日本迅速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上站起来,并上升为世界有名的经济大国,美国经济界的反映是“对日本的发展,在感叹之余,感到越来越大的不安。”<sup>②</sup>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总之,到1974年时,城市彩电普及率达81.3%,小轿车48.5%,电冰箱96.8%,电动洗衣机97.3%,吸尘器82.0%,照相机60.0%,钢琴和空调器普及率尚不太高,也分别达到3.5%和2.3%。<sup>③</sup>经过1956—1973年的高速增长,日本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得到了飞跃的发展。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04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6%,原联邦德国的56%,人均国民收入为194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第34位。13年以后,即到1968年,日本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已相继超过了加拿大、印度、法国、英国和原联邦德国,一跃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而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创下了被世人叹为“奇迹”的巨大实绩。<sup>④</sup>虽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了缓慢增长,但是,之前几十年奇迹般的发展已经彻底的改变了日本的社会,将日本带入了富裕的大众消费时代。这不能不说日本的依附性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① (美)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吴永顺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42页。

② (美)毛·斯坦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2页。

③ 李琮:《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81页。

④ (日)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第1页。

### 第三节 日本依附性发展的评价

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相当显著,在40多年里发展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虽然可用土地较少,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有限,实际上没有专利技术,失业人数较高,而且原有的工业基础大部分毁于战火之中。但事实上日本经济不仅迅速地恢复,而且很快地进入经济世界的最前沿。对此有着各式各样的解释,我们同意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持多因素解释的观点,即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很多因素的结果,比如:高储蓄率;勤劳的、教育良好的劳动力;极好的劳资关系;政府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以及强调节俭的儒家文化传统等等。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良好的国内政治与经济条件并不是当时日本所独有的现象,但却只有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走的最好,因此,核心问题在于外部因素的影响,正是因为冷战、美苏对立和日本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使得日本(东亚)能够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占据特殊的地位,从而免费地享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想象的种种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日本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国将日本作为亚洲战略的据点而欲强化日本经济这点,采取了优先培植重要产业、强化国际竞争能力这些极其强有力的国家政策,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政策,而是日本独有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sup>①</sup>

<sup>①</sup> (日)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从战败到步出“经济大国”》,季爱琴,王建国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页。

因此,我们在重视日本特有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和日本企业特有的各种政策和管理体制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更应该认识到日本经济是由美国的亚洲战略、对日政策及与美国经济的关系所规定的。正如林丛亚所言,日本经济恢复最初的部分原因应该归功于朝鲜战争和美国对日本的援助计划。<sup>①</sup>战后初期,美国通过“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地区经济复兴基金”对日本的援助,稳定了日本的经济,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所引发的“特需”则使得日本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对此,有人评价到“一直到朝鲜战争前,日本没有找到一种动力以避免1947年开始出现的停滞。”<sup>②</sup>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其引发的“特需”就成为日本经济发展所独有的机遇。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对日本商品和服务的需要迅速上升,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时期的第一次繁荣;这一繁荣最终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并且使得许多公司从中获取很大利益。<sup>③</sup>

所谓“特需”就是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的军需用款,而美国向日本支出的巨额军需用款,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直接特需,即美国军事当局直接向日本军需企业进行的军需定货、军需物资的采购以及驻日美军的一般开支;二是间接特需,即日本通过韩国、台湾、菲律宾等地间接向美军供应军用物资;三是对美出口,即日本以官方的名义向美国输出军用品。

朝鲜战争所引发的“特需”对于日本的经济有着特别的作用,一方面,由于特需和出口增加,有1000亿日元至1500亿日元的滞货一扫而空,给处于深刻的道奇萧条下而苦恼的日本经

①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 154.

② (英)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第104页。

③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 22.

济带来了所谓的“朝鲜战争热”，促进了“合理化投资”。<sup>①</sup>另一方面，特需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贸易和生产，这从朝鲜战争前后日本贸易与生产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表4.7)。

表4.7: 朝鲜战争前后的贸易和生产(单位:百万美元)<sup>②</sup>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出口	510	820	13555	1273	1275	1629
特需收入	-	592		824	809	597
进口	905	975	1995	2028	2410	2399
工矿业生产指数	100	123	169	181	221	240

在1950年中期日本经济正处于停滞状态，但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却整个地改变了日本的经济形势，美国因为战争的需要，把日本变成了它最近的军需供应基地，大量补给物资的紧急订单涌向日本生产厂商。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大量采购战略物资用于武器生产，以及美国市民预期生活必需品短缺而囤积居奇地采购，以此为起点，世界市场迅速扩张，从1950~1951年，世界贸易额(金额数量)增加了36%，贸易数量增加了10%，日本的出口急剧增长，滞销商品销售一空。1951年，日本出口额增加65%，工矿业生产增长38%，企业收益率增长2.2倍。仅一年期间，日本商品的出口价格就反弹了43.5%。外汇储备余额从1950年6月末的2.86亿美元，增加到1952年5月末的11.777亿美元，增长了4倍。<sup>③</sup>因道奇计划而陷入困境的日本经济界，由于朝鲜战争一举恢复了生气。日本经济从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昭和25年)就开始了急剧的发展，就好像飞机起飞以后那样，1951年朝鲜战争停战后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① (日)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从战败到步出“经济大国”》,第100页。

② (日)中村隆英:《日本昭和经济学史》,第172页。

③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26页。



而继续上升。<sup>①</sup>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军不仅利用了日本的军事基地,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日本的铁道、公路、港湾、机场、通讯设施等等。日本列岛真正变为美军侵略朝鲜的最前线基地。为了补充和修理军需物资和必要的武器,美军直接对日本企业发出订货(特需),通过承包方式,利用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事实上,日本汽车制造业后来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它从修理大量涌入的各种美国军车的定单中获得了巨大的早期发接力量。到1953年7月28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即朝鲜半岛战争进行到三整年时止,特需采购总额已达9.7亿美元。日本这项特别美元收入一直延续到1955年,那时估计总额已达35.6亿美元。如果我们以1952财政年度作为一个例子,由特需采购而获得的美元收入约占日本国际收支中美元收入总额的62%。<sup>②</sup> 朝鲜战争对于日本经济所起的作用,正如泰德·柯恩评论的那样,“谁都说不出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日本经济会是怎样,但事实上,朝鲜战争减轻了道奇的通货紧缩政策的压力”。<sup>③</sup>

从1952到1956年,美国从日本采购的军火总计达34亿美元,占当时日本商品进口的1/4。<sup>④</sup> 日本在1953年《经济白皮书》的“总论”中称:“日本经济水平是因有特需才上升的,但陷人不依靠特需就无法站立的这种倾斜经济状态,应数特需之罪”,“靠现有外汇可以忍耐一两年,可是过了这期间,我们将采

①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第77页。

② (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第66页。

③ (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第67页。

④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71页。

取怎样的措施呢?”强调要建成以扩大出口为最优先的“自立经济”。<sup>①</sup>可见,朝鲜战争引发的特需对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

如果说朝鲜战争使得日本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1951年一年期间工矿业生产竟然膨胀了36.8%,以战前为基准计算的生产指数从1950年的83.6,增长到1951年的114.4,终于超过了战前水平。<sup>②</sup>那么,越南战争则与日本走向“经济大国”的关系密切,因为日本走向“经济大国”,与美国介入越南事务以致强行发动越南战争有很深的关系,如果除去与越南战争的关系,是绝对无法把握的。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出口规模的约13亿美元中,特需约占8亿美元。特需收入是外汇收入的36.8%(1952年)~38.2%(1953年),特需弥补了贸易收支的赤字,并使生产规模的扩大在贸易收支赤字的情况下变成可能,事实上,如果没有特需所带来的外汇收入,日本经济就会陷入资本贫乏的境地;与朝鲜战争相比,越南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与转型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在越南战争时,日本经济的规模已扩大到无法与前者相比的程度,日本的出口规模在1967年以后超过了100亿美元,贸易收支黑字也大幅度增加;但是从给日本经济的直接影响这点来看,越南战争的重要性没有朝鲜战争大。<sup>③</sup>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再现和“经济大国”化与美国在亚洲强行推行的长时期的越南战争密不可分,换言之,这是美国又一次给日本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机遇。

虽然日本并没有直接参与越南战争,但重要的是,日本在越南战争中全而性地、追随性地协助了美国,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大型设备投资后的生产能力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化。对美国

① (日)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从战败到步出“经济大国”》,第110页。

②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27页。

③ (日)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从战败到步出“经济大国”》,第233页。

投放了巨额美元的“越南周围地区”迅速增加出口,出现了大幅度出超,收进了相当多的美元。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也迅速增加,对美贸易在战败以来的连续赤字后出现了黑字,且黑字额迅速增加。<sup>①</sup>可以说,越南战争所引发的日本经济扩张真正的奠定了日本此后经济大国的地位。

因此,因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国际贸易虽然带来了世界经济的扩张,但是,就日本而言,对日本经济更为重要的是特需。<sup>②</sup>美国将其战争所需要物资的订单交给了日本而不是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这固然有经济成本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因素。虽然因此而有助于日本的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到这一发展的本质,即依附性。

通过对特需的描述,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机遇和偶然性的特征,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经济的依附性特征。因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爆发,本质上讲都是美国实施其争霸全球的国际战略的具体步骤,而日本刚好是其在亚太地区实现国际战略目标的首要据点;美国国际战略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冷战的发生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才改变了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由压制转为扶植,同时,因为日本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与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相切合,从而使得日本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具有其独有的特性。从这一点去理解特需与日美关系对日本经济的作用,就更能揭示日本依附性发展的本质,即依附于美国。然而,“特需”所体现出来的依附性特征毕竟不是短期的战争景气所能够完全呈现出来的,整个日本战后发展过程在结构上所蕴含的依附性特征则

① (日)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从战败到步出“经济大国”》,第235页。

② (日)竹内宏:《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第148页。

贯串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

所以说,虽然日本战后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与我们常说的独立自主式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日本的依附性发展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它的发展,虽然处于依附地位,但是它能够发展,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它的依附,虽然它发展了,可是这种依附的结构也孕育了很大的危机。上文较多地论述了其发展的一面,这里我们将分析其依附性的方面,即:虽然日本经济、社会发展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但是,日本仍然没有能够根本的改变其依附性发展的结构问题。

之所以认为成绩斐然的日本仍然是一种依附性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体制中是处于依附性地位的,即它依附于所面临的外部世界,换言之,日本在外部的国际环境中,处于依附性的地位,主要是对美国的依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体制,是由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的体制,它与战前不同,是把发展中国家也作为主体成员而容纳在内的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上复杂化了的各各种倾向,归根结底并非对第三世界不利……。事实上,30年间的南北关系从君主对臣民的关系的阶段过渡到了交易与谈判的时代。”但在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更加高度化(福特体制),以跨国企业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的经济结合加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渗透的力量格外加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以政治上附属为基础的经济从属转换到以经济

力量本身为基础的经济从属。<sup>①</sup>

日本战后出口导向型的新重商主义工业化政策能够成功,必须从世界经济扩张的背景角度考虑,特别是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所出现的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sup>②</sup>日本因为特殊的机遇而被美国吸纳成为世界经济体制的“高级成员”,从而不费力气地享有美国竭力所维持这一世界体系的种种好处。即便如此,美国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日本,美国通过控制着日本的粮食、石油和防务保护,一直轻轻地扼着日本的喉咙;如果用力掐紧,结果将是毁灭性的。<sup>③</sup>

正因为日本在这三个方面严重的依附于美国,或者说依附美国公司,即使到今天,分析家们也无法断定,日本究竟是个超级大国,还是带有附属国的色彩。当埃兹拉·沃格尔开始在哈佛举办关于日本的讲习班时,他说,“我一想到日本力量上升的后果,就感到非常棘手”;塞缪尔·亨廷顿回答说,日本有“非常致命的弱点——能源、粮食和军事安全”;他认为“日本是个具有特别严重弱点的国家”;战后东北亚局势之谜在于两种回答全都有理。<sup>④</sup>关键在于日本能否摆脱这种依附性发展的趋势。

在这样的世界经济体制中,虽然发展中国家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它们处于金字塔的最低

① (日)中村哲:“东亚资本主义理论·序说”,参见(日)中村哲等著:《论东亚经济的现代化》第1~46页,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8~19页。

②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P. 161~163.

③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66页。

④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66~67页。

层;而日本(东亚)因其特殊的地缘战略等的原因而被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归拢在最上层,因而能够趁势发展。其典型便是战后早期的日本和后期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地区(NIEs)。它们利用发达国家移植的工业(包括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和与外资合营的企业),生产产品再出口到发达国家,这在19世纪式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日本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这是日本依附性发展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也使得日本的各项政治策略深受美国的影响。

在日本,美国是唯一的控制国,因此事情表现得最为明显……太平洋军队的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从美国政府接到的直截了当的指示是:“你对恢复日本经济或加强日本经济不要承担任何责任,你将让日本人民明白,你对维持日本人的任何特殊的生活水平不承担责任”。<sup>①</sup> 这表明,从一开始,美国就被定格为日本的“主人”。这样,美国就按照自己的意图在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实现其全球战略的意图。当然,这种种改革的措施对日本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占领军的砸烂‘旧日本体制’和为实现美式体制而采取的各种强制措施……从大局及其结果来看,这些措施,对于日本战后所需要的政治、经济体制大改革,却起了促进的作用。”<sup>②</sup>

战后初期,日本被盟国(主要是美国)占领,在这期间不但在决定主要政策方面,而且在提供经济援助和巩固美国的经济渗透的基础方面,美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没有异议的;在恢复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当然还存在着这种依赖美国的遗

① (英)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第41页。

② (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第21页。

痕,<sup>①</sup>实际上,美国对日本的这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固然是由于美国国际战略的需要和日本地缘政治的独特性所致,但是最根本的因素仍然是由于日本的依附性发展所导致的。因此,林华生在论述日美关系时指出,在国际舞台上,日本的政治与外交态度总是受美国影响,常常跟在美国后边亦步亦趋地采取外交活动、决定政治态度;无论美国施以多大的压力,日本决不说一个“不”字,毫不夸张地说,只要知道了美国的态度,也就基本上可以知道日本的态度了。<sup>②</sup>如果日本不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那么后果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中可以管窥一般。1948年,日本有一家大公司违背占领军的命令进行了强制性裁员,在此之后,它被“4辆美军坦克,1个机动连,2架飞机和1800名武装警察”所包围。<sup>③</sup>这也导致了日本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纵然在经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对于国际政治问题,却一直谨慎从事;与其带头冒尖,不如同别国协调;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与其承担重任,不如明哲保身。<sup>④</sup>

日本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不仅是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性地位所致,而且与日本在战后制定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自从5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战后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之下,吉田主义规定:1、日本的主要目标应是发展经济;2、日本的武装应该是低水平的,应该避免卷入国际冲突;3、日本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4、日本的外交

---

① (日)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第68-69页。

② (新加坡)林华生:《亚洲四级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133页。

③ (英)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第116页。

④ (美)埃兹拉·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谷英、张柯、丹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应该摒除意识形态而致力于国际合作。<sup>①</sup> 日本将战后接受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军事保护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之一,这使得日本在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性更为特出。

因为对外政治上深受美国的影响,使得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非常不正常,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与指责常常搞得日本十分被动,而缺乏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政治自主性。最常见的情况是,美国一旦对日本有微词,日本政府便想方设法闪烁其词,消极被动地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做出反应以求了事,而实质性的措施则一拖再拖,这是日本始终一贯的态度。而且,其结局是,日本指责“美国抓日本作替罪羊,通过压制日本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而美国人认为“日本人表而上的屡屡歉意是极其虚伪的”;而且,很多国会议员为了增加自己的选票而肆意夸大日美之间的问题,当然,日本方面被动的、消极的、搪塞的反应方式也确实是个严重问题。<sup>②</sup> 事实上,这种情况正是日本经济成功而政治依附的典型描述,这也是日本依附性发展不健康的特征之一。

第三,日本经济仍然处于依附性地位。一方面,日本在技术上仍然依赖于引进,特别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结构没有能够及时的升级,主要是在资本领域的运作较为落后。资本和科学技术正是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的缺陷,导致了其经济在本质上仍然处于依附性地位的状况。

技术进步是日本经济获得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与欧美相比,日本企业的技术水平一向较为低下。第一次世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233页。

② (日)市村真一:《日本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第179页。



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甚至连电机都不能生产。三菱电机的社史上就有下述记载:“当时,首次出售本公司自产电风扇时,由于叶片不转,造成半数退货,致使公司损失惨重”,当时,就连电风扇这种简单的家电都难以生产,日本企业的技术水平可见一斑。<sup>①</sup> 而且在战前,日本的技术进步主要依赖工匠的“手艺”和工程师的“灵感”,然而在战后,大企业从海外大量引进技术,通过研究、开发,加以消化和改进。“近代经济增长”,首先意味着有组织地“把科学广泛地应用于经济生产之中”。<sup>②</sup>

但是,日本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并不是日本自己能够研发出新技术来,而是利用美国对它的经济优惠政策,大量的从欧美引进技术,因此,日本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日本对进口技术支付的专利权使用费比日本对外出口技术获得的专利权使用费要多得多。60年代合计支付技术引进费2148亿美元,获得技术转让费218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美国则相反,获得约是支付的10倍)。另外,60年代后半期日本支付技术费用的绝对额巨大,超过欧美任何一个国家。这些引进的技术大都分在外国都经过了实验阶段,刚好是运用于产业方面的技术,几乎不存在伴随着新技术开发而往往出现的浪费,因此即使支付高额的技术转让费用,也十分合算。<sup>③</sup>

从这一意义上讲,与其说日本技术进步带来了经济发展,不如说日本抓住机会,从美国引进技术,发展了经济。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从美国引进技术后,生产的产品出口比例远远超过了技术发明国的美国。日本正是利用这种依附性发展的优势,依赖于美国的技术、资本与市场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这从彩电、电

① (日)中村隆英:《日本昭和经济学史》,第17页。

② (日)安场保吉,(日)猪木武德编:《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史8)》,第300页。

③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59页。

话机、录像机、微型电子电路、计算机等美国发明的技术而日本却拥有对世界市场的很大份额的出口商品可以充分的表明这一点(表 4.8)。

表 4.8: 美国发明的技术而日本拥有出口市场的商品(单位%)<sup>①</sup>

商品名称	发明的企业或个人	时间	对世界出口比例	
			美国	日本
彩电	美国无线电公司	1980	-	33.2
		1989	-	16.3
电话机 (含相关器械)	A. G 贝尔(1876)	1980	16.4	11.4
		1989	10.8	32.0
录像机	安贝克斯公司(1965)	1980	3.5	83.7
		1989	1.7	57.3
微型电子电路	德州仪器公司(1959)	1980	22.3	17.6
		1989	13.6	22.3
计算机(含计算器)	贝尔研究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1980	5.5	64.1
		1989	4.9	43.4

本文认为日本经济仍然处于依附性地位,另一个重要方面,正如前文所言,从 1980~1990 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已经逐渐地从生产阶段的扩张让位于金融阶段的扩张。正是在这一点上,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东亚作为“世界工厂”的含义,是什么形成了东亚世界工厂的基础,便宜的劳动力还是生产力的增长?许多激进的或社会主义者认为答案是前者,他们认为东亚“奇迹”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也就是流动资本追逐廉价劳动力的过程,从东亚发展经历的前后看,这一过程从日本(背后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开始,然后是四小龙和四小虎,因此形成了一个地区范围内的积累。<sup>②</sup>换而言之,在这种新的国际分工中,

① (日)大谷健:《日本经济的腾飞: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日本国际交流研究所编,曲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② Dic Lo, “The East Asian Phenomenon; The Consensus, the Diss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sent Crisis”, *Capital & Class*, Spring 1999, PP. 1~23.

东亚依然处于依附性的地位。在整个人类世界卷入信息化潮流的过程中,日本也不能幸免,但是日本在向信息化社会过渡中出现不适症,虽然其原因很多,从社会观念看,根本还在于那种“制造至上主义”的观念根深蒂固,即虽然比较注意生产领域的信息化,却对消费者大众的信息化、对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链条的建设注意不够。<sup>①</sup>

这使得我们认识到,工业生产虽然重要,但是在产业结构上,仍然属于较低的层次。因此,在市村真一看来,在讨论日美关系时,不仅要认识到生产方面的重要性,还要认识到金融方面美国及瑞士的强大势力,如果日本的金融也能象生产那样强盛,则日本的利率就会稳定,日元更加坚挺,从而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景气刺激政策。<sup>②</sup> 同样,资本领域的运作往往比生产领域的发展更能增殖财富,例如,在金融领域,世界各国资金作为美元存款汇集到美国。如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石油贷款从世界各国涌进阿拉伯产油国,这批巨额石油美元的大部分被存入最安全可靠的欧洲的银行(尤其是瑞士)和美国的银行,美国将该存款以较高的利率贷向国内及落后国家。流入的存款越多,贷出的资金越多,如墨西哥800亿美元,巴西600亿美元,东欧各国和苏联合计750亿美元,这些天文数字的资金都由美国的银行来操纵,这样,“美国虽然存在商品贸易上赤字,但由于利息及其他收入的弥补而没有陷入困境”,<sup>③</sup>由此不难看出金融扩张替代生产扩张的合理性。

可以说,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的变化,日本理论界早

---

① 冯昭奎、张可喜:《技术立国之路:科学技术与日本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② (日)市村真一:《日本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第180页。

③ (日)市村真一:《日本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第180页。

就有过论述,早在1988年,日本的《评论月刊》就撰文分析了这种由生产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转变的趋势,“当今经济形势中具有本质性的新事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和重心已从商品和劳务生产转移到金融资产的买卖和其数量的成倍增长上来”。<sup>①</sup>事实上,经济发展的统计数字显然能证实这一趋势。从国际范围看,与之最有关的数据是将国际商品和劳务贸易量和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外汇成交量作一比较,1989年4月份伦敦、纽约、东京、多伦多四大外汇交易市场上每天平均实际成交额达到4459亿美元,即年成交额达111万亿美元;请注意,这个数字是1989年世界贸易额(约5万亿美元)的22倍,这一趋势还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说明,即1986年3月到1989年4月四大市场上的外汇成交额增长116%,而1986年1季度到1989年1季度英、美、日、加四国商品和劳务的外贸额只增长了56%。<sup>②</sup>

由此可知,虽然日本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其所处的国际经济秩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美国的依附以及其经济结构自身的依附性特征,使得日本经济孕育着很深的危机。近年来,日本各界呼吁要调整日本经济,重振日本经济发展的景气,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改变日本经济的依附性特征。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论述的那样,对于日本(东亚)的依附性发展,我们必须对其依附与发展进行辩证的思考,而且要将这种依附性发展的结构置于当时特殊的国际背景中去考察。实际上,有许多欧美的学者曾认为亚洲不适合发展商品经济,甚至有“亚洲的停滞”的说法。以儒家影响为例,德国的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在他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断言:儒教(中国

① 《评论月刊》,1988年3月,第9页,转引自(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第2页。

② (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第2页。

孔子的思想)拘泥于形式和礼仪,是一种提倡满足现状的消极说教,与发展产业资本主义无缘,换言之,儒教文化因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最多不过成为耶稣教(基督教)国家的殖民地。<sup>①</sup>东亚人或许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如果从产业结构上而言,我们只是努力的在生产性领域内进行发展,而不能及时的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或许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真的会成为基督教国家的殖民地。事实上,东亚最近的经济飞跃发展,并不能成为乐观的理由,因为我们没有根本的改变发展的依附性本质,危机就在身边,不时的就会冒出来。甚至在东亚经济发展最为乐观的时候,其依附性结构已经孕育了发展的危机,米歇尔·普卢默在评论《亚洲发展前景(1997~1998)》一书时曾经指出,亚洲的很多问题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夜就已经酝酿了,例如过多的国际债务、较高的经常性项目赤字、低生产力增长和需要结构与财政改革。<sup>②</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历经战火的蹂躏,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前途毫无希望,战前亚洲唯一的一个工业化强国可能就此而沦落到第三世界的行列,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突变,冷战、韩战、越战引来强有力的美援,为战后初期东亚地区走出严峻的困境提供了特殊机遇,<sup>③</sup>日本由于独特的地缘重要性而获得美国的另眼相待,日本因此而从战败国上升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复活的首要因素是美国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向日本提供了日本经济发展非常需要的美元和技

① (日)大谷健:《日本经济的腾飞: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第155页。

② Michael G. Plummer, "Book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Summer 1998, Vol. 9, PP. 369-372.

③ 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参见中村哲等著:《论东亚经济的现代化》,第57页。

术。<sup>①</sup>美日签订的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条约,不仅为日本提供了安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而且使得日本充分享有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种种便利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特别是固定汇率制,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的出口竞争能力在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汇率的支持下得到迅速增强。<sup>②</sup>而欧美对日本开放的市场,给日本的帮助尤为重大。在各种论述日本经济发展的著述中,“外国援助几乎全是来自美国的援助”,“以对美出口为中心出口大幅度增加,促使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等的描述几乎随处可见,这种来自外部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帮助,在战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是罕见的,这足以表明日本经济的依附性特征。

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日本依附性发展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依附性的优势,然而,当今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冷战时由于苏联这一大敌当前,日美不希望对抗。现在这一认识已消失,即冷战时期的“向心力”已不复存在。日美之间以“市场换军事基地”的交易随着冷战结束而失去意义,美国有关人士中“安保挂钩论”在抬头。商务副代表杰夫里·加滕指出,“任其存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巨大的不平衡而构筑坚固的安保关系,这是史无前例的”;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日本最大的市场,并向日本提供安全保护伞,要得到贸易上的利益,应使用这些杠杆”。<sup>③</sup>冷战结束了,美苏对立的国际格局如今成了美国一极独霸的情形,美国在冷战时代确立的以经济让步换取日本政治支持的战略发生了变化,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处处谦让”到

①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第95页。

② (日)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及其评介》,第239页。

③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世界经济大视野》,第124页。

“针锋相对”，特别是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由军事力量转为以科技和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使得美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加深。最为典型的事件莫过于日元升值，在林华生看来，1985年以后日元的急剧升值，是以美国为主的工业发达国家“敲打日本”的一个结果。<sup>①</sup>因此，当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时，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采用依附性发展的国家，“导致日本不再名列第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失去了值它在冷战时代得以‘名列第一’的许多客观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日本成为“冷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包括在军事上接受美国的保护，在经济上享受美国长期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实惠。”<sup>②</sup>

对于日本而言，它在战后长期内所享有的“优惠条件”正在逐步的消失，可以说，总体的国际经济形势对日本正转向不利，油价上涨、日元升值、市场萎缩、产业出现空心化、贸易摩擦、技术专利的限制等因素正在改变日本以前的有利经济环境。面对这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在这一变化中的自我调整过程却滞后于这种趋势，因此，依附性发展所潜伏的危机逐步的显现出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经济发展缓慢乃至停滞的现象，经济结构不合理，应对危机迟缓，金融丑闻不断，正是这种依附性发展本身结构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虽然日本政界、学界提出了种种应对措施，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关键的问题在于日本整个经济结构的依附性特征，而不是具体的一些环节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对日本而言，不根本改变依附性发展的结构，那么危机则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当然，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论述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依附是现代世界中较为常

① (新加坡)林华生：《亚洲“四级”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41页。

② 冯昭奎、张可喜：《技术立国之路：科学技术与日本社会》，第155页。

见的一种现象,即使是美国,切断它的国际贸易也会破坏它的经济结构并且使它的人民对生活失望。<sup>①</sup> 因此,对于日本(东亚)而言,应该利用其依附性发展所积累下来的财富,能够及时的升级其产业结构,减少依附所带来的发展代价,或许这是日本依附性发展最迫切的事情。同时,日本如果能够更改它的依附性发展模式,那将对整个东亚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日本占据东亚经济总量的70%,它的萧条把它的邻国拖入了消极增长的泥沼中,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失去了出口的目标;它的复兴,也会对整个地区起着重大贡献;因此,克林顿总统说,“除非日本经济首先得到恢复,否则我们看不到亚洲的恢复增长。”<sup>②</sup>

刘易斯曾经说过,“我们几乎都是毫无例外地对经济增长持有好恶兼有的态度就是因为经济增长既有好处又有损失,我们需要抛弃贫穷、无知与疾病,但我们又极想坚持我们所喜欢的观念、习惯和社会制度,尽管这些正是我们所憎恨的贫穷的原因。”<sup>③</sup> 无论人们对文化、制度等因素是多么地偏好,事实上,唯有经济才是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二战后最突出的经济问题至今一直是经济的增长问题。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已变成大多数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在历史上也许还是首次,借用米香的词语来说,“增长狂热”已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绝大部分时期中政党的宣言和经济学家作品的特点。<sup>④</sup> 日本

① Lim Chong Yah,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 108.

② James L. Tyson, “East Asia; Up from the ash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07/13/1998, Vol. 90, p. B4.

③ (美)W.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第543页。

④ (英)海韦尔·G. 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郭家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3月,第7页。



在战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不仅在于日本战后时期的迅速增长被称为经济奇迹,成为发展中国家羡慕的对象,而且它唤起了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的希望。<sup>①</sup>

日本无疑是战后由不发达达到发达最为成功的例证,战后日本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虽然本文从许多方面论证了日本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其依附性结构,但是,就依附性的程度和依附性发展的趋势而言,日本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与战后初期对外的依附程度状况相比,日本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虽然在军事、外交、经济等领域还存在着依附性,但是与日本取得的成就相比,社会的整体依附性已经减轻;同时,日本这种依附性发展的趋势已经逐渐地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已经逐步的进入了自主发展的轨道,因此,本文认为日本是一个依附性发展的成功的国家。

---

<sup>①</sup> 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P. viii.

## 第五章 韩国:依附性发展 半成功的国家

韩国<sup>①</sup>和日本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发展的前景并不为世人所看好,因为韩国长期被日本殖民者所掠夺,并且历经战争的破坏,而且它的自然资源很贫乏。

从某种意义上讲,韩国并不是一个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国家,这从韩国自然资源的禀赋中可以推论出。据统计,1989年韩国总面积为9.9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280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1990年每平方公里达431.1人;<sup>②</sup>其中山地和森林占67.2%,河川及其他占10.1%,耕地面积只占22.7%;1960年韩国每人平均耕地面积不到0.14公顷,少于世界人均水平;而可利用面积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132人,居世界第一。<sup>③</sup>而作为主要能源的工业原料——石油,韩国一点也没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油国;而且,铁、钨、镁等地下资源也很贫乏,就是对特殊农作物的栽培也缺乏良好的自然条件。<sup>④</sup>

---

① 为了行文统一,本文对 South Korea 通称韩国,但是引文部分则尊重原文,或称韩国,或称南朝鲜。

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贸政策和发展司等编:《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指南:韩国分册》,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③ 沈祖良、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页。

④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韩振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页。

经历了日本残酷的殖民剥削、世界大战与朝鲜战争的毁灭，韩国已经没有剩下任何可供继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战争后的韩国在香农·麦丘恩笔下呈现出一片灰色的图景，“到处是碎石破瓦，工厂只剩下了个外壳，过去高楼矗立的地方只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大空洞，火车机车被彻底毁坏，一切都被尘土覆盖，肮脏不堪，使每一个来访者都感到压抑万分。”因此，香农·麦丘恩认为，“南朝鲜的未来绝不会是玫瑰色的，人民将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sup>①</sup>

然而，就在世界对韩国失望的时候，韩国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在短短的30年中，韩国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韩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有了惊人的提高。在上个世纪50年代，韩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那时，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有“韩国”这个国家。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到处是战争孤儿、未亡人、伤残军人、乞丐和流氓无赖，韩国似乎成了极端贫穷和混乱不堪的代名词。许多西方人认为韩国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国家，甚至断言：“期望韩国有所发展犹如期望在垃圾筒里开出玫瑰花一样”。可是奇迹发生了，从6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国家。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开发报告书”称，从1965年至1991年期间，韩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少数国家之一。1960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0亿美元，可是到了1993年已经达到3287亿美元，人均GNP从60年代初的100美元增加到现在的7466美元。<sup>②</sup>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召开，更是增加了韩国的国际声望。1996年韩国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

① (美)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崛起》，罗龙、郁庆晨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② 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第22~23页。

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了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

韩国这样一个最初被人们认为是贫困落后而又没有什么希望的国家在不到 30 年中却发生了巨大变化。1960 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 80 美元,到 1996 年达到 10000 多美元,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00 美元(1963 年)增长到 1000 美元用了 14 年的时间,再从 1000 美元增长到 10000 美元用了 18 年的时间,<sup>①</sup>韩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犹如古代神话的现代版,被国际社会誉为“汉江奇迹”。这对其他仍然处于落后境地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具有无比的吸引力。因此,对于韩国成功经验的探讨也就成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个永恒的主题。人们试图从中寻找出对自己国家发展有益的借鉴。本文将韩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发展历程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中去考察。虽然,韩国人勤奋节俭等儒家传统品质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也承认韩国政府的干预是韩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助力,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是韩国所独有的现象,那么为何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不能够获得象韩国一样的增长呢?因此,在本文看来,要寻求韩国战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必须将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来探寻是谁向韩国伸出“上帝之手”,推动了韩国的经济发展。正如安秉直所分析的那样:韩国的发展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形成的,这一事实使得韩国经济又具有另一个特征,这就是与其说韩国经济是自力更生发展的,倒不如说是在各发达国家那里吸收“后发性利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若说韩国经济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发展,便会与迎接近代化的韩国国民的愿望大相径庭;大多数韩国人都认为,韩国经济是在与帝国

---

① 张蕴岭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年,第 1 页。

主义对峙状况之下形成的；然而事实上，同人们所想像的相反，韩国经济是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中发展起来的。<sup>①</sup>无疑，这一事实对自尊心极强的韩国国民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将使他们的世界观发生很大变化。但是，这的确是韩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

因此，在本文看来，韩国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韩国能够融入以美国为首（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之后，日本对韩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从而免费或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到这一体系带来的种种好处，而正是由于这一体系对它的资本援助、市场准人和技术转让才使得韩国经济最终能够起飞。当然，本文并不否认前人对韩国经济发展的种种解释，特别是关于韩国政府及朴正熙总统个人对于韩国经济的作用，<sup>②</sup>本文只不过是从事依附性发展的角度对于韩国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解释。

因此，赵淳在探讨韩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原因时就指出，虽然韩国的国内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当时韩国所处的国际背景来看，必须加上一个外部的但很重要的因素：战后时期韩国周围有利的国际环境，其特点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经济援助、各国流行的稳定的自由贸易体制，以及先进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强劲需求，这些对利用后来者的优势十分有利；如果韩国是在大约一个世纪前商品、资本和技术流动仅局限于先进国家的那种国际环境中发展，那么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发

---

① 安秉直：“韩国的经济发展与近代史研究”，转引自（日）中村哲等著：《论东亚经济的现代化》，第78页。

② 有大量的著述强调朴正熙对韩国发展的作用，如：（韩）赵利济，（韩）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第12～30、445～447页；（韩）金正濂：《韩国经济腾飞的奥秘——“汉江奇迹”与朴正熙》等。

展要素发挥了积极作用。<sup>①</sup> 由此而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冷战的发展和美苏的对立,凸现了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使得韩国成为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经济恢复与发展中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这才是韩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梅瑞狄斯才会如此地强调美国的作用,即“美国援助对韩国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sup>②</sup> 朝鲜战争以后,韩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体系的一部分被推到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前沿,而这一地区的生存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从1946年到1976年,美国向韩国提供了126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援加上日本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资助,30年里给韩国的援助总量,按中间水平的1960年计算,人均是600美元。<sup>③</sup>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乔恩·沃伦诺夫才断言:“南朝鲜经济没有全面崩溃的唯一原因是美国自始至终一直是它强有力的支持者,美国不仅在南朝鲜保留着强大的军事设施,而且还提供大量贷款资助它重建经济、壮大军队,美国官兵在当地的消费也成了许多南朝鲜人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华盛顿方面为了能使南朝鲜恢复经济,向它输送了大量的民用补给,例如为供养饥饿的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粮食,这些援助加起来总共大约有40亿美元,这在当时,对南朝鲜这样的小国无疑是个不小的数额。”<sup>④</sup>

① (韩)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李桐连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第206页。

② 梅瑞狄斯:“东亚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市场和意识形态的透视”,刊载于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88页。

③ J. Woo,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4.

④ (美)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崛起》,第13页。

这一切,不仅稳定了韩国战后的经济,而且为其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前提条件,更重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接踵而至的资本、技术援助和免费开放的市场更成为韩国经济起飞的基石。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其全球战略的构想,即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其霸权,韩国作为其全球战略重要的一环,充分利用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而在依附于美国和日本的同时,积极发展自身的经济实力并获得很大的成就。

本章首先考察了朝鲜战争后韩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然后详细的阐述依附性发展与韩国经济社会变化的关系,考察韩国在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是如何获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揭示了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中对美国和日本明显的依附性特征;然而,由于韩国经济发展的依附性特征,使得其发展呈现出健康的一面,故而本章最后考察了依附性发展对韩国经济与社会变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进一步思索韩国依附性发展的前景。

## 第一节 战后初期韩国的 政治经济形势

历经日本的殖民统治、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破坏,到1953年和平条约的签订,韩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终于获得了和平的发展时期。朝鲜战争后初期韩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呈现出如下的几个特征:

### 一、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朝鲜历史上,日本的殖民统治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殖民地的历程也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开始。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却给朝鲜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虽然二战后日本在韩国的资产被美国接管转交给韩国政府的工矿企业奠定了韩国战后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一次重创了韩国的经济基础。

朝鲜工业生产迅速增长是日本资本投入的结果,就技术和经济发展来说,日本实行帝国主义扩张,给朝鲜半岛提供了大量基础设施,而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这些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对后来韩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特别是技术教育、生产技能及技术知识的获得等。<sup>①</sup>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日本在朝鲜建立和发展的工业,对于朝鲜民族经济发展而言毫无帮助,其资产和所有权都是属于日本的,换言之,这些企业是为日本经济服务的。日本在朝鲜工业中大部分工厂由日本移民担任领导。日本在工业部门的全部实际资本中所占比例从1911年的32%,增加到1917年的80%和1921年的90%。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农业人口稳步低速增长,但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要快好几倍,特别是在3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总的经济增长率约3%,而人口净增长率仅为1%左右。<sup>②</sup> 这表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经济有较大增长。

因此,日本的殖民主义统治,还是给朝鲜经济特别是工业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的。但是这种经济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

① (韩)赵利济,(韩)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孔德涌等译,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② (韩)赵利济,(韩)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第4页。



到了严重的破坏。战争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从工厂总数看，由战前 1941 年的 6382 个减少到 1948 年的 3808 个，减少了 40.3%；从职工总数看，由 1941 年的 149242 人减少到 1948 年的 105696 人，减少了 29%；除化学工业外，其他部门均大批减员，其中金属、印刷、食品、工艺等部门职工减少一半以上；从工业生产来看，1948 年韩国工业总产量比战前的 1939 年下降了 83%，其中作为其主要工业部门的纤维工业下降 74%，化学工业下降 57%，食品工业下降 93%，机械工业下降 84%，金属工业下降 59%，印刷工业下降 76%，窑业下降 68%，工艺工业下降 99%；战后初期，韩国的传统的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况；耕地面积减少，战前耕地面积为 330.6 万町步，到 1947 年减少到 260.4 ~ 262.0 万町步，耕地总面积比战前减少 20% 左右；粮食产量下降，战前为 2558.3 万石，到 1947 年下降到 2073.9 万石，只及 1940 ~ 1944 年间年平均产量的 81.1%；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物价指数以 1936 年为 100，1944 年为 241，战后的 1946 年猛升为 22100，比 1944 年增加 91 倍；到 1947 年达到 40200，1948 年达到 65500，1949 年达到 81000；1945 年 8 月 15 日，韩国银行券的发行量为 197500 万元，到 8 月底其总发行量剧增至近 80 亿元，可见其时通货膨胀之严重；对外贸易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而处于完全停滞状况，当时，韩国所谓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对美国的双边贸易，按照韩国当局 1946 年 1 月发布的策 39 号军政法令，美国完全控制了韩国的这种对外贸易，1946 年，韩国出口总额仅 36 万美元，而进口总额达 4949.6 万美元，贸易逆差竟达 4900 多万美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49 年；1949 年其出口总额为 1267 万美元，进口总额高达 12673 万美元，仍

有贸易逆差 11400 万美元。<sup>①</sup>

美国从 1945 年 9 月到 1949 年期间,向韩国提供“占领地区政府救济基金”,总额 4.3 亿美元,并于 1945 年 9 月公布第二号和第三十三号命令,以赔偿战争损失为理由,接收日本在韩国的财产(称之为归属财产);这些财产占当时韩国全部财产的 80%,其中包括 91.2% 的资本、94% 的工业投资、70% 的土地以及大量其他财产。<sup>②</sup> 这些财产构成了战后韩国经济的基础。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遗留的工业基础在战火中灰飞烟灭,韩国经济在战争中遭到沉重的打击。

总的来说,韩国经济在朝鲜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21%,直接经济损失达 30 亿美元,韩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之中。1951 年,工业产值比 1949 年减少 48%,工业设施和工厂建筑在战争中损失 60%,电力、交通、通讯等部门的设施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战争期间,韩国通货恶性膨胀。批发指数,以 1947 年为 100,1950 年 6 月为 348,1951 年为 2294,1952 年为 4751,1953 年达到 6466。城市零售价格指数,以 1947 年为 100,1950 年为 531.5,1951 年为 2128.5,1952 年为 5243.6,1953 年高达 7618.8。<sup>③</sup>

经过 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之后,韩国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直到 50 年代末,人均收入仍大大低于她的大多数邻国。战争不仅仅破坏了韩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毁灭了人们的希望。韩国经济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朴圣相在 1988 年 11 月关于“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演讲中,提到当时美国对韩国人的看法,他说:“今天我还

① 沈祖良、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第 21-22。

②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3 页。

③ 沈祖良、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第 23-24 页。

清楚地记得 1959 年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国际开发总署关于韩国的报告。报告中说:‘朝鲜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人。他们开会从来不准时到会。’朝鲜人和美国人都把这种开会迟到一小时的现象叫作‘朝鲜时间’;报告接下去还写道:‘大学毕业生游荡于茶馆之间。他们从来不去找工作做。他们热衷于探亲访友,而对工作毫不热心。’”<sup>①</sup>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由于战争严重的损害了经济,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社会充满了悲观,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都萎靡不振。

## 二、战后初期韩国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战后初期的韩国政治与社会状况,可以表述成国家全面依附美国,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1945 年日本投降后,美国接管了韩国,自此,韩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就严重的依附于美国,这是战后韩国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政治上,李承晚政权完全依附于美国。1948 年,李承晚在美国的扶植下成立了大韩民国,1949 年 1 月,美国正式承认韩国。韩国在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一切重大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权力仍由美国掌握。美国通过与韩国签订一系列协定,如“韩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关于设置驻韩美国军事顾问团协定”(1948 年 12 月 10 日签订)和“韩美经济援助协定(1950 年 1 月 26 日签订)等,使美国不仅在韩国拥有军事指挥权和大量军事基地,而且还对韩国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具有审议、决定和批准权。美国通过常驻韩国的“顾问”,全面操纵韩国的军

<sup>①</sup> (韩)朴圣相:“南朝鲜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附录在(韩)朴圣相:《增长和发展:实物生产和就业增加的战略》第 226~239 页,蔡坚,陈晓希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年,第 227 页。

事、政治和经济。<sup>①</sup> 很难想象一个失去对国内政治经济控制的国家能够称得上独立的国家,当时的韩国政府只不过是美国的傀儡而已。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为韩国提供军事援助,更直接出兵朝鲜。战后,在韩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美国更是占据了主动权。当时韩国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大事情都要获得美国的首肯才能执行,而各项政策的制定更是在美国的直接领导与监督之下。当时美国对韩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人们对于政府出台的政策,不知道“首先反映的是韩国政府的目标还是美国援助当局的目标”。<sup>②</sup>

在李承晚执政时期,韩国的政治一片混乱,经济发展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援助。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朴圣相在 1988 年的演讲中回忆了 1961 年韩国人民的生活,他说:“那时候,每当青黄不接的季节,许多农民只好上山剥松树皮给一家老小充饥。你们尝过松树皮的味道吗? 只有在你饿极了的时候才会觉得它好吃。”<sup>③</sup>

客观的讲,朝鲜战争后的韩国,除了苦难与无尽的悲伤以外,前途看不出有一丝的曙光。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发现自己是周围四邻中最为贫困的国家,在贫穷的韩国人心中菲律宾被看作是他们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仿效的榜样,然而就连这个榜样看来似乎也是难以仿效的。<sup>④</sup> 当时的韩国没有什么真正的财

① 杨永骞、沈圣英:《南朝鲜》,第 244 页。

②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79 页。

③ (韩)朴圣相:“南朝鲜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第 227 页。

④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张胜纪、吴壮译,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 10 页。

富,更谈不上开发和利用,从已有的实物财产方面丝毫看不出韩国有任何可据以取得经济成果的先决条件,它的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只是平平,而简直是惨不忍睹,但是在短短的30年中,韩国人却成了在这种基础上创造出奇迹的人,故而,被称许为是“超级魔术师”。<sup>①</sup> 韩国自从196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以来,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1962到1978年的17年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四番多,由1962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459亿美元;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加到1330美元。<sup>②</sup>

由此可见,虽然战后韩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但是韩国毅然从困难中冲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根源正是因为韩国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就是,依附导致了韩国社会的发展。

## 第二节 依附性发展与韩国社会的整体变迁

韩国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犹如最贫瘠的荒漠突然变成了绿洲一般让人吃惊。正如我们上文分析的那样,这种成就的取得并不完全是韩国自身努力的结果,而是国际环境的变迁孕育了韩国发展所需要的沃土。其实,不仅韩国如此,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成功也应归功于地理和历史因素;二战以后,美国对日

① (美)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崛起》,第3页。

② 吴春波、郭国庆:《成“龙”的奥秘:韩国经济起飞透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页。

本重建的援助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及其之后美国的经济援助及战争花费都大大推动了对出口工业部门的投资,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的工业为美军做补给,而当韩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业集团时,越战中的美军又需要商品和劳务来支撑战争。<sup>①</sup>对于韩国而言,可是说是美国和日本拉动了韩国的发展,而韩国则抓住历史的机遇,将自己捆绑在美日奔驰的飞车上,从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韩国正是因为依附于美日才取得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

因此,来自美国(以及1965年以后日本)的援助就成为韩国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换言之,韩国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依附性特征。而韩国依附性发展中依附的含义具体到实处就是来自美日的援助。

### 一、来自美日的援助

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那样,无论从自然资源还是战后韩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韩国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发展国家。然而,韩国却充分的利用国际关系的有利因素,紧紧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借助于全球范围的冷战格局所凸现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众所周知,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利益和世界霸权,对苏联实行遏制战略,在东北亚,这种遏制战略体现为美国与日本和韩国建立的政治和军事同盟;美国是这一三边战略合作关系的领袖,美日同盟是其支柱,美韩关系则是这种战略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sup>②</sup> 正是因为韩国地缘政治

① (智)亚历克斯·E.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比)安德烈·莫门主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制度和经济变迁》,陈江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35页。

② 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的特殊性而导致了美国对于韩国的特殊“照顾”。

因此,由于政治原因,韩国一开始就从美国得到了远远超过印度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所能得到的人均援助,并且,美国强制韩国采取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就象在战败的日本所做的那样,日本对此现在会感到满意;战后的最初几年,美国倾向于在可能的程度上积极关注这些国家的经济,这说明了这些国家为什么在出口工业的投资上有更大的自由,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重视出口。<sup>①</sup> 因为,美国向其开放的市场,足以吸纳其工厂开足马力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韩国在依附于美日的情况下取得发展的成功便带有明显的依附特征。换言之,美日的援助就是韩国经济发展依附性特征的具体内容,而美日的援助具体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美日对韩国进行的经济援助。

美国和日本对韩国的经济援助一方面稳定了战后韩国濒临崩溃的经济,另一方面也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秉直就曾直言不讳的承认,韩国的经济发展不是自生自发的,进行独立运动的民族势力也不是经济发展的主力,韩国经济是作为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环而展开的。<sup>②</sup> 当美国为“自由世界”而战斗时,韩国作为它的前沿阵地,接受了源源不断的援助,首先就是来自美国的资本援助。韩国作为美国在东亚反共产主义的战争堡垒受到了美国特别的援助。从1953到1962年,美国的财政援助占韩国进口的70%和固定资本构

① 冈纳·缪尔达尔:“国际不平等和外援的回顾”,载于(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149页。

② 安秉直:“韩国的经济发展与近代史研究”,参考中村哲等著:《论东亚经济的现代化》,第85页。

成的80%,此外,到1979年,美国还向韩国提供另外6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可以说美国的援助在韩国经济的起飞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资本的积累决定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在韩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却又是最为欠缺的一个方面。李相俊认为,韩国在历史上资本的原始积累就很难形成,如果说还有一点资本积累的话,那也只有从日本占领者手里收归国有的一点工矿企业而已,这样,无形中就造成了经济开发所需资金严重不足的被动局面,这样一来,其开发资金就不得不依赖外国了。<sup>②</sup>所谓在资本方面依附于外国,主要是指依附于美国和日本(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之后)。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根本原因在于韩国战略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为此,美军以赔偿战争损失的名义,于1945年9月25日发布《日本人财产移交之法令》,接收了日本人在朝鲜南半部的全部财产;<sup>③</sup>并且在1947年将接管的日本在韩国的全部财产“归属”给韩国政府当局,这批财产计有:工矿企业2690个,财产3924宗,船舶225艘,仓库2818个,商店9096个,耕地32.4万公顷,住宅48456幢,森林7万公顷,果木园2386处等,占当时韩国总财产的80%。<sup>④</sup>韩国政府接管过来的财产成为战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希望与唯一可以依赖的经济基础。

①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 11.

②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2页。

③ 韩国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编著:《韩国经济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④ 沈祖良、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第8~9页。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给李承晚傀儡政权的三笔经济援助共 7.9 亿美元;从 1954 年到 1960 年,美国及“联合国”对韩国的无偿经济援助共达 18.8 亿美元。<sup>①</sup>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出于东北亚地缘战略的考虑,从而甘愿背起帮助韩国进行战后经济重建这个包袱。1952~1953 年,有两个美国经济顾问班子到韩国考察并制订战后重建计划。一个是“美国援助代表团”组织的罗伯特 R. 内森(Robert R. Nathan)小组,一个是由亨利 J. 塔斯卡(Henry J. Tasca)领导的总统使团。内森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援助韩国的五年计划,这一计划是一个包括各种进出口项目的大杂烩,它过高地估计了韩国的经济潜力,期望太高,但这是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援给韩国经济援助的依据;根据内森计划,从 1953 年到 1960 年,美国共给韩国经济援助 17.45 亿美元,另外联合国朝鲜重建局的援助有 1.2 亿美元,这个援助数目在当时世界经济水平下是十分巨大的。<sup>②</sup>

据爱德华·梅森所作的研究,“1953 年至 1962 年这个时期内,(韩国收到的)外援约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8%、固定资本积累的 77% 和进口支出的 70%,而外援的 95% 来自美国。1965 年以前,美国的经济援助几乎都是以赠与的形式提供的。”<sup>③</sup> 当时,韩国是仅次于越南、以色列的世界第三大受援国。

据统计,在 1946~1976 年间,美国给韩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虽然今天的韩国大企业实力雄厚,但是在当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一个企业是离开援助而靠自己的资金建立

①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第 127 页。

②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第 58 页。

③ Edward S. Mason and other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55.

的。”<sup>①</sup>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韩国经济不要说发展,就连维持国家的稳定都不可能做的到。1946~1976年美国对韩国经济、军事援助的详细情况参见表5.1:

表5.1: 1946~1976年美国对韩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单位:百万美元)<sup>②</sup>

	1946~1952	1953~1961	1962~1969	1970~1976	合 计
经济援助	666.8	2579.2	1658.2	963.6	5867.8
军事援助	12.3	1560.7	2501.3	2797.4	6871.7
合 计	679.1	4139.9	4159.5	3761.0	12739.5

日本在战后对韩国的援助开始于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在美国的督促下,韩国和日本在1965年签订了《韩日基本关系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分10年支付,其中3亿美元是无偿援助;2亿美元是有偿援助,利率为3.5%,归还期为20年;此外,日本政府还同意由它早日促成一项按照商业利率的“3亿美元以上的民间经济合作”。<sup>③</sup>韩国和日本关系能够迅速的稳定下来,一方面可以说是朴正熙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提供了韩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本和技术,这是韩国所不能也无法拒绝的“诱惑”。

除了日本政府提供的援助之外,日本还是韩国获得外国贷款的主要来源。从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到1973年,日本向韩国提供了6.74亿美元商业贷款和4.16亿美元政府贷款。1971年日本的投资额为4200万美元,占外国总投资的35.4%,1979年上升到5.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58.8%。<sup>④</sup>

① Gregory Henderson,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98.

② 资料来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 *The Korean Economy Issues of Development*, 第12页,转引自杨永骝、沈圣英:《南朝鲜》,第245页。

③ 杨永骝、沈圣英:《南朝鲜》,第256页。

④ 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第24页。

据统计,从1959年到1971年间,给韩国借款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其次便是日本。美国的借款占韩国总贷款额的44.0%。而源自日本的贷款,其数额占韩国贷款总额的23.3%。美日两国合起来共占大约70%。美国提供的贷款中公共事业比例较大,而日本提供的贷款中商业贷款比例较大。详见表5.2:

表5.2: 1959~1971年美日对韩国贷款情况统计(单位:百万美元)①

年份 地区	1959~1966			1967~1971		
	公共事业	商业	小计及比例(%)	公共事业	商业	小计及比例(%)
美国	68	41	109(36.8%)	494	471	965(44.6%)
日本	17	68	85(28.7%)	184	321	505(23.3%)
合计	120	176	296(100.0%)	811	1353	2164(100.0%)

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对韩国的资本援助中,无偿的经济援助占很大的比例,据统计,在1962~1972年间,韩国收到的无偿经济援助达18亿美元。②除了无偿的经济援助之外,韩国还利用其隶属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成员的优势,享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较为平等的对待,从而接收了大量的外国贷款。从1959~1978年间,韩国共接受外国贷款122.16亿美元,从1962~1978年间共接受外国直接投资8.73亿美元。③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虽然韩国资本的主要份额来自国外,但是民族主义的韩国政府拒绝过多的外国跨国公司的存在,因为担心它们会影响韩国的政治和社会;因此,在美国的担保下,资本主要以贷款的形式流入韩国,从1962到1979年间,外国资本占韩国国内资本

①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院经济合作局编《引进贷款统计》(1981年),第4页,转引自(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239页。

② 杨永骝、沈圣英:《南朝鲜》,第139页。

③ 亚洲经济问题编辑组编:《亚洲经济问题: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讨论会文集》,第15~16页。

构成的30%左右。<sup>①</sup>这样,在韩国所利用的外资中,主要部分是外国的贷款,详细的情况参见表5.3关于1959~1989年流入韩国的外资统计。

表5.3 1959~1989年流入韩国的外资(单位:1000美元)<sup>②</sup>

年代	外资总额	贷款			外国直接投资
		总额	政府贷款	商业贷款	
1959~1961	4386	4386	4386	0	0
1962~1965	138276	118775	52836	65939	19501
1966~1970	175723	1692772	549396	1143376	64460
1971~1975	4998780	4510598	2027250	2483348	488182
1976~1980	12280637	11748708	4774606	6974102	531929
1981~1985	11371912	10635083	7499026	3136057	736829
1986~1989	11192059	8383000	3357000	5026000	2809059

正是由于美日等国及国际组织的帮助,韩国经济开发初期才克服了资本不足的困难,取得了经济的大发展。换句话说,韩国从1962年开始编制的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其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超过原定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国际合作的力量。<sup>③</sup>而这种合作,主要是指美日等国家对韩国的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于美日援助的作用存在着争论,这主要是因为美日(特别是美国)提供的援助中大约有30%的是粮食,属于消费性产品;另外有81%的援助属非长期性经济开发援助,是经济开发的计划外援助。正因为如此,李相俊认为这种援助对韩国所起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一方面,援助

①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 39.

②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 135.

③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240页。

属于一种短期的经济行为,对于韩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援助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急需的资本;据统计,从1953年到1962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4.7%,被挖潜挖出来的国内储备为4.1%;用12.5%的投资率达到了67.2%的投资规模,这部分财源都是靠援助解决的;1957~1961年之间,国家年收入中的45.5%是由援助物资的变卖资金来充当的,特别是1948~1962年期间所产生的贸易赤字的80.3%都是由援助进口物资所填补的,因而,可以这样说,这种援助对稳定韩国经济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sup>①</sup>

因此,应该客观的评价美国援助的作用,尽管这种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经济稳定的短期目标,但它使韩国渡过了困难时期,并使这个国家得以进行许多重要的投资,形成了后来发展的基础。例如,用出售援助物资所得的收益、以韩国货币建立的“对应基金”为很大一部分韩国政府预算和对社会基础设施及关键产业的投资提供了资金;这项基金还成为韩国建设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财源,该银行是为了基础产业融资于1954年成立的;此外,美国的援助使韩国人能够对教育机构进行投资——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随后几十年韩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②</sup> 同样,日本的援助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换而言之,如果没有美日的经济援助,韩国不用说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恐怕时至今日依然会象其他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般,在世界经济体系的门槛外游荡。

其次是韩国对外贸易的依附性。

---

①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234~235页。

② (韩)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第16页。

外国援助对韩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大卫·C. 科尔在其“外国援助和南朝鲜的发展”一文的计算说明,从1953年至1962年期间,在外国援助下,韩国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为1.5%;假如外国援助减去一半,则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为0%,假如全部取消外国援助,按人口计算的增长率将下降到-1.5%。<sup>①</sup>正是由于美日提供的资本援助,韩国经济才能够在战争的废墟中发展与腾飞。

由于韩国自然资源的缺乏,所以韩国在选择发展策略时,经过短暂的进口替代后,迅速的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大力地发展出口贸易。因此,朴正熙上台以后,提出了韩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出口第一主义”。所以,对外贸易对于韩国这样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世界银行最近一份有关韩国经济情况的研究报告指出,50年代以来,韩国出口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起的作用明显加强,1960年以前,出口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起的作用小于10%,然而到70年代初,出口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起的作用则达到25%,70年代末,又一跃而超过33%。<sup>②</sup>事实上,韩国进出口占GNP的比率从1963年的22.7%上升到1979年的72.7%。<sup>③</sup>

俞正镐由此而认为,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增长迅速是因为它们与世界市场相互发生作用互相影响,这种相互作用的一面就是出口,出口要成功必须有市场,为亚太发展中国家出口提供市场的是工业发达国家,最为显著的是美国市场,因而我们可以说

① 杨水骥、沈圣英:《南朝鲜》,第245页。

② 转引自(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101~102页。

③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 39.

亚太的动力机制是一种依赖性的动力机制。<sup>①</sup> 换句话说,发展理论研究中盛行一时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韩日等东亚国家(地区)得到了成功的验证,但是就此而认为这一策略可以推行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那却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一战略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市场,即谁来吸纳出口的商品。幸运的是,东亚地区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而免费的享有美国提供的市场准入,这一点对东亚地区的发展而言,影响至为深远。

对于韩国而言,这种发展策略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韩国自然资源缺乏的国情所致,更重要的方面在于韩国实行这种出口导向的策略是因为其出口有着可靠的市场,美国及其盟国向韩国开放的市场,对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更为深远。换句话说,要是没有美国的援助,韩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因此,韩国的对外贸易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特征。对外贸易的依附,在早期主要是对美国市场的依附,韩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则表现为对日本资本、技术和对美国市场的依附。

战后初期,韩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就是美国对韩国的援助贸易。可以说韩国的贸易基本上都是依附于美国。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弥补其当时存在的严重的进口过剩现象,韩国经济早就崩溃了。相关的统计表明,韩国在1945~1949年之间进口与出口的比例为7:1,而以美国为主的援助进口数额就占了整个进口量的95.1%;正是由于美国的援助,使得韩国能够度过如此巨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难关;到50年代甚至出现进出口比例逆转现象,其比变为1:11.6,根本原因就在于韩国通过出售

---

<sup>①</sup> 俞正镐:“新兴工业国家的增长与世界经济:韩国的经验”,刊载于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第83~10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美国的援助物质所致,当时美国援助进口的比重占到了80%。<sup>①</sup> 韩国当时的情况十分困难,甚至连国防开支也都指望美国援助物资卖出后所得钱款。在1953~1960年期间,政府约一半的开支来自美援。<sup>②</sup> 因此,此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就是美国的援助贸易。

自从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在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的指导下,韩国的出口发展十分迅速。许多工业部门就是在政府提倡“出口第一”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加大出口的力度,政府不仅提出了许多奖励出口的政策措施,而且禁止某些产品在国内销售,迫使韩国企业一开始就在海外市场而不是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它们的产品。彩色电视机工业的情况就是如此,由于明文规定1980年以前禁止在国内销售彩色电视机,因而彩电生产厂家不得不将其产品销往海外市场。<sup>③</sup> 由此也可见韩国产品对海外市场的依附。同时,这种严重的依附海外市场的贸易格局,也给韩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为了达到出口目标,韩国政府过分关注出口的数量,奖励出口量大的商业而不是有高附加值的行业。这样,出口商没有动力投资于那些需要资本和技术长期投资的制造业部门和中间产品。相反,他们通过进口原料与中间产品来生产以供出口,这就导致了韩国出口部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口的局面。结果,韩国成了既严重依赖出口又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这样,韩国虽然出口从1962年的55百万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350亿美元,但是它的

①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20页。

② Kwang-Suk Kim and Michael Roemer,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P. 42.

③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66页。



进口同期也从 4.42 亿美元上升到 320 亿美元。<sup>①</sup>

在韩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的市场对其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对美国的出口占其贸易总额的 30% 左右,在 1987 年,韩国与美国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峰顶,为 30.6%,1988 年以后逐年下降,1992 年降到 22.9%,从各种因素分析可知,这一比重还将逐步下降,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将仍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韩国与日本的双边贸易,近几年呈逐步上升趋势,从 1984 年的 20.4% (与日贸易额占韩外贸总额比重) 上升到 1991 年的 33.4%,7 年内增长了 13 个百分点。<sup>②</sup>

我们认为韩国对外贸易严重的依附于美日,这从韩国进出口商品的对象国分析可见一斑。韩国商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美、日和西欧,1962 年,韩国向美、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77%;到 1982 年,韩国向美、日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降到 43.6%,但是加上向欧洲共同体的出口额,韩国出口商品对以上三大市场出口占出口总额的 56.7%;不仅出口商品市场严重的依附于美日,就是在进口地区方面,也偏重于美、日两国,如 1962 年、1965 年、1968 年和 1970 年从美、日两国的年平均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37.6% 和 36.3%,仅从美、日进口的商品平均占进口总额的 73.9%;进入 70 年代后,对美、日两国的进口依附仍无明显的减少,如 1972 年、1974 年、1976 年和 1979 年的 4 年中,美、日两国商品的年平均进口额占韩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是 23.9% 和 36.8%,平均共占进口总额的 60.7%。<sup>③</sup> 由此不

①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p. 159 ~ 163.

② 沈圣英主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背景、现状和战略模式》,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4 年,第 162 页。

③ 杨永翥、沈圣英:《南朝鲜》,第 178 页。

难推测韩国对外贸易对于美日的依附性特征了。

根据对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和外事司编的 1970 ~ 1985 年韩国商品出口市场和进口商品来源的资料分析,可知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对于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此期间,其占韩国进出口商品市场的比率最高可达 83.7% 和 87.7%,因此,如果没有美日等开放的市场,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也从方面论证了韩国对外贸易对美日的严重的依附性。详细情况参考下列南朝鲜商品出口市场(表 5.4)和进口商品来源(表 5.5)的统计表。

表 5.4: 1970 ~ 1985 年南朝鲜商品出口市场(占商品出口额的百分比)①

	1970	1975	1980	1985
发达国家	87.7	79.6	64.6	60.0
美国、加拿大	49.4	34.2	28.4	39.7
日本	27.7	25.3	17.3	15.0

表 5.5: 1970 ~ 1985 年南朝鲜进口商品来源(占商品进口额的百分比)②

	1970	1975	1980	1985
发达国家	83.7	73.0	61.7	63.7
美国、加拿大	30.6	27.9	23.6	22.8
日本	40.8	33.4	26.2	24.2

虽然美国和日本对韩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韩国资本、技术、中间产品和经营诀窍的提供者及其产品的吸收者,但是,韩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对美国的依附和对日本的依附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即依赖于美国的市场和日本的技术。林华生曾经这样描述过韩国等“四小龙”对美日依附的情况:“四小龙”

①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和外事司编:《中国台湾省、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南朝鲜、泰国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②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和外事司编:《中国台湾省、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南朝鲜、泰国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88》,第133页。

引进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资本、技术和经营诀窍,生产以家用电器为主的机械及纺织产品,并将其返销至以美国为主的工业发达国家。<sup>①</sup> 这种情形完全适合于韩国的实际情况。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原因,韩国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往美国的市场,这样,韩国的经济增长就在韩国-日本-欧美国家这种三角关系中得以实现。不过这也导致了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极易受美国国内经济景气变动的影 响,从根本上说,这是韩日依附性发展模式的一个结构性缺陷。

韩国对外贸易的依附性,不仅表现在其对美国市场和日本资本与技术的依附,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对既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的依附。对于一个弱小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是不是追求公平,而是能够较为平等享有主导国际体系的国家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只有进入了“国际大家庭”的门槛,才能享受“国际大家庭”的好处。韩国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先后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国际金融公司”等国际贸易及金融机构,并争取成立了“对韩国际经济协议体”,稳定了外资来源。<sup>②</sup> 这一点对于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李相俊分析韩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时,首先强调的是韩国所隶属的国际体系的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所设定的自由贸易基本方向,为我国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给了韩国以很大帮助,不仅如此,国际金融机构还给我们提供资金,以补充资金的不足;某些先进国家给我们提供的信用担保及随着

① (新加坡)林华生:《亚洲“四级”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39页。

②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第182页。

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而引进来的经营经验等,都对韩国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sup>①</sup>由此,可以看出韩国对外贸易的依附性特征。

第三是美国对韩国的军事援助。

军事对于韩国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朝鲜战争中,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干预和美军直接入朝参战,今日世界就不会有韩国的存在。朝鲜战争后,国家的分裂以及来自北朝鲜的经常性的军事威胁,迫使韩国每年要把高达6%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卫,并保持着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sup>②</sup>因此,美国的军事援助对韩国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一方面,韩国需要美国帮助其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援助使得韩国节减了大量非生产性投资,从而将有限的资本投入到生产性领域,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对此,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指出“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军费支出都占GNP的5%左右。但是工业国的军费支出大约是卫生保健经费加教育经费支出的一半,而发展中国家军费同医疗卫生加教育经费的数量大体相等。庞大的军费无疑需要花费很多宝贵的资金,这可能减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sup>③</sup>然而,韩国由于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从而能够保进经济更快的发展。与台湾地区相似,韩国军队也有60万名士兵,军民比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但是,美国支付了韩国的大部分军事支出,因此,台湾的防务支出约占GNP的12%,而韩国仅占4%,显然,如果没有它们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和防务支出,日本的防务支出将

①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5页。

②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12页。

③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25页。

不得不大大超过不足 1% 的水平。<sup>①</sup>

美国之所以承担对韩国防务的责任,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韩国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对抗苏联的需要。韩国对美国来说,不仅是亚洲大陆的东边门户,也是“泰国以东亚洲大陆最后一个非共产党国家”。<sup>②</sup>无论从冷战的角度的美苏对立的战略需要以及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韩国对于美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因此,美国决不肯轻易放弃韩国这块战略要地。

正因为美韩关系对美国来说是如此重要,美国极力营造和维护与韩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对韩国的军事援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将韩国纳入美国为首的东亚防务体系中,如美军驻扎在韩国,协助韩国维护国家安全等;另一方面,美国给予韩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如帮助韩国训练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等。1953 年 10 月,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它规定,为了对付“共同的危险”和发展“共同防御”,美国有在韩国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以及帮助韩国“保持并发展”军事力量的责任,为了扶植韩国从而维护自己的军事和安全利益,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sup>③</sup> 这一系列共同防务条约,虽然说对于韩国的国家安全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阻止韩国遭到北朝鲜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但是它也使得韩国被绑上了美国的战车上,不仅国内的军事力量受到美国的控制,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该有的基本的军事与主权独立,而且还得

①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 73 页。

②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第 139 页。

③ 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7~18 页。

随时听命于美国,作为其在世界争霸的一个马前卒,韩国派兵参加越南战争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

战后东亚地区爆发了两次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越南战争对韩国的作用宛如朝鲜战争对日本的作用,被称为“韩国的埃尔多拉多”,越南战争给韩国提供了60年代末外汇收入的20%。<sup>①</sup> 韩国卷入越战更为直接,战争结束前,曾经派出30多万的军队,这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国)派出的人数都多;从总量上来看,美国所付的设备和人员费用与同样数量的美国人相比只是一个“花生米”;但这已资助韩国走上了起飞之路,因参与越战,韩国直接接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达10亿美元以上。<sup>②</sup> 除了直接的军事援助外,韩国收到美国的军事订单对于韩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巨大,随着美国战争机器的运转,美国资本和资源援助滚滚的流向韩国和日本等东亚地区。虽然说,朴正熙在1965年初1966年派军队去越南参战是为了解决内部的财政困难,以便从美国那里获得约10亿多美元的军事补偿和贷款,但是,这一军事行动本身对韩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着很大的影响。美国一手训练、装备起来的韩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表现出的战斗力,震动了当时西方世界,被西方报刊吹嘘为“辉煌的”、“眩目的”。<sup>③</sup> 无论其赞誉之词多么的夸大,其背后隐含的一个事实没有改变,即韩国军事力量完全依附于美国,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军事装备。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在1962年到1969年期间,给韩国的军事援助就达25亿多美元,美国的

①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83页。

② J. Woo,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pp. 93 ~ 94.

③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第126页。

军事“保护”与援助,既支撑了朴正熙独裁政权,又减轻了韩国的军费负担,使韩国内部政局得以维持相对稳定,并能腾出较多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sup>①</sup> 即便美国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缓慢,财政赤字严重而决定从韩国撤出美军第七师,仍然没有忘记首先“安排”好韩国的军事发展计划,“韩美两国在1971年1月中旬之前的几个月间,不间断地举行了高层军事会谈,认真磋商的结果,韩美双方达成了协议,内容是由美方提供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军事贷款,韩方负担46%的费用推进韩国军队现代化五年计划;1971年3月27日,美军第七师在举行撤离仪式后撤出韩国。”<sup>②</sup>韩国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相反韩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因此加快了。

对于韩国这样一个战后经济落后,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欠发达国家,能够减少军事等非生产性开支,无疑就意味着在生产性领域投资的扩大,美国的军事援助对于韩国经济发展正是起到这样的作用。正是由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减少了韩国的军费开支,使韩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积累起一部分投资资金。1953~1957年,韩国将近100%的固定投资来自美援;1958~1960年,国内也只能积累起GNP的10%用于投资,来自援助的投资仍占80%以上。<sup>③</sup> 美国给韩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表面看来,这与韩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在韩国驻扎军队,大大减少了韩国财政支出中的军费开支,从而能够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

①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第140页。

② (韩)金正濂:《韩国经济腾飞的奥秘——“汉江奇迹”与朴正熙》,张可喜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③ Edward S. Mason and other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pp. 194 ~ 195.

它与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没有什么质的区别。<sup>①</sup>

因此,美国对韩国的军事援助,不仅维护了韩国的国家安全,给韩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而且对于韩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莫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是美日对韩国的技术援助。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韩国这样一个资源缺乏、太多依附国际市场的国家而言,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增加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索洛用“余值法”测定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后,人们更加确认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地位,从而根本了人们的发展观,并推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转变。<sup>②</sup>

由于韩国的殖民地经历以及战争中经受的毁灭性打击,因此,韩国经济发展的技术基本上依靠从国外引进。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其对技术的需求也日益加速,自 60 年代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以来,从国外引进技术的规模也日益增加。一五期间,韩国只引进 33 项技术,到六五(1987 ~ 1990)期间,韩国引进的技术数目已经高达 2889 项。随着技术引进项目的增加,技术转让费用也有了大幅度上升,1962 ~ 1976 年技术转让费为 1.136 亿美元,六五计划的 1987 ~ 1990 年就已经达到了 31.756 亿美元,其增长速度之快是超出人们意料的。详细情况参考下表(表 5.6):

① 吴春波、郭国庆:《成“龙”的奥秘:韩国经济起飞透析》,第 14 页。

② 杜方利:《东亚经济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年,第 173 ~ 174 页。



表 5.6: 1962 ~ 1990 年韩国技术引进规模统计(金额单位:百万美元)①

	一五期间	二五期间	三五期间	四五期间	五五期间	六五期间	合计
项目/个	33	285	434	1225	2078	2889	6944
金额	113.6			451.4	1184.9	3175.6	4925.5

对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企图在技术上进行自主研发,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因此,从国外引进技术就成为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这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发达国家是否愿意转让技术;二是支付引进技术的费用从哪里来。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引进方面所面临的两个桎梏,但是,韩国却轻易的迈过了这两个门槛,一方面,由于它被纳入了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内部,成为了“自己人”,所以不仅能够从美日引进所需要的技术,而且美日还免费转让了许多技术给韩国;另一方面,韩国不仅从美日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而且较为方便的得到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所提供的贷款,这一切都使得韩国能够支付技术转让的费用。

本文认为韩国在技术上严重的依附于美日两国,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验证。一方面就是从引进技术的来源国看,韩国引进的技术主要来源于美日;另一方面,从韩国为引进技术而支付的金额也可以看出韩国主要是从美日引进技术。据统计,在 1962 ~ 1990 年间,韩国从海外引进了 6944 项技术,其中从日本引进的技术有 3536 项,占 50.9%,美国为 1826 项,占 26.3%,美日两个国家合起来共占 77.2%;李相俊由此而感慨道“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国家在技术上对美日两国的依赖程度最大,共占韩国技术引进总量的近 80%”;从技术转让的数目来看,日本

① 韩国产业技术振兴协会编:《1990 年技术引进年度报告》(1991),第 42 ~ 43 页,第 52 ~ 53 页;《每日经济新闻》,1992 年 3 月 24 日,转引自(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 255 页。

占 50.9%, 超过一半, 但支付的转让费却没有美国多 (美国占 46.5%), 这说明, 韩国从美国引进的大型项目要比日本多, 从技术转让费数额看, 总额为 49.255 亿美元, 美日两国比例最高, 共占 77.7%。<sup>①</sup> 另外, 根据林贤真对 1962 ~ 1979 年间韩国从美日引进的技术所作的分析来看, 结论完全支持上述的观点, 即韩国在技术上严重的依附于美日。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表 5.7):

表 5.7: 1962 ~ 1979 年韩国从美日引进的技术 (单位: 项)<sup>②</sup>

年份	美国	日本	总计
1962 ~ 1971	13	10	31
1967 ~ 1971	58	197	276
1972 ~ 1978	211	509	903
1979.6	20	64	107
总计	302	780	1317
所占比例 (%)	22.9	59.2	100.0

另外, 从引进技术的部门看, 截至 1981 年底, 机械部门引进技术 582 项, 占总引进项目的 29.5%; 电气和电子部门引进 359 项, 占 18.2%; 石油化工部门引进 344 项, 占 17.4%; 金属冶炼部门 179 项, 占 9.1%; 韩国的技术引进依赖日本的程度较深, 尤其在机械设备方面, 从日本引进的项目占设备引进总项目的 56.9%, 从而增加了产业设备被置于日本从属地位的可能性。<sup>③</sup> 机械、电子电气等部门是韩国出口的重要部门, 然而韩国却要从国外进口技术, 足以见其经济发展的依附性一面。

其实, 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援助不仅有直接的、有形的援助, 那些潜在的、间接的因素同样对韩国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正如布热津斯基分析的那样, “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

①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 257 页。

② (韩)林贤真:《韩国的依附发展, 1963 ~ 1979》, 汉城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转引自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 第 25 页。

③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 第 187 页。

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sup>①</sup>，韩国的情形也是如此，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美国在许多领域对它的“准入”，韩国正是合理的利用了这些国际体系的规则才获得迅速的发展。例如，较为便利的加入国际组织、能够大量进口廉价的原材料等等。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只有在美国的允许下才能获得，而韩国由于独特的地缘政治的作用，使得它在依附于美日为首的世界体系中天然的获得了经济发展所必须得基本要素，从而避免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等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此说韩国的发展是一种依附性的发展。

在五十年代，即使对韩国最友好、最有远见的观察家，也不对它的发展寄与较大的希望；甚至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很有见地的约瑟夫·里德将对韩国的看法概括为：“这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只有发生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再加上正确的决策和艰苦的努力，才能取得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活力”；瑞典著名作家黑克·赫德伯格也对韩国发展经济的努力大泼冷水。他尖刻地指出：“毫无前途，一切都就此终结了。”<sup>②</sup>但是，当国际形势的变换导致韩国在依附于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时，它却给世界一个奇迹，成为“经济发展的楷模”。

## 二、依附性发展与韩国的经济变迁

布热津斯基曾经将欧亚大陆看成是一盘棋，东亚在其中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根据实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243页。

② (美)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崛起》，第2页。

力的新现实调整我们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sup>①</sup>正是由于韩国作为美国在“远东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在美国的地缘政治中占据的特殊地位,所以韩国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从而使韩国在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取得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迁。

韩国经济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朴圣相在 1988 年的演讲中形象的对比了最近几十年来韩国社会发生的变化,“1961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21 亿美元,今天则达到 1200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961 年为 82 美元,今天则为 3000 美元;1961 年我国的出口总值不过 4100 万美元,今天则达到 500 亿美元,增加了一千倍以上”。<sup>②</sup>

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正是因为韩国依附于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它的发展才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首先就表现在韩国的经济发展方面。依附性发展导致韩国经济领域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与总量。

朴正熙上台后曾经说过:“对于像韩国这样贫穷的人来说,他们是在生死的边缘挣扎,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济问题高于政治问题,强调民主是没有意义的”。<sup>③</sup>这样,推动经济发展既是朴正熙对他的选民的允诺,也是其执政时期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从 1953 到 1961 年期间,韩国在美国的大规模援助下,经济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49 页。

② (韩)朴圣相:“南朝鲜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第 227 ~ 228 页。

③ 朴正熙:《国家、革命和我》,第 259 ~ 260 页,转引自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 100 页。

逐步的稳定下来并且极为缓慢地恢复;1962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发展动态曲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此后,韩国就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sup>①</sup>,开始了它吸引了全世界注意力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韩国经济的这种依附性发展最特出的表现在韩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方面。

从1960年代以来,韩国的国民经济从数字上看发展较快,1982年与1962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将近13倍,从1962年到1982年的21年期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加到1671美元。<sup>②</sup>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5至1987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4%,在58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地区中,仅次于博茨瓦纳(8.9%)、阿曼(8.0%)和新加坡(7.2%)而居第四位。<sup>③</sup>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速度可见一斑。

1962年是韩国实施经济开发计划的第一年,该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3亿美元,1966年达36亿美元,1971年达到90.9亿美元。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72~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由102.8亿美元增加到232.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1.2%。1980年达到576.51亿美元,1985年达到883.65亿美元,1988年达到1561亿美元。强大的经济实力为韩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确立了重要的地位。以1987年资料为例,当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86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7位;对外贸易额为882.99亿美元,名列第10位,其增长速度在亚洲“四小龙”中也是最快的。其中,出口占世界出口贸易的1.9%,列第13位;进口占世界进口贸易的1.6%,列第16位;经常收支盈余达99亿

①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10页。

②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第151页。

③ 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64~165页。

美元,名列世界第4位。<sup>①</sup>到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2963.49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127倍。同一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加到6790美元,30年间增长了78倍;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90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7.1%,该增长率居于同期世界各国的首位。<sup>②</sup>

其次是产业结构的变迁。

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国民经济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既是韩国依附性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是韩国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方面。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出的表现为如下的几个方面:

韩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方面,即逐渐的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

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时,韩国是个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国家,劳动力人口的三分之二从事农业生产,为数不多的轻工业企业基本上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基础薄弱,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技术落后,工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很低。1948年的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只分别相当于1940年的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21%和72.4%,如以1945年的物价指数为100,1948年的物价指数上升到1060。<sup>③</sup>不仅如此,朝鲜战争使得韩国的工农业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援助下,韩国经济逐渐地稳定恢复,但是,在50年代,韩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1953~1961

① 吴春波、郭国庆:《成“龙”的奥秘:韩国经济起飞透析》,第26~27页。

② 《东亚日报》(韩),1992年9月3日,引自韩国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编著《韩国经济发展论》,第18页。

③ 韩国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编著:《韩国经济发展论》,第2页。

年间农业和渔业在 GDP 中的比重为 40%，而制造业的比重为 13%；自 60 年代早期以来农渔业的比重迅速缩小到近几年的约 9%，同时，制造业的比重从 50 年代的 13% 上升到近几年的 30%。气、电、水等公用事业以及建筑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服务业在 GNP 中的比重从 41% 扩大到 46%。<sup>①</sup>

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各个产业的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 1962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43.3%、11.1% 和 45.6%，到 1981 年分别变成 18.3%、35.9% 和 45.8%。<sup>②</sup> 到 1991 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 GNP 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7.7%、29.7% 和 62.6%，<sup>③</sup>农林渔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突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的同时，扩大了服务产业的规模。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亦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如：60 年代将近 70%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林渔，到 1970 年从事初级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比率降到 50%，同期该部门所创产值尽管按实际价值计算年均增长率达 7.7%，但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却从 37% 降到 25% 多一点；从 1970 年到 1980 年，经济增长率与前期差不多，但初级产业的产值却进一步降至 15.1%，同期从事这一行业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亦从 50% 降为 34%。<sup>④</sup> 韩国从 1971 ~ 1984 年间各产业贡献度的变化正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又一明证。详细情况参见表 5.8。

① (韩)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第 24 页。

② 杨永骞、沈圣英：《南朝鲜》，第 153 页。

③ 韩国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编著：《韩国经济发展论》，第 18 页。

④ 俞正镐：“新兴工业国家的增长与世界经济：韩国的经验”，刊载于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第 83 ~ 105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84 页。

表 5.8: 1971 ~ 1984 年韩国各产业贡献度的变化<sup>①</sup>

贡献度顺序	1971 ~ 1975	1976 ~ 1980	1981 ~ 1984
1	纤维	纤维	电气、电子
2	石油精炼	石油精炼	运输设备
3	食品	钢铁冶炼	纤维
4	电气、电子	食品	食品
5	产业用化合物	电气、电子	钢铁冶炼

我们知道,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条件,从上面对有关资料的的分析来看,韩国在这方面无疑做的是比较好的。

因为韩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国家,所以它的工业化的过程与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工业化促进了出口商品的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也对国内产业的结构调整产生了促进作用。

因此,韩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第二个方面就表现为出口商品结构的变迁。

出口或对外贸易对于韩国经济的贡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宋丙洛对 1963 至 1973 年间的经济增长进行评估后认为,“部门生产中所发生的最大的、毋庸置疑的变化与其说是由国内的最终需求(31%)造成的,不如说是由出口(33%)造成的;我们还可运用另一种多少有点不同的方法,世界银行最近对增长的需求方面的原因进行评估的结果表明,1980 至 1983 年间,制造业中产量增长的 32.9% 是由于出口的原因引致的,这要比投资(19.8%)的作用大得多,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经济增

<sup>①</sup> 资料来源:《韩国尖端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山东省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编译,时事出版社,1993 年,转引自刘旭明编著:《韩国经济发展之路》,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56 页。



长是由出口带动的,而不是由投资带动的。”<sup>①</sup>

因此,出口商品增长的速度和结构的变迁对韩国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1960年,韩国在全世界出口大国中的位次是第101,自60年代开始,出口增长的速度上升到20%~40%,这种高速度一直维持到70年代末,几乎没有发生过波动。而今天它也已跃居为世界的第13位出口大国;在1960~1983年期间,其平均出口增长率是日本的两倍。<sup>②</sup>由于韩国出口增长迅速,其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62年的0.05%上升到1983年11月底的1.27%。<sup>③</sup>出口对韩国经济的作用正如安德烈·莫门所分析的那样,“韩国出口的成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解释,到1960年,出口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外汇靠外援供给;但是,在1961到1973年间出口量以每年35%的速度递增,占GDP的比例从不足1%增加到24%……最初出口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农渔业产品,但在过去的30年中,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已从12%增加到95%;制成品的构成也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更先进的电子、汽车、机械产品过渡;美国仍然是最重要的出口地,而直到最近日本还是进口的主要来源。”<sup>④</sup>

自从1960年代韩国推行“出口第一主义”,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出口商品的结构就发生了明显的有规则的变化。

---

①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74页。

② 世界银行国别研究报告:《南朝鲜工业的过渡性转变》【本报告是根据1985年8月和12月访问汉城的小组报告而撰写的,作者是D. M. Leipziger(小组负责人),Y. J. Cho, F. Iqbal, P. Petri和S. Urata等】,石京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③ 杨永骝、沈圣英:《南朝鲜》,第175页。

④ (智)亚历克斯·E.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比)安德烈·莫门主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制度和经济变迁》,第40页。

韩国 60 年代初期的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如丝绸、钨以及鱼和鱼产品为主,制成品的出口所占比重极低。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发展,制成品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初级产品(农产品、海产品和矿产品)在全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例,1962 年为 73%,1974 年则降为不到 10% 了,1987 年这个数字又进一步降低为 5%。<sup>①</sup>

随着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制成品的主要种类也发生了变化。60 年代,主要的制成品是胶合板、假发和针织(毛)套衫等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这些商品所依赖的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技术;70 年代,主要的出口商品变为纺织品、船舶、钢板等类产品,生产这些商品所依赖的是资本和较为复杂的技术以及劳动;80 年代初期,出口商品又变成资本更加密集的产品;1986 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的制成品出口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变为计算机、半导体、彩色电视机、汽车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sup>②</sup> 这表明韩国经济已经从战后初期靠出口初级产品向高精尖等高科技产业发展。

正如有的学者分析的那样,韩国等“四小龙”充分利用其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保持有的特殊关系,不仅充分利用和发达国家缔结的双边贸易协定和英联邦的贸易特惠制度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也享受普惠制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从而给它们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提供了重要保证。<sup>③</sup> 正是在依附于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韩国经济才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其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在 1988 年韩国产业研究院的一篇

①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 112~113 页。

②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 114 页。

③ 巫宁耕编:《亚洲“四小龙”的致富之路》,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年,第 44 页。

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报告对韩国“综合国力”作了全面的分析评价。报告认为,由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基础、防卫能力及国民意识等决定的“国家生存能力”,韩国为美国的 16%,日本的 35.6%;由军事力量、战略物资、技术、经济实力及外交能力决定的“国际影响力”,韩国为美国的 4%,日本的 14%;由经济、金融、科技、劳动力等要素决定的“国民经济基本实力”,是美国的 4%,日本的 10% 弱;“对外政策推行能力”为法国的 50%,日本的 70%。<sup>①</sup> 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只有 9.92 万平方公里,不及中国的江苏省,只相对于日本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强,与美国相比也只有加利福尼亚的四分之一,而且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而言,就其“综合国力”讲,大约为美国的 20%,日本的 50% 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 三、依附性发展与韩国的社会变迁

依附性发展不仅带来了战后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在社会领域也给韩国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可以说,韩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进行着剧烈的社会变迁。战后韩国依附性发展给社会领域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依附性发展带来的韩国社会变迁首先表现在城市化方面。由于城市与乡村相比,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社会服务更多,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化是社会领域变化的一个重要指示器。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的速度很快。在 1960 年,韩国城市化水平仅为 22.5%,而 1987 年已提高到 68.7%,而且可望最终达到 75% 左右,即达到诸如日本和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现在的水平(1987 年,19 个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城

<sup>①</sup> 转引自吴春波、郭国庆:《成“龙”的奥秘:韩国经济起飞透析》,第 27 页。

市化水平是75%),1960年至1988年,韩国非农户在全部家庭中占比例由46.4%迅速提高到了82.6%。<sup>①</sup>

1960至1987年间,居住在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地区的韩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28.5%增加到68.7%;如果把城市地区扩展到包括人口在2万以上的城镇,那么,目前韩国全部人口的3/4以上居住在大城市和中等规模的城市和市镇中,城市和市镇的数目也随之大增。<sup>②</sup>

第二,社会分配相对公平,人民生活水平等到很大的提升。现代发展理论研究表明,许多国家的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分配不公,相对贫困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通常是人民苦难的历程。然而,韩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却相对减轻或避免了剧烈的社会变迁给国民带来的苦楚。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长达390页的报告中,在肯定韩国等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时,特别提出它们在增进社会公平方面大有进展,如韩国20%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是20%最贫穷家庭收入的8倍,而在巴西和墨西哥,这一比例至少是20倍。<sup>③</sup>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增长情况不太平衡,如,汉城、釜山、京畿道和庆尚道等有大规模工业区的地区,收入增长得很快,而工业较少的江原道、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等地区收入增长则较慢;1977年平均每人的收入最高的汉城市同最低的江原道相比,汉城市的平均每人收入约为江原道的两倍。<sup>④</sup>这虽然是韩国社会领域改革不太成功的一面,但是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

①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160页。

②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78页。

③ 俞新天:“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及其世界意义”,刊载于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第30-4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4-35页。

④ 张世和主编:《战后南朝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07页。

相比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正是因为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的相对公平,使得大部分人都能够从发展中得到好处。因此,韩国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韩国还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她的人民能住上简陋的房屋,吃上粗糙的食物就算是万幸了,除此他们是一无所有;人们在没有饭吃的时候,露宿街头或出外乞讨的情况也并非鲜为人知;数年一次的粮食歉收便足以使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将会多么艰难。<sup>①</sup> 然而到了 80 年代,韩国人的生活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的生活更加城市化,并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消费品。家庭收入中用于生活必需品支出的比例锐降。例如,1965~1988 年间,家庭收支预算中食品和饮料的支出所占比例由 62.3% 降为 38.7%;饮食质量也大有提高,肉、鱼、奶制品和水果较从前多多了;更多的人喝上了自来水并享受医疗保险;现在步行的人少了,自己开车或乘坐汽车的人多了,公路的等级也提高了。<sup>②</sup> 据统计,从 1960~1983 年,韩国人在住宅通电,人均拥有的小汽车、收音机、电视机、报纸等方面有了极大的提高。具体情况参见表 5.9。

表 5.9: 1960~1983 年韩国的社会指标<sup>③</sup>

	1960	1970	1981~1983
住宅通电百分比	28.4%	49.9%	-
小汽车/千人拥有量	0.5	1.9	6.5
收音机/千人拥有量	31.2	124.4	432.2
电视机/千人拥有量	0.3	13.0	174.1
报纸/千人发行量	68.2	136.3	192.1
每人每年看电影次数	4.1	5.2	1.1

① (美)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崛起》,第 200 页。

②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 192 页。

③ 世界银行国别研究报告:《南朝鲜工业的过渡性转变》,第 117~118 页。

第三,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下降,而居民文化设施发展迅速,详细情况参见表 5.10:

表 5.10: 1975 ~ 1983 年南朝鲜居民文化生活设施<sup>①</sup>

	1975	1980	1981	1982	1983
出版书籍总数	10921	20978	25747	30436	35512
翻译书籍	214	389	363	-	-
报纸种数	37	31	29	29	-
报纸发行数(万)	601.0	-	-	756.3	-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均 GNP 大幅度提高的背后,是韩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大的提高。在 1983 年,韩国每百户拥有的冰箱和洗衣机分别为 37.8 台和 17.8 台,而到 2000 年将分别达到 91 台和 88 台;1988 年的住宅普及率达到 67.7%,这一切现象都表明,韩国现今的人均 GNP 水平已经使居民跨入大众消费时代;此外,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必然会带来其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到 2000 年高中和大学升学率将分别达到 95% 和 77%。<sup>②</sup>

据 1997 年的数据表明,韩国总人口居世界第十一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73.6%,人口增长率为 0.91%,平均寿命为 71.6 岁,平均每户 3.8 人。<sup>③</sup> 这些指标充分说明了韩国已经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韩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得韩国人享受到具体的社会进步的成果,而且使韩国人在精神面貌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更多了一些自信。朴圣相院长演讲中提到,“你们知道美国国务院现在对

①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和外事司编:《中国台湾省、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南朝鲜、泰国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88》,第 143 页。

② 吴春波、郭国庆:《成“龙”的奥秘:韩国经济起飞透析》,第 29 页。

③ 李树藩、王德林:《最新各国概况(1997 年版)》长春出版社,1997 年,第 178 页。

朝鲜人是怎样描写的吗？它说：‘朝鲜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工人’，而不是25年前所说的“最懒惰的人”了。”<sup>①</sup>美国是这样评价韩国人的，韩国人自己也对本国的社会发展较为满意。在韩国的社会统计调查和中央日报每年举行一次抽样调查中，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数的比例逐年上升。据1980年的社会统计调查，抽样人口的41%自认为属于中层阶级；1985年这一数字为53%，若把自认为属于低收入阶层上层的人包括在内，则1980年此比例上升到55%，1985年上升到67%；类似结果还可以从其他调查中找到，例如，中央日报每年举行一次抽样人口为1500名成年韩国人的“国民社会生活民意调查”，从中发现，自认为属于中层阶级的人的比例，1985年为58%，1986年增至60%，1987年又增加到61%，表明人们的中层阶级意识在不断增强。<sup>②</sup>因此，不能不说韩国的依附性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第三节 韩国依附性发展的评价

韩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不仅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也膨胀了韩国人盲目乐观的心理，当韩国叫嚣着力图将韩美之间的关系由垂直的依附转为平行的同盟时，它忽视了其经济依附性的结构问题。在韩国人看来，大约从1986年起，韩国在储蓄、管理人才、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方面基本上都做到了自给自足；同一时期，韩国的国际收支也由逆差转为顺差，当韩国同她的主

① (韩)朴圣相：《增长和发展：实物生产和就业增加的战略》，第228页。

② (韩)中央日报：《国民社会生活民意调查，1985、1986年和1987年》，转引自(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191页。

要贸易伙伴实现了贸易顺差时,她同美国之间的受援国和赠予国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因此,她不再为其外债担忧,也不再依赖先进国家的援助。<sup>①</sup>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韩国经济根本不可能获得发展,即使今日韩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的增长,它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据统计,韩国作为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人均实际产出只有美国的一半,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美国相比相差甚远;韩国实际每小时工作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96年美国水平的46%。<sup>②</sup>换言之,韩美之间的增长质量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韩国在战后的发展是一种依附性发展,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这种依附性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是其发展的一面,一是其依附的一面。上文已经详细的论述了韩国依附性发展中发展的方面,本节将着重分析韩国依附性发展战略中依附的特性,虽然韩国加入了经合组织,跨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构方面,韩国仍然是一种依附性发展的结构。

本文之所以认为韩国仍然是一种依附性发展,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几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韩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依附性地位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我们上文已经论述了韩国的发展是在依附于美日的同时所取得的。

经过独立后政治经济的混乱和朝鲜战争的巨大灾难,韩国经济的幸存多少是依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此,外国援助不仅决定李承晚政权的发展策略,而且决定韩国在1950年代整

①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2页。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编:《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10月),杨芳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sup>①</sup>从全球的观点来看,韩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一个遥遥领先者。但是这种经济上的成就并不能更改韩国在国际格局、国家防务以及世界贸易中的依附地位,正如赵淳所分析的那样,“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这个国家按照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繁荣,即使目前的形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的时期大不相同了,但国家的发展将继续依靠一种自由贸易体制。”<sup>②</sup>问题是这种促使韩国高速发展的国际经济体制并不是韩国所主导的,韩国在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体制中并不是处于对等地位置,而是受美国的国际战略的支配;冷战时成为“前沿哨所”,冷战结束后,又成为美国欧亚大陆政策的“棋子”。在美国人看来,韩国越来越强的经济力量也使它本身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空间”,控制这块空间越来越有价值。<sup>③</sup>事实上,韩国顶多是美国的一个“工具”,而且是被美国随意摆动的“工具”。事实上,是美国决定了韩国的出口导向战略。爱德华·梅森和他的助手说,美国“基本上主宰”了韩国的改革计划;伊恩·利特尔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压力是“经济史的因果关系中最清楚的一环”。<sup>④</sup>这一切无疑表明了韩国发展本质上的依附性。

韩国的发展是借助于美日的力量,但是,其从美国和日本引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设备和原料的同时,它在经济上对美日

---

① Edward Mason and Other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P. 182.

② (韩)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第185页。

③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64页。

④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75页。

的依附也进一步加深了。而且这种依附将持续下去,据韩国在1978年的有关分析表明:日本对韩国如全部停止政府借款、大量减少民间借款和降低贸易额的10%,韩国经济的增长率将降低一半;日本对韩国如全部停止政府借款和民间借款,并降低贸易额的20%,韩国经济的增长率将出现“零”或负增长。<sup>①</sup>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韩国在同日本“邦交正常化”以后的十几年间,经济上对日本的依赖已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韩国依附性发展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韩国利用了它所隶属的国际体系的种种优势,一方面,韩国利用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而能够享受到1968年第二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通过的发达国家实施普遍优惠制度的协议,根据这一制度,发达国家将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以普遍的、非歧视的和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待遇;<sup>②</sup>另一方面,韩国利用其地缘政治的优势,从美日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种种发展的便利。这种便利条件最典型的莫过于资本和资源,在梅瑞狄斯看来,源自美日的经济援助,不仅促进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和政体稳定;还大大推动了资本家通过非竞争性方式获得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的分配,获得银行贷款、援助资金和物资,以及通过非竞争性的方式参与经济复兴,得到政府补贴和美国军事合同;<sup>③</sup>同美国站在同一个战壕中,则能够分享美国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廉价的石油资源,这对韩国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因为石油价格每下降1个美元,进口费用就能节省大约2美元。<sup>④</sup>这就是体系自身所创

①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第257~258页。

② 巫宁耕编:《亚洲“四小龙”的致富之路》,第44页。

③ 梅瑞狄斯:“东亚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市场和意识形态的透视”,刊载于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第388页。

④ 世界银行国别研究报告:《南朝鲜工业的过渡性转变》,第15页。

造的潜在优势。甚至到了1960年代中期,美国虽然对韩国和台湾的直接援助停止了,但PL480粮食和其他支援品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两个地区;从1951~1974年,韩国接受了8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大多数属于PL480方案,美国剩余农产品对保持韩国和台湾的低工资至为重要。<sup>①</sup>这对韩国经济的起飞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因故不能侧身于体系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家所无法想象的。

当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时,韩国首先遭到冲击。因此,在1997年危机中,关于“东亚国家是否要进行基础的经济变革以重新获得强有力的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之间产生了分歧”,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至少,人们已经认识到韩国这一依附性发展所潜伏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鼓吹改革的人包括金大中,他在1985年用英语写了一本书,指出韩国经济体制的问题以及需要像政治改革一样进行经济改革。”<sup>②</sup>最典型的情况莫过于1970年代早期远东地像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尼克松访问中国并结束了“老的”冷战,以及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决定从韩国撤退部分美国的驻军),使得朴正熙感到十分恐惧,因此决定增强韩国自身的军事力量,可以说,这一促进韩国钢铁和化学工业发展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防务考虑的影响。<sup>③</sup>从这里可看出韩国依附性发展的结构深受国际环境的

---

①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83~84页。

② Martin Neil Baily; Eric Zitzewitz, “Extend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Microeconomic Evidence from Kore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8, PP. 249 ~ 322.

③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P. 133.

影响。

冷战的终结使得韩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国际之间的竞争已经由武力的对抗转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美国一旦改变其以经济让步换取政治支持的对外策略,韩国首先就体会到国际环境变换的压力。美国为了削减对“四小龙”的贸易逆差,决定将“四小龙”排除在普惠关税制(GSP)之外,这一措施自1989年1月1日生效。<sup>①</sup>韩国的压力或危机立刻降临。正如李相俊所说的那样,“进入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先进国家不仅纷纷取消了对我国出口商品所给予的各种贸易优惠条件而且还加强了对韩国商品的进口限制;这样一来,由于各先进国家出口开放政策的压力,我国进口商品市场的压力就显得很大……由于这种国内国外环境条件的变化,出口企业自己想办法培养自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成了当务之急。”<sup>②</sup>韩国长期以来的“免费午餐”面临挑战,而这一切正是因为韩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依附性地位所致。

其次,韩国在贸易和技术上严重的依附于美国和日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之间彼此互相依赖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正如基辛格在1974年所强调的那样:“在当今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中,如果有什么需要加以阐明的话,这就是能源;”此后,他又进一步强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传统的国际结构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世界在经济、电讯以及人们的行为领域变得相互依赖了”。<sup>③</sup>由此可见,各国在能源、经济、电讯等社会领域都存在着互相依赖的情形,就连发达如美国也

① (新加坡)林华生:《亚洲“四级”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41页。

②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6页。

③ 张蕴岭:《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页。

不能例外。

但是韩国在贸易和技术上对美日的依附已经不是一种正常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是深陷其中,这种依附正如普雷维什所定义的那样:“关于依附性,我指的是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受制于中心国家的决策,这不但在经济事务上,而且对政治事务以及内、外政策的战略;其结果是,由于外部的压力,这个国家不能自主地决定它应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结构变革导致对这一现象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以及对自主性的期望就是对这个制度重要了解的组成部份。”<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在贸易和技术上已经失去了主导权,深受美日的控制。正是因为这种依附性,使得韩国“在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乎整整10年内,韩国的所有进口,都是由美国的援助转让基金或军事援助资金提供融资助;许多评论家认为,虽然韩国获得了大量的外援,但由于未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sup>②</sup>因此,麦金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并不看好韩国的发展前景。

韩国贸易上的依附性一方面表现在韩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过高;另一方面表现为严重的依赖于美日市场。所谓贸易依存度也就是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结合值,据统计,韩国的贸易依存度表现出了逐渐上升的趋势,贸易依存度在1972年以前是停留在20%~40%水平上的,而到了1973年以后,就上浮到了50%,1984年,竟上升到了73.9%;如果我们把韩国1984年的贸易依存度和其他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除荷兰和台湾比韩国高以外,其他国家都比韩国低,特别像

① 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的动力”,转引自高钰:《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第39页。

② (美)R. I. 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穗译,上海三联,1997年,第121页。

美国这样的国家,虽然在世界贸易市场所占比重很大,但由于国内经济规模十分庞大,所以,它的贸易依存度就显得比例很小,仅占 15.2%。<sup>①</sup> 正是因为韩国的贸易依存度过高,所以特别容易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林华生看来,韩国等“四小龙”严重依附于美日,它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将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市场需求与日本的资本及技术巧妙地结合起来而得以实现的”。<sup>②</sup> 因此“四小龙”向欧美的出口越多,对进口日本资本及技术的依赖性也就越强。

因为韩国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国际环境导致了韩国成功的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也使得对外贸易在韩国经济中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似乎整个国家都在为出口而生产。在 1961 年,韩国的内需日用工业品产量和出口工业品产量的比例是 15.7 比 1,到 1978 年则变成了 1.8 比 1,内需工业品产量相对减少了近 7 倍,一切让位于出口;而且对外贸易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大,1977 年到 1981 年 5 年期间,韩国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平均 65%,其中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平均达 29.2%。<sup>③</sup> 另外,韩国出口贸易的 70% 以上销往美国、日本和西欧市场,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波动直接影响到韩国的经济。这就是因为韩国对外贸易过度的依附于美日所致。

世界发展的关键是传播新技术,新技术可以使资源利用更有效,使收入有所增加,生活质量有所改善。而贸易是推广技术的关键因素,虽然保护主义有时能刺激经济的发展,但许多国家

①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 52 页。

② (新加坡)林华生:《亚洲“四级”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第 46 页。

③ 杨永骞、沈圣英:《南朝鲜》,第 217 页。

往往是在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时比处于闭关自守状态下发展更快。<sup>①</sup> 这一点在韩国经济发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韩国通过从美日引进技术,生产出来的商品再返销到美欧市场,从而促进韩国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年来韩国的技术有所进步,但就目前情况看,还仍然停留在利用中等技术进行加工生产并予以出口上,因而对海外技术的依赖还是比较大的,这样,探索一条摆脱单一加工出口型的新路子,就成了目前的当务之急。<sup>②</sup>

韩国在技术上对于美日的依附,不仅表现在目前生产领域技术上的依附性,而且在技术开发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也是很大的。例如,技术开发以美国为 100,日本则为 55.98,德国为 39.82,法国为 32.47,而韩国仅为 4.47;在韩国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组装、加工技术达到了发达国家的 76%,但是生产其他产品的技术却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sup>③</sup> 因此,韩国生产技术虽然已经超越了后进国的水平,达到了中等程度,但其比较重大的尖端技术依然要依赖于从国外引进,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对技术开发投资不够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几年来先进国家对技术转让都持谨慎态度,使得韩国尖端技术的引进变得十分困难。<sup>④</sup>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时,需要技术的革新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向前,但是韩国技术的自我研发力量薄弱,因此,韩国只得付出巨额的费用从国外购买技术。虽然韩国为此支付了巨额的技术转让费用,但就在这种情况下,韩国还是坚持了技术引进政策,从这里不难看出,韩国对海外先进技术的依附性十分严

①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14页。

②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1页。

③ 刘旭明编著:《韩国经济发展之路》,第20页。

④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8页。

重。从1989年到1993年,韩国从海外引进技术的投资额和国内研究开发投资额相比,其资金约占研究投资的26.5%,这和1981年到1988年期间的21.5%相比,提高了6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把相当于研究开发费用近1/4的钱奉送给了先进国家;与此相反,美国在1988年用于引进先进技术的费用却只占研究开发费的1.6%,日本在1987年也只有6.1%,西德在1987年仅占5.9%,英国也只占7.1%;从这种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韩国在海外技术的引进上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sup>①</sup>

正是因为韩国技术的研发力量薄弱,所以其技术的国产化较低,重要技术主要靠从先进国家引进。而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为了杜绝“飞去来器效应”,对于韩国所需技术的提供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只提供中等技术,不提供先进技术,只提供制造机械设备的部分技术,不提供制造这些机械设备的全部技术,严重地影响了韩国出口产业的发展。<sup>②</sup>而且使得韩国技术国产化率比较低,1989年对相关产业技术国产化率调查表明,彩电占69%,晶体管电视机占70%,微型摄像机占49%,大型录像机占45%,组合音响占66%,激光唱片占30%,冷风机占72%;韩国的技术和日本相比,其水平约落后3~5年,个别尖端产品落后7~9年以上。<sup>③</sup>在今天这样激烈的技术竞争中,被落下3年以上就很难追得上,何况在许多技术引进方面,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由此可知韩国在技术上对美日的严重依附性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改变。

事实上,韩国的依附性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债务问题、经济结构在世界分工中的低层次状况等

①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9页。

② 韩国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编著:《韩国经济发展论》,第29页。

③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第9页。



等,韩国在诸多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资本依附问题。资本是一国工业化的前提,也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所难以跨越的门槛。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国的纯投资率由5%增加到10%,而绝大部分国家在起飞准备期,都难以为经济起飞筹措到足够的资金。韩国凭借得天独厚的机遇,借助美援,稳度难关,据不完全估计,在60年代以前,美援占韩国财政收入的30%~40%,有时高达50%以上,这部分资金在其每年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保持在60%~70%之间,因此,韩国在经济起飞期能够顺利冲破资金瓶颈。<sup>①</sup>除此之外,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因为得到美国对其免费开放的市场。迄今为止,韩国在资本与市场方面仍然依附于美日,这就使得韩国的依附性发展结构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

当然,对韩国这样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而言,试图取得在国际格局中主导权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我们对韩国依附性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韩国的经济层面。经济对于一个社会的决定与象征作用正如朴圣相所言:“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种种迹象似乎表明,经济发展本身是推动整个人类文化进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经济活动的作用一直是达到非经济目标的手段,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将经济发展视为实现人类总目标主要部分的一个途径是甚为合理的。”<sup>②</sup>不可否认,韩国经济在战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韩国的依附性发展的结构。尽管韩国力求在70年代摆脱依附,但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以一种依附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或者增加某种形式的依附而减少另一种形式的依附。美国的作用减弱了,美国

① 吴春波、郭国庆:《成“龙”的奥秘:韩国经济起飞透析》,第13~14页。

② (韩)朴圣相:《增长和发展:实物生产和就业增加的战略》,第27页。

专家不能再像 60 年代早期那样支配着韩国,他们只能“提出建议”。像日本那样,在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范围内,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的直接依附变成了间接依附。韩国继续保持着占到手的美国市场,继续靠美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原油和加工制品,仍然高度依赖美国的防务保护。<sup>①</sup>

1985 年,韩国开发研究院等十多个权威性研究机构,提出了《走向 2000 年国家长期发展设想》的报告,报告认为,在 70 年代,对韩国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是劳动投入、物资资本的投入和规模经济效益,而今后对韩国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的将是技术开发和资金投入。<sup>②</sup>显然,技术开发和资本这两个方面都是韩国极度薄弱的环节,也是韩国对美日依附十分严重的方面,因此,如果韩国不能从发展战略的基本结构上扭转过分依附于美日的局面,那么韩国经济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式发展。

安德烈·莫门认为,亚洲新兴工业国真正的榜样是日本……韩国追随着日本的工业化模式,第一阶段先发展轻纺工业,再在第二阶段转向钢铁、化工、汽车等重工业,然后是第三阶段的发展高技术部门,最后形成一个自我支撑的经济发展体系。<sup>③</sup>事实上,韩国虽然努力追寻着日本的发展道路,但是与日本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宋丙洛曾经运用投入产出表对 1985 年韩国和日本经济中各部门的总进口与总产出的比例进行计算,发现日本的比例是 6.9%,远低于韩国 28.1% 的比例;

①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 83 页。

② 沈圣英主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背景、现状和战略模式》,第 197 页。

③ (智)亚历克斯·E. 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比)安德烈·莫门主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制度和经济变迁》,第 47~48 页。

这意味着,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韩国需要进口的投入量是28.1%,这还只是直接投入的必需品,如果把间接必需品也包括在内,进口必需品的比例还要高得多。<sup>①</sup>实际上,韩国与日本相比,不仅在经济发展上不如日本,而且在国内政治民主化等诸多方面与日本相比也存在很大差异。韩国的发展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成就是经济,而这种经济成就的取得是以牺牲韩国人民的政治自由为前提的。朴正熙曾经在《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一书中指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相比之下,当今的亚洲人民更惧怕的是饥饿和贫穷,而不是极权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各种难以忍受的限制。亚洲人民首先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平等,而后才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政治体制。对于生活在饥饿和绝望之中的人民来说,民主是毫无意义的。”<sup>②</sup>虽然近年来,金泳三和金大中接连表示要在韩国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事实上,他们更多的精力仍然忙于处理韩国的经济危机,韩国依然像是一个大工厂。

虽然人们通常把韩国的发展视为日本的翻版,但是韩日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我们认为日本是依附性发展的成功者,关键就在于日本在发展中逐步的改变了自已的依附性地位,使得自主性发展逐渐地成为日本的主导型发展模式。然而,与日本相比,韩国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韩国发展的依附性程度与战后初期相比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迄今为止,韩国仍然严重的依附于美日的资本、市场与技术,在韩国发展的趋势中,依附性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向,韩国未来发展的趋向并不十分明显,我们不知道韩国自主发展的道路距今到底还有多远,因

①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132页。

② (美)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崛起》,第28页。

此,我们认为虽然韩国战后以来在经济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是它的依附性发展却是半成功的。所以,我们将韩国称为依附性发展半成功的国家。

## 第六章 依附与发展

### 东亚奇迹评述

从1945年到1995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亚洲从贫穷走向了富足。这期间其人口总数增长了4亿,而贫困人口却由4亿减少到了1.8亿。世界银行宣布,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和任何区域,都从未像当今的亚洲这样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并得出结论认为,东亚的发展经历是一个经济奇迹。<sup>①</sup>

那么,什么是“经济奇迹”?这似乎很难下一个人人都能够接受的定义,但是在乔恩·沃伦诺夫看来,“它无疑应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它应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似乎缺乏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应是成就巨大的,不同寻常得使人感到它超出人力之所为。”<sup>②</sup>这一描述完全适合于日韩等东亚国家在战后的发展历程。战后初期的东亚,物质缺乏,基础落后,社会贫困,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没有人对东亚的前途抱有希望。但是,在世界对东亚失望的时候,东亚却给世界一个奇迹。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东亚在经济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到四十年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只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而北美则以约35%~40%的比例领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地区所占比重则已大体相同,都是25%左

① 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外文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② (美)乔恩·沃伦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崛起》,第1页。

右;此外,亚洲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除非在该地区发生某种大规模的动乱,否则的话,亚洲有可能在 25 年的时间里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北美和欧洲。<sup>①</sup> 作为一个整体,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1965 年的 8% 上升到 1980 年的 13% 和 1990 年的 18%;这种增长率是通过出口制成品获得的,例如,在 1965~1990 年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它占世界市场的份额由 8% 增长到 12%,“四小龙”占制成品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比日本快了 4 倍。<sup>②</sup>

东亚经济奇迹般的成长引起了全世界无数的赞誉,但是更引起人们(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兴趣的是东亚取得这一杰出成就的原因,即东亚是如何突破第三世界国家所固有的发展限制从而获得发展的要素,并且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因此,本文在上面章节中对日本和韩国的个案研究实际上暗含了对整个东亚发展模式的一种判断,即战后东亚之所以能够摆脱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悲惨命运”,关键在于东亚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援助,从而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本文看来,东亚的成功正是源于这一依附性发展的结构。问题是,为什么东亚能够依附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并且获得美国的援助,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却不能呢?这与东亚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因为冷战的爆发、美苏的对立,凸显了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特殊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203~204 页。

② (智)亚历克斯·E. 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比)安德烈·莫门主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制度和经济变迁》,第 16 页。

地位。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sup>①</sup>保卫欧亚大陆东边的“桥头堡”就成为美国的一大义务,美国的援助由此而滚滚的流入到东亚,从而引发了东亚奇迹般的增长。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说东亚这种依附性发展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问题是为什么这种依附性发展能够给东亚带来发展?这种依附性发展对东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更深远的影响(意义)?这种依附性发展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而推行到其他第三世界地区?对此,梅瑞狄斯是这样回答的,“东亚经济增长并不是决定于其文化因素,而是与所处的特定的后起发展地区有关,与一个特定的地方东北亚和这一特定的冷战时期有关;换个角度看确实如此:韩国和台湾在冷战中所处的前沿位置,使它们能够较轻易地获得资源,其他地方则不可能再遇到这种情况……这的确是历史形成的、不能复制的人为现象。”<sup>②</sup>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卡明斯的论文中,即“台湾和南朝鲜发展的成功是由历史和地区的特定条件决定的,所以,没有为其他有兴趣模仿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现成的适用模式。”<sup>③</sup>

那么是否说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不具有东亚这般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就不能获得发展呢?事实上,这就涉及到怎样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东亚依附性发展能够成功?在本文看来,东亚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只是发展的—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41页。

② 梅瑞狄斯:“东亚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市场和意识形态的透视”,刊载于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第393页。

③ 布鲁斯·卡明斯:“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产品周期、政治结果”,刊载于戴约:《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第89页。

个“通道”或“途径”,关键在于依附所获得的援助的“内容”,东亚通过依附这一“通道”而从美国大量的输入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如何获得这些发展的要素。

而对于发展要素的界定就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发展。在本文看来,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就是资本、市场与技术,只有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就可以获得发展。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重要的是如何获得这些要素。事实上,依附只是一种形式,获得资本、市场与技术的援助才是东亚发展的本质,虽然其中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直接和间接的援助。

经济发展的传统理论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归于四大因素:资本积累,新资源(或者所谓新“边疆”),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的首要关键被认为是资本积累,它能够通过促进投资形式而增加生产。<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资本积累的历史。即使在1945年~198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可观的繁荣时期,“虽然发达国家在繁荣时期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是它们仍继续受资本主义逻辑的驱使,它们的动力仍是资本积累。”<sup>②</sup>事实上,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说明了资本积累在经济中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仍然如此。今天,最广泛地得到接受的发展战略仍然是“集中精力于创造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自力成长的条件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包含的经济、社会和

---

① 彼得·J. 亨里厄特:“发展的不同选择:问题、战略与价值观”,刊载于(美)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6~32页,高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页。

② (英)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第422页。



政治结构方面必要的现代化。”<sup>①</sup>

事实上,经济发展一直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主要旋律之一。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许多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深受贫困、饥饿、人口膨胀等无时无刻的困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被认为是最迫切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抛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二元结构论、均衡发展理论、出口替代、进口替代等等,其根本目的仍然是试图为第三世界国家寻求资本、市场、技术等发展的基本要素。然而,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实绩却大为令人失望。

令人失望的原因并不在发展中国家自身,而在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对外部世界剥削的结果,而对于二战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很难获得可以供自己剥削的“外部世界”。在陈燕谷看来,由于“现代化理论把‘内部’的资本主义设定为普遍有效的可重复可模仿的模式,但却悄悄地把‘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一笔勾销了,更确切地说,它更新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到今天为止,现代世界体系这两个主要构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过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导致全球分裂的鸿沟不是依然存在吗?‘内部’不是和殖民主义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吗?和现代化理论的承诺相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发展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以全世界的资源(从农产品、矿产品到奴隶劳动)作为自己积累的基础,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把庞大的剩余人口输出到别的大陆;正如印度学者艾哈迈德指出的:‘印度能向哪里输送它的资

<sup>①</sup> 彼得·J·亨里厄特:“发展的不同选择:问题、战略与价值观”,刊载于(美)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18页。

本主义无法养活的大约五亿人口呢?印度资产阶级能够搜刮谁的矿产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呢?只有我们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我们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像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同时这种自杀性的‘发展’并不能改变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地位,因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不平等(从而是不民主)发展。”<sup>①</sup>

这样一来,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资本等发展的要素呢?要知道资本正是它们经济发展的“跛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从内部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要素,似乎更不现实,正如巴西波士顿银行董事长恩里克·梅雷莱斯分析说,“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能保持高速增长所需的国内储蓄,只有靠外来资金。”<sup>②</sup>

因此,发展中国家不能发展的关键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的不努力,而在于它们再也不能搜照发达国家过去的经历那样获得经济发展的要素了,因为世界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人们将目光投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也正因为传统的发展理论研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分析家们(特别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家们)所主张的发展问题的定义,则更以一种历史的角度来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演变的关系。他们认为发展问题的焦点主要不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而在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外部世界,即使有些国家有幸能够被体系的“内部”主人所选中,

① 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第12期，第3-8页。

② 《阅读》周刊(巴西)，1993年10月，转引自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第32页。

它们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谁掌握着发展？就是说：那些国家到底是发展的对象（由别人主宰）呢，还是发展的主人（掌握着它们自身的命运）？对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就出现了“依附性”理论和“不发达”理论，这些理论以这种和那种形式对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的影响正在日益增大。<sup>①</sup>

为此，早期的依附论和不发达理论对第三世界的落后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这些林林总总的解释都在反复的宣扬，依附不可能发展，要想发展，只有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就在第三世界倍感绝望的时候，卡多索又给它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卡多索提出了依附性发展的概念，并且经伊文思上升为依附性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依附也是可以发展的，但是这种依附性经济的资本主义积累无法完成其循环周期。卡尔多索为此以巴西为例说明：作为依附性资本主义产物的巴西资产阶级不能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它的“革命”只是把自身结合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而作为依附的小伙伴。<sup>②</sup> 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沃勒斯坦认为，主要是出于确保世界体系在政治上的稳定的需要，某些国家会被允许进入“半边缘”的位置，形成一种“应邀式发展”；其特点是它们对核心而言是边缘，而对边缘而言是核心……半边缘概念与依附发展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埃文斯也说，实现了依附发展的国家就是沃勒斯坦所说的“半边缘”。<sup>③</sup>

当我们理论梳理到这一地步时，在学理层面上就阐述了为何东亚能够发展了。依附性发展定格到东亚具体的实践中就体

① 彼得·J. 亨里厄特：“发展的不同选择：问题、战略与价值观”，（美）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14页。

② 高钰：《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4~46页。

③ 董正华、赵自勇、庄礼伟、牛可：《透视东亚“奇迹”》，第448页。

现为:美苏对立与冷战爆发使得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而使得东亚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霸权争夺的地缘政治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美国因此而对东亚进行援助,使得东亚在依附于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时获得了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市场和技术等要素。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描绘的那样,当意识形态之争笼罩着全球时,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制定地缘战略的出发点必须是确定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欧亚国家是哪些……有选择地吸收它们加入联盟,和/或控制它们,以便维护和促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形成更全面的地缘战略概念,在全球范围把较为具体的美国政策互相联接起来。<sup>①</sup>正是这一独特的国际环境使得东亚能够获得发展的要素,从而能够创造所谓的“东亚奇迹”。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那样,东亚在依附于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时,获得了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资本、市场、技术和体系自身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

1、资本援助是东亚发展的根本所在。虽然人们赞美东亚的言辞花样翻新,但是就东亚获得赞赏(即经济增长)的原因而言,实际上十分简单,“大多数亚洲新兴国家的成功应归功于外资的流入,这些外资起到支持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作用。”<sup>②</sup>如果没有积极引进外资就难以想象亚洲经济的发展,而且越是积极引进外资的国家增长程度越高。这也是落后国家向前发展的优势,欧美各国无法效仿。据世界银行1995年1月发表的世界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53页。

② (智)亚历克斯·E.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比)安德烈·莫门主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制度和经济变迁》(前言),第2页。

债务白皮书统计,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资金额,1990年为455亿美元,到1994年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中心,总额达1730亿美元,在增加资金额中,亚洲所占的贡献率相当高。<sup>①</sup>正是因为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评价东亚增长的源泉时时才会这般说:“一般认为,资本积累所作的贡献最大。”<sup>②</sup>

应该引起重视的是,这种对外部资本的需要不仅是东亚经验的总结,也是整个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具有的现象,“几乎没有人怀疑在过去的15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多地依赖外部借款,过少地依赖国内资金,在对38个可得到它们国内金融体系负债数据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它们在1986年年底的外债金额超过了内债金额50%以上,就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外债平均高于国内银行负债的2.5倍。”<sup>③</sup>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资本的需要是整个发展中国家比较典型的依附特征。

2、市场准入。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就是市场,对于日韩等东亚这些国内市场狭小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或地区而言,如果说资本是汽车,那么市场就如同马路。正是因为有着明确的市场支撑,东亚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才能够实施。所以有人才会这样说:迄今支撑亚洲“经济奇迹”的是美国市场。<sup>④</sup>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原料和市场都依靠国外——虽然韩国依赖程度要高很多,例如,1986年,日本的进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1/4,韩国则超过3/4。<sup>⑤</sup>虽然,近年来东亚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北美迄今为止仍然是东亚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尽

①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世界经济大视野》,雅思译,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第61页。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第81页。

③ 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④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世界经济大视野》,第125页。

⑤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第243页。

管日本已经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市场;但是 1995 年,日元对美元的贬值严重缩减了东亚的出口市场,日本资本在东亚地区创造了生产能力过剩,但是却没有履行吸纳这种生产的市场作用。<sup>①</sup> 这是东亚在市场领域对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依附。

3、技术引进。资本和市场结合的这个经济怪物要想奔跑得更快,就像马路上的汽车需要更强劲的发动机一般,而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发动机的功能。但东亚国家普遍在研发上落后,这就造成致命弱点。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安瓦尔·易卜拉欣指出:“虽然东亚经济成就引人注目,但是,靠出口制成品所获得的财富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的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我们在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制造工业品之前,还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sup>②</sup> 所以东亚各国的技术发展主要靠引进。要是韩国或其他新兴工业国必须积累资本,自己发展出口生产所使用的关键生产技术,那么,即使有作为后来者的优势,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对东亚“慷慨解囊”,转让了大量的技术。事实上,美国人不仅在现代技术和管理方面,而且在工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日韩等东亚国家(地区)的启蒙导师。美国顾问向东亚人所提出的建议和良好的训练内容,是在任何一本教科书都难以学到的;这些具体的建议和指导也许比财政、军事和技术一类的援助更为实际和重要。1945 年到 1952 年盟军占领日本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军驻扎在日本。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曾向日本、台

① Richard Higgott,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Political Economy*, Nov 1998, Vol. 3, PP. 333 ~ 357.

② 《国际先驱论坛》(美)1994 年 1 月 31 日,转引自张蕴岭:《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第 34 页。

③ 俞正镐:“新兴工业国家的增长与世界经济:韩国的经验”,刊载于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第 99 页。

湾和韩国提供了遍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技术指导和援助。1945年以后,美国及其盟国在亚洲进行了两场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处于战争的最前线。因此,美国对东亚做出了极高度的承诺,美国对东亚承担的义务仅次于西欧,而大大多于世界其他地区。<sup>①</sup>

4、体系的自我创造功能。美国之所以愿意对东亚作出如此高的承诺,固然是出于美国战略的需要。而东亚之所以能够享受到这种种优惠条件,还在于东亚隶属于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自身的功能,即在某种时候,东亚因为与美国同属一个体系而分占了许多额外的好处,如防务援助、获得国际贷款等。正如罗斯托所认为的那样,“防卫援助——一种补偿国内非正常军费开支的经济援助——是一项确有成效的发展援助措施,例如韩国、台湾和土耳其的情况;这种援助基于美国直接的国家安全利益,也为受援国赢得了度过难关、立稳根基和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阶段的时间;经回顾我的确感到这种援助的价值比50年代像我所做的纯理论假设中的评价还要高。”<sup>②</sup>防务援助的作用对于日本而言更为巨大,罗伯特·基朗曾经评论到:“在国际(军事)竞争的舞台上,所有竞争国都疲于奔命,唯独日本……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日本从来没有过军事性的远征或战争;日本也是唯一没有被拴在所费不赀的原子武器战车上的大国;而且,日本在开发宇宙方面所花的钱做乎其微。”<sup>③</sup>

东亚国家从与美国的共同防务中所得到的好处,不仅减轻

① (美)傅高义:《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陈振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②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发展:马歇尔的长期政治经济学”,见(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248页。

③ 罗伯特·基朗:《第三大国日本》,第296~297页;转引自(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第57页。

了非生产性支出,从而加大生产领域的投资,更在于获得了一个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国内外和平环境。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表明,持续的发展需要和平;据保守的估计,1950年以来,战争直接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死于发展中国家内战的1200万人,从根本上讲,造成近年来发展中国家饥馑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农业的歉收和贫困,而是军事冲突。<sup>①</sup>由此可见,东亚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享有美国提供的稳定的国内外和平环境是多么的重要,而东亚所享有的这些潜在的利益往往并不被视为一种援助,事实上,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同样是十分巨大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战后日本的“生命线”正是日美安全条约,“利益线”正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贸易体制,总之,冷战格局下的日美关系对日本来说曾是“巨大的利益的源泉”。<sup>②</sup>

毫无疑问,美国将东亚视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给其进入美国市场的优先权,也允许其比较自由地寻求“民族利益”和“自主权”,这一独特的世界体系的时机,是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历史性要素。<sup>③</sup>东亚国家借助于这一历史的机遇,在依附的同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对于这种依附性发展的模式,仍然有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特别是当东亚依附性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时,人们尤其关心这一模式的前途。

要探讨依附性发展的局限性,首先就要明了什么是依附(性)。在桑托斯看来,“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

①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2页。

② 冯昭奎、张可喜:《技术立国之路:科学技术与日本社会》,第156页。

③ 俞新天:“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及其世界意义”,见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第30页。



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sup>①</sup>同样的思想也见于卡多索所下的定义:“依附性的意思是:影响欠发达地区内部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决定——例如关于物价、投资格局、货币关系的决定——是由那些国家以外的个人和机构所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国家的经济是由它们所从属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大所左右的……依附性的概念使我们把这些国家的国内形势看成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sup>②</sup>这样,统治国就对依附国拥有技术、贸易、资本和社会政治方面的优势(在不同历史时期拥有上述范围内某些方面的优势),从而使它们得以对依附国强加条件,进行剥削并掠走其国内生产的部分盈余。

由依附(性)的定义可以归纳出依附论的一个核心思想,即所有依附理论家坚持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主要渊源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部力量,而非渊源于这些国家政策本身。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和资本主义的发达,都是国际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尽管在绝对意义上说处于依附地位的不发达国家也在前进,但在相对意义上说,它们始终是落后的。<sup>③</sup>在桑托斯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使某些国家的工业获得发展,同时限制了另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而这种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由

①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302页。

② 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依附性结构”,转引自(美)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14~15页。

③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320页。

经济增长的基础在于多数国家受少数国家剥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集中于这些少数国家之手的资本积累的特点决定的。<sup>①</sup>在东亚发展的初期,依附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依附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东亚何时才能扭转资本积累依附于人、操之于人的局面?

虽然东亚是依附性发展,但是,依附确实给东亚带来了利益,在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看来,“与大量尚未使用的技术储备优势相比,依附的代价要小一些。依附的沉重负担,尤其是技术上的依附性,部分上是心理作用……这个问题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真正开始有所作为并可以吸纳全球技术贮备时才能解决;随时间推移,这是必然发生的。”<sup>②</sup>因此,依附给一批有幸得到青睐的不发达国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些“新拓居地”,打下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带来了发展,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依附等于发展的思维模式,导致了那些被忽视的国家抱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对它们进行殖民?”<sup>③</sup>由此而不难推测依附性发展的优势来。然而,目前东亚国家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依附性发展的趋势(或许日本是个例外),资本、市场、技术仍然依附于美国,甚至连地区防务也指望美国。

虽然东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它依然十分脆弱,甚至连日本也是如此。当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它是如此地不可一世,认为亚洲发展的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并开始批评欧美式的市场经济,试图在经济发展的模式上取代美国。Naohiro Amaya(日本高级贸易官员)在1988年意气风发的说,“没有靶

①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303页。

②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发展:马歇尔的长期政治经济学”,见(美)吉拉德·M.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第252页。

③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318~319页。

子如何打猎？打猎时你必须有一个靶子，但是你们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说，你们随时可以在任何方向开火，而‘市场’将确保你们打中靶子；我们不接受这一理由，我们的经济模式在未来将越发有力，并比美国和苏联中央集权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影响作用。”<sup>①</sup>因此，有人断言，日本将不可避免地立即以“超级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日本不仅会把美国拉下马（甚至把美国买下来！），而且会把某种“日本治下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他们还提出种种理论证明，“日本将在高科技竞争中战胜美国，不久后日本将成为全球‘信息帝国’的中心，而美国则据说正在由于历史疲劳症和社会的自我放荡而走向衰落”；这些信口开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很脆弱的国家这一事实，只要在全球的资源 and 贸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现最轻微的混乱，日本就会遭受伤害，更不用去说全球的总体稳定遭到冲击时日本将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经受日益暴露出来的人口、社会和政治方面国内弱点的困扰。<sup>②</sup>吉布尼在日本时，一位银行家向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日本真是那样脆弱吗？”吉布尼回答了日本的一些明显的脆弱之处：几乎完全缺乏原材料和强大的军事力量。<sup>③</sup>其实，这是整个东亚地区所共同面临的一个尴尬境地，东亚许多国家（地区）连防务的力量都要依附于美国，这使得美国的战略家们十分担忧，他们认为当前面临的关键的、同时也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是：“十万美军在一个世界人口最为密集并日益拥有最多军备的地区里能够确保

① 转引自 Nicholas D. Kristof, "Crisis Pushing Asian Capitalism Closer to U. S. Style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1998.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227～228 页。

③ (美)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第 236 页。

和平多久,美军究竟还可能在这一地区呆多久?”<sup>①</sup>这不禁使人反问一句:这样的地区能够不依附而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吗?

这其中更容易使人犯错误的是对东亚成就的过分乐观,事实上,东亚成为“世界工厂”并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终结(标志),更应当把它理解为发展的开始。正如我们在上而章节中所论述的那样,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上讲,资本运作(或称金融)的获利更胜于生产所得,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早就被证明了的事实。正如列宁对克斯特纳的观点所作分析的那样:“(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sup>②</sup>撇开意识形态化的色彩,列宁确实指出了资本的自我增殖所得实际上高于单纯的生产行为这一事实。而克米特·戈登在回顾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时也写道:“对经济发展所作的理论分析,也强调资源——实质资本、管理能力、其他‘实际’要素——的不足,几乎完全排除了金融要素。”<sup>③</sup>资本的运作既是发展中国家欠缺的一面,也是其产业结构升级所追求的目标。

因此,当我们仍然把工业化或者说生产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时,已经表明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误区,正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208~209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1915.08~1916.06)》(第27卷),第342页。

③ 邵名:“在稳定中寻求发展”,《读书》1989年第4期,第5~16页。

如列宁所论述的那样,金融产生的价值已经远远的超越了生产领域所带来的利益;因此从产业结构上而言,在全球大唱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仍然将制造业作为主导工业,必然面临着在新一轮经济竞赛中陷入困境的尴尬状况;事实上,当今社会划分经济的标准已经发生变化,行业标准、品牌、管理已经排在生产领域前列而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的准则。

何况依附状况本身也在改变,事实上,随着支配性结构和依附性结构本身的变化,依附状况也在改变;发生此种变化可以打破依附关系而只要加以调整(如由贸易依附转向工业—金融依附)。<sup>①</sup> 这充分表明东亚经济上的成功只是调整了依附的关系,而没有根本的打破依附。

对东亚而言,取得发展的有利环境已经改变,美国对日韩等东亚国家以经济让步换取政治支持的战略已经变成压迫东亚开放市场,以弥补其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意味着东亚对美国这种依赖性的动力机制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对此,解决的办法是)只有亚太发展中国家互相向对方开放市场,它们才能长期保持这种动力机制,换句话说,亚太动力机制只有通过某种手段将依赖动力机制改变为一种自我推动动力机制才能保持下去。<sup>②</sup>

在本文看来,要保证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实现顺利转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注重教育,一方面,这是东亚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另一方面,这也是人们对于发展认识的一个升华,知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许多研究报告都证明了教育的巨大收益。在以前关于增长的研究报告中,代表

①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第304页。

② 俞正镐:“新兴工业国家的增长与世界经济:韩国的经验”,刊载于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第103-104页。

教育的指标一直仅仅是识字率或小学入学率。而世界银行1991年发展报告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这是指头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教育相比,能使GDP提高27%。尔后增加的学年收益衰减为每年使GDP增加4%,或者说,其后三年的教育总共可使GDP提高12%。<sup>①</sup>对于东亚这些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唯一能够依赖的就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而实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东亚教育发展的现状也使得人们对东亚的未来充满信心。到1990年,在美国注册的外国学生达到450000人,占美国大学整个注册学生比例的2.9%。其中亚洲学生在所有的国际学生中的比例超过一半。根据北德克萨斯州大学的统计,在美国前100所招收国际学生的大学中,东亚学生占国际学生总数的53%。<sup>②</sup>

只有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发展中采取主动的形式,东亚才能完成从依附性发展到自主式发展的转变,也就是张蕴岭所称的“从发展的角度,肯定的因素不断增加,那么对外依赖关系中的发展特征就会居主导地位,而从属性特征居次要地位,这样的对外依赖就不会导致依附性增加。”<sup>③</sup>虽然,目前东亚的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正如保罗·马修斯(Paul Matthews)所说,“(对于东亚出现的金融危机),我想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说过的,只有在真正的危机中你才能得到真正的

---

①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第45页。

② Chwee Lye Chng; Jiansan Ding; Perez, Miguel A., “Validation of the East Asian Student Stress Inventory (EASSI)”,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Studies*, 1998, Vol. 14, PP. 153 ~ 161.

③ 张蕴岭:《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第435~437页。

转变。”<sup>①</sup>虽然,东亚发展的模式遭到了挑战,但是这也是东亚的机遇。

不管东亚依附性发展的最终结果如何,在本文看来,东亚的依附性发展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其发展的一面,即东亚在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其依附的一面,即东亚的发展是在依附于别国的同时取得的,这种发展存在着天然的结构缺陷。当发展进行到一定的程度时,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就会对发展造成阻碍。这就促使人们对东亚依附性发展模式的前途进行思索。不可否认的是,东亚这种依附性发展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依附性发展的模式只是一种阶段性的发展模式,要想削弱或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弊端,必须超越这种模式。这是整个东亚地区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鸿沟很深,因为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市场条件使得它们在20世纪末摆脱依附关系比在十九世纪要困难得多了,但不管怎样,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已经确立了稳定的政治、社会纪律和有效的市场,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前提。<sup>②</sup>对东亚地区而言,善于利用自己已经获得的成就而顺势改变自己的依附地位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东亚近年来的发展经历已经给第三世界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前进的方向。

西方学术界为第三世界开出的单线式发展理论不适合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依附论认为落后国家除了任人欺凌别无他法,但是它开出的闭关锁国式的发展战略毫无现实意义。依附性发展的前景也未必更好,“依附理论家说,鉴于所有上述理由(即

<sup>①</sup> James L. Tyson, “East Asia: Up from the ash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07/13/1998, Vol. 90, p. B4.

<sup>②</sup>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339页。

依附具有种种不利的结果),依附性发展或关联发展不会带来真正的发展。”<sup>①</sup>难道第三世界国家就永远沉沦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永远没有自主发展的希望吗?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具体的成功事例来给予这一问题以明确的回答。就在发展理论研究者迷茫徘徊之时,东亚在战后数十年的发展经历又重新点燃了我们对第三世界前途的希望。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哪一个国家要想保持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适时而变;在一个变化为绝对真理的历史阶段上,只有跟上变化,才能驾驭变化,<sup>②</sup>这似乎是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必须遵循的准则。对于东亚而言,只要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策略,就一定会扭转依附性发展的趋势而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正如迪茨所评论的那样,“所有的发展策略最终都会遭到收益递减,而东亚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及时的转变战略”。<sup>③</sup>东亚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也使得这种战略的转变成为可能;同时,日韩等东亚地区的发展经历也使得人们对于东亚从依附性发展转向自主式发展的前途充满希望。东亚地区如果能够顺利的达到自主式发展并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不仅对东亚地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种依附性发展能够最终取得成功的事实更是一种榜样和理论上的创新,也将再一次证明罗荣渠教授所提倡的“一元多线”社会发展理论在理论上的前瞻性和现实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320页。

② 钱乘旦:“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兼读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刊载于《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第64~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73页;虽然,钱乘旦教授所言的政策适时转变此处仅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但是对于后发性现代化国家这一点似乎是整个政策领域都应遵循的准则。

③ James L. Dietz, “Overcoming Underdevelopment: What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e East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Jan 1992, Vol. 26, PP. 373 ~ 384.



上的可行性。

现在,东亚从依附性发展向自主式发展转变的时间到了。

## 第七章 余论:从依附到一体化

显然,我们在呼唤东亚由依附性战略向自主式发展战略变换的同时,摆在东亚面前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这种转变怎么样才能成为可能呢?换而言之,东亚所谓的开放式经济其实质是对外部市场的依附,那么,当东亚对外依附的条件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逐渐的变得不是那么有利的情况下,东亚又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是到了探讨东亚该如何转变这种发展战略的时期了!

东亚发展战略的转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保障东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正如本书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论述那样,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中,不是单纯的一个国家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早期,东亚的发展依附于美国及其为首的世界体系,那么,要改变这种依附性发展战略,东亚发展所必需的这些基本要素该如何才能获得呢?

近年来,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战略已经逐渐的浮现出历史的舞台,这就是东亚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倾向。正如马哈蒂尔在1994年11月太平洋对话会议上的致词:“现在,我们应采取行动,帮助邻国共同繁荣。我深信,我们必须携手合作,而且,必须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联合体……我们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要共同繁荣,还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sup>①</sup>一直

<sup>①</sup> 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第133页。

关注东亚发展的世界银行于2003年6月发布了《东亚地区一体化》研究报告,提出了该地区今后十年在促进其成员经济增长和稳定方面应该采取的合作步骤;就此,考查了区域性制度的未来作用、区域性作用在促进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前景、以及金融和货币合作的可能性。<sup>①</sup>

然而,东亚一体化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也有着许多相关的国际组织和相应的国际机构以及各种国际会议的定期召开,但是,与学术界的热闹相较之下,东亚一体化的实质性步骤却并无显眼之处。尤其是日本对东亚一体化态度的游弋与波动,其中意味很值得人们的深思。

如果我们详细的考察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经济格局的变迁就会发现,东亚一体化的实质是中国和日本两国以何种方式对东亚地区进行整合的问题。随着新世纪初期中国对外战略的几个关键性措施的实施,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得到飞速的发展,中日韩三国的东北亚一体化计划的逐步展开,中国已经逐渐的掌握了整合东亚的主动权,相反,日本对东亚一体化的态度却很不明朗,在此进程中一步三摇、畏首畏尾,出现了东亚一体化中的日本困境现象。

但是,东亚一体化的最终形成离不开中日之间的努力与合作,因此,不了解并设法解决东亚一体化中的日本困境问题,东亚地区就无法真正的进行整合。而日本对东亚一体化的矛盾态度根源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模式,以及这一模式背后所主导的日本战略选择。

萨米尔·阿明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必须

---

① 具体参见世界银行的报告 Eisuke Sakakibara and Sharon Yamakawa,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2003. 6, Report No: WPS3078, 3079.

颠倒政治/经济之间的顺序才能运转,统治统管经济的顺序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标志,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要求颠倒顺序,让政治服从经济。<sup>①</sup>这样,当日本在近代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突然发现在这个以市场引导为基础的、商品化生产占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它本身岛国的弱点使得发展所必要的资源、资本、市场等条件完全都不具备。因此,日本要想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实现强国梦想,就必须寻求发展的基本要素:资本、资源、技术和市场。整个日本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发展的基本要素的历史,二战前,由于国际关系中盛行的领土博弈与日本好战的文化传统,导致日本通过战争手段来获取发展的基本要素;二战后,日本则借助于对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依附而取得发展的要素。无论日本采取何种方式,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得发展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理解日本近现代发展历程的关键所在。换言之,战争与依附是日本现代化模式的两大基本特征,也是日本现代化的两次战略选择。<sup>②</sup>

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通过战争手段谋求国家发展要素的战略结果证明行不通;二战后,日本通过对美国及其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而获得发展的基本要素,从而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构建了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完整的发展要素的供给链。虽然,日本依托于这一脆弱的供给链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成就,但是随着这一供给链产生的国际环境(冷战所凸现的日本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的消逝,日本在能源、市场、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脆弱性愈发呈现出来,使

① (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殊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页。

② 详细的论述参见梁玉国:《中日冲突与和解的根源》,《历史月刊》,2003年第11期。

得日本一方面努力的通过自身的力量对其国际市场内生产要素的供给链加以强化与弥补,另一方面也在设法降低早期的依附性战略的发展成本,其中东亚区域化的构想就是源于日本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选择,无论是早期的雁型模式,还是近来对东亚一体化主导权的争夺,其实质就在于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欧美压力的一种战略转移或者寻求战略缓冲的应对。

如今,东亚一体化的提出与构建,虽然从理论上讲意味着是日本发展战略的又一次机遇,但是就日本的产业供给链而言,这也是一种挑战,即:日本将如何从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获得发展要素转向依托东亚一体化的市场机制而获得发展的基本要素。显然,自冷战对抗趋于缓和以至最终苏联解体,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趋下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经济和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了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指标。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发激烈,尤其是汽车、农产品贸易和日本国内市场开放等问题,甚至影响了日美两国的政治走向。这一切都表明全球化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势:区域化。由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和有效的机制而反观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碎化,这严重的影响了东亚经济群体发展的潜力。虽然日本在战后努力构建着自己的经济体,但是,由于地缘政治的特征,它的经济一体化的努力显得特别的脆弱。源自于中东的石油(日本进口的石油大约 80% 来自中东)、澳大利亚的农牧业和矿产资源、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和商品市场等所组合的经济体不仅在安全上得不到有效的保证,而且成本昂贵,远不如同中国合作而推动东亚一体化更为合理。同时,就中日经济的现状而言,两国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日本处于经济体的上层,在研发、资本运作等领域居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处于经济体的中下层,在工业生产、服务业和农业等领域有着一定的优势。

这样,一方面,单凭日本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其发展基本要素供给链的转移的,因为,日本担心东亚一体化机制能否为其解决充足的能源、广阔的出口市场等发展问题,而且日本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如果不采取某种方式协助日本解决其发展要素供给链的转型,日本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推行东亚一体化的发展,这也就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开放的区域市场能够保证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同时,其庞大的就业人口的压力,也必须要通过强有力的区域市场需求自身才能有效的解决,单纯的依靠政府的力量或者国内的市场需求是无法满足发展的要求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的表达了希望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因此,东亚一体化能否实现,关键看中国和日本的合作,至于东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从属于这一模式转变的走向的,虽然整个地区都是处于一种战略的调整与转型时期。因而,在论述东亚发展战略的转型时,关键是看东亚地区中日两个大国关系的走向。而这种合作能否实现,在于合作本身对于双方利益之影响。显然,一体化对中国利益更加有利,因为可以将中国的国内市场与东亚市场整合,而形成区域大市场,从而促使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日本对此却存在着矛盾的态度,这种矛盾就在于日本自身发展战略的转型问题。

这样,东亚一体化中的日本困境问题,充分表明了全球化虽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一,但是国际政治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与障碍却表明了全球化的“空壳化”与“虚拟性”的特征,相反,区域化的真实性与相对的可操作性却得到了充分肯定。因而,比较而言,能否解决日本的困境(即:日本生产要素供给链

由对美依附转为依托一体化的东亚市场机制)就成为东亚一体化的成功与否的关键了,而日本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种种难解之处也正是源于这种发展战略的转型。

然而,为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和谐发展,这又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几乎是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大大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成员国或欧盟成员国内部的贸易增长速度。以工业内部贸易比例或国际生产份额统计为基础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东亚经济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大大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目前东亚(不包括日本)贸易份额占世界贸易的19%,几乎与NAFTA成员国的份额相等。”<sup>①</sup>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日本连续11年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3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1335.8亿美元,增长31.1%。”因此,从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区域发展的大战略角度出发,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在中日之间进行创造性的外交革命<sup>②</sup>,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抓住战后东亚发展最为关键的战略转型机遇。

因而,当前的东亚地区充分的显示了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如果说早期东亚的发展是源于依附,那么现在应该说,东亚地区

---

① 具体参见世界银行的报告 Francis Ng and Alexander Yeats, *Major Trade Trends in East Asia: What are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rowth?* 2003.6, Report No: WPS3084.

② 具体观点参见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以及由这两位学者的文章所引发的大量关于中日关系讨论的言论(包括许多网络的讨论),虽然也有许多学者从历史与国民情感等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战后东亚发展的角度而言,中日的合作,无疑是利远大于害的。

的发展应该向一体化道路转型了。我们期待着在 21 世纪之中，东亚地区能够延续此前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能够得到真正的复兴，或许，东亚一体化的出现与发展将是东亚发展模式的另一次重大的机遇。



## 参考文献

### 一、英文资料

- Aluin, Y. So.,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Publishers, 1990.
- Aoki, Masahiko; Kim, Hyung-ki and Okuno-Fujiwara, Masahiro,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Comparative Institution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Appelbaum, Richard P. and Henderson, Jeffrey,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Inc., 1992.
- Armour, Andrew J. L., *Asia and Japan—The Search for Modernization and Identity*,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5.
- Avery, Todd, “Asian financial crisis demonstrates need for short-term support and long-term change”, *Business America*, Jul1998, Vol. 119.
- Baily, Martin Neil; Zitzewitz, Eric, “Extend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Microeconomic Evidence from Kore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8.
- Bairoch, Paul, “Free Trade and Euro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72, Vol. 3.
- Bird, Graham; Milne, Alistair, “Miracle to Meltdown: A Pathology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ird World Quarterly*, Apr1999, Vol. 20.
- Blomstrom, Magnus & Hettne, Bjorn,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The Dependency Debate and Beyond: Third World Response*, London: Zed Books Ltd., 1985.
- Brenner, 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977, No. 104.

- Cheethan, Russell, "East Asian Development", *Presidents & Prime Ministers*, Jan/Feb1996, Vol. 5.
- Chng, Chwee Lye; Ding, Jiansan; Perez, Miguel A. , "Validation of the East Asian Student Stress Inventory (EASSI)",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Studies*, 1998, Vol. 14.
- Chong Yah, Lim,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Singapore: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 (Pte) Ltd, 1991.
- Cordoso, Fernando Henrique & Faletto, Enz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Dietz, James L. , "Overcoming Underdevelopment: What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e East Asian and Lo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Jan 1992, Vol. 26.
- Eisuke Sakakibara and Sharon Yamakawa;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2003. 6. 30, Report No: WPS3078, 3079.
- Evans, Peter, *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Francis Ng and Alexander Yeats; *Major Trade Trends in East Asia: What are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rowth?* 2003. 6, Report No: WPS3084.
- Frank, Andre Gunder, "Sociology of Developmet and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Catalyst*, III (Summer), 1967.
- Glazer, Nathan, "Two Cheers for Asian Values", *National Interest*, Fall1999.
- Gill, Stephen, "The Geopolitics of Asian Crisi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Mar 1999, Vol. 50.
- Goulet, Denis. , "Development debates (in French)". *Spiritus* 38(148): 288 - 297, Sept. 1997. ( Report 14:23, Spring 1998. )
- Goulet, Denis. , "Development ethics: a new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4(11): 1160 - 1171, 1997. ( Report 14:23, Spring 1998. )
- Graham, F. and Anzai, N. , "Is Japanese Direct Investment Creating an Asian

- Economic Bloc?" ,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Fall 1994).
- Henderson, Gregory,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Heng, Toh Mun and Siang, Tiew Chee,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of the ASEAN and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Aug 1999, Vol. 16.
- Higgott, Richard,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Political Economy*, Nov 1998, Vol. 3.
- Johnson, H. G. ,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7.
- Kaldor, Nicholas ,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1967.
- Kaldor, Nicholas , "Equilibrium Theory and Growth Theory", *The Essential Kaldor*, Duckworth, London, 1989.
- Kay, G. ,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A Marxist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1975.
- Keesing, Donald, "Linking up to Distant Markets: South to North Exports of Manufactured Consumer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Vol. 73, P. 338 ~ 342.
- Kim, Kwang-Suk and Roemer, Michael,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 Kitching, Gavin,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2.
- Kristof, Nicholas D. , "Crisis Pushing Asian Capitalism Closer to U. S. Style Free Market,"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1998.
- Kunio, Yoshihara,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Laclau, Ernesto,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 Laclau, Ernesto, "Reflection on Unlimited Labour", *Essays in Honour of Raul*

- Prebisch,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2.
- Laclau, Ernesto, "Unlimited Labour; Further Notes",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8, Vol. 26, No. 1.
- Lawrence, Robert Z., "Blessing or curse?" *Brookings Review*, Summer 1998, Vol. 16.
- Lewis, W. Arthur, "Reflection on Unlimited Labour", *Essays in Honour of Raul Prebisch*,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1972.
- Lewis, W. Arthur, "Unlimited Labour; Further Notes",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8, Vol. 26, No. 1.
- Li, Shuhe; Lian, Peng, "Deventra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China's Credible Commitment to Preserve the Market Under Authoritarianism", *China Economic Review*, Fall 1999, Vol. 10.
- Lockwood, W. (ed.), *The State and Economic Enterprise i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Mundle, Sudipto, "Fiscal Policy and Growth Some Asian Lessons for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Spring 1999, Vol. 10.
- Lo, Dic, "The East Asian Phenomenon; The Consensus, the Diss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sent Crisis", *Capital & Class*, Spring 1999.
- Mason, Edward S. and other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O'Brien, Philip J., "A Critique of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pendency." In Ivar Oxaal, Tony Barnett, and David Booth (eds.),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 Oxaal, Ivar, Barnett, Tony, and David Booth (eds.), *Beyo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5.
- Plummer, Michael G., "Book Review",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Summer 1998, Vol. 9.
- Preston, P. W., *New Trends in Developmen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 Robertson, Denis,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St. Albans, Staples Press,

- 1948, P. 214.
- Robinson, J. , *Economic Philosophy*, London: C A Watts and Co. Ltd. ,1962.
- Santos, Theotonio Dos,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Vol. 60.
- Sing ,C. Chew & Robert ,A. Denemark,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Sage Publications Inc,1996.
- Singer, Hans,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dian Economic Review*, Vol. 1, No. 2, 1952.
- Singer, H. W. ,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0, Vol. II.
- Skartein, Rune, *Development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omjee, A. H. , *Development Theory: Critiques and Exploration*, Macmillan Acaed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 Sunkel, Osvaldo, "Big Business and Dependencia." *Foreign Affairs*, 1972, Vol. 50.
- Sunkel, Osvaldo,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External Dependency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s Studies*, 1969, Vol. 1.
- Tyson, James L. , "East Asia: Up from the ashe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07/13/1998, Vol. 90, p. B4.
- Viksnins, George J. , "The Baltic State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Society*, Jan/Feb2000, Vol. 37.
- Woo, J. ,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rage, Stephen, "Examining the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in South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the Wake of Asian Economic Failure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Jan-Mar1999, Vol. 22.

## 二、译著类

(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钰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 (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彭姝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澳)尼哈莱难:《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体系的想法:依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白凤森、杨衍永、齐海燕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钰、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
-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
- (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
- (法)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 (韩)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儒教文化与现代化》,邢东田、黄汉卿、史少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 (韩)金正濂:《韩国经济腾飞的奥秘——“汉江奇迹”与朴正熙》,张可喜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
- (韩)李相俊:《韩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误》,韩振乾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韩)朴圣相:《增长和发展:实物生产和就业增加的战略》,蔡坚、陈晓希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 (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张胜纪、吴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 (韩)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李桐连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
- (韩)赵利济,(韩)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孔德涌等译,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
- (美)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曹征海、潘照东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

- (美)埃兹拉·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谷英、张柯、丹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
-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梁小民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9月。
- (美)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乔依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 (美)彼德·杜鲁克:《迈向经济的新纪元:日本成功的代价》,林肇熙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92年)。
- (美)C. P. 欧曼、G. 韦格纳拉加著:《战后发展理论》,吴正章、张琦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 (美)D. W. 乔根森:《生产率》(第2卷: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李京文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
- (美)戴约编:《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王燕然、王逾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美)费景汉、(美)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王璐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 (美)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吴永顺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
- (美)傅高义:《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陈振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 (美)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 (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美国为什么将随着亚洲的经济繁荣而繁荣》,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 (美)吉拉德·M. 米耶、都德莱·西尔斯:《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刘鹤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
- (美)罗伯特·L 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蔡受百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

- (美) 罗纳德·H. 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施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美) 罗纳德·H. 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钰、潘世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 (美) 毛·斯坦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
- (美) 乔恩·沃洛诺夫:《日本商业帝国》,徐国君、黎德祥、梁学宏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 (美) 乔恩·沃洛诺夫:《人为的奇迹:南朝鲜的经济崛起》,罗龙、郁庆晨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 (美) R. I. 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慧译,上海三联,1997年。
-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
- (美) 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路爱国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吕单、刘海龙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丁浩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法的第二阶段》,《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
- (美) 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蔚文译,外文出版社,1996年。
-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日) 安场保吉,(日) 猪木武德编:《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史8)》,连湘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 (日) 大谷健:《日本经济的腾飞: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日本国际交流研



- 究所编,曲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 (日)《东洋经济》(周刊),1972年1月15日。
- (日)都留重人:《现代日本经济》,马成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
- (日)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 (日)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马成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 (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宋绍英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日)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要览》,陈小洪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
- (日)馆龙一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金融制度改革》,载于王洛林等著《日本金融考察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孔凡、张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 (日)吉元国生:《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经济成功之道》,黄钢译,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年。
- (日)井村喜代子:《现代日本经济论:从战败到步出“经济大国”》,季爱琴,王建钢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 (日)林直道:《现代日本经济》,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日)林武:《技术与社会:日本技术发展的考察》,张健、金海石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
- (日)垄断资本研究会:《现代日本垄断资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
- (日)桥本寿朗:《日本经济论:20世纪体系和日本经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 (日)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 (日)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东洋奇迹——日本经济奥秘剖析》,王革凡、张来英、葛鸣、王明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
- (日)日本经济新闻社编:《世界经济大视野》,雅思译,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

- (日)邱永汉:《什么使日本人成为世界首富》,许晏平、李学良等译,金城出版社,1993年。
- (日)盛田昭夫:《日本造:盛田昭夫和索尼公司》,伍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 (日)市村真一:《日本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日)速水佑次郎、(美)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修订扩充版),郭熙保、张进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 (日)有泽广巳主编:《日本的崛起:昭和和经济史》,鲍显铭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 (日)中村隆英:《日本昭和和经济史》,刘多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 (日)中村哲等著:《论东亚经济的现代化》,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编,东方出版社,1998年。
- (日)竹内宏:《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吴京英译,中信出版社,1993年。
- (苏联)弗·安德里亚诺夫:《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参考《世界经济译丛》,1989年第10期。
- (苏联)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1915.08~1916.06)》(第2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
- (新加坡)林华生:《亚洲四级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黄晓勇等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
- (英)阿姆斯特朗等:《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史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英)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郭家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 (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大纲》,顾朝阳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 (智)亚历克斯·E.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比)安德烈·莫门主编:《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制度和经济变

- 迁》，陈江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编：《世界经济展望》，杨芳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
-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编）：《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贸易与国际政策安排》，储祥银等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
- 世界银行编：《198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
- 世界银行编：《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 林（Linn, J. F.）等编：《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 世界银行编：《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 世界银行编：《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
- 世界银行编：《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
- 世界银行编：《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
- 世界银行编：《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毛晓威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
- 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编：《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
- 世界银行编：《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 世界银行编：《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
- 世界银行编：《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
- 世界银行编：《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世界发展报告》翻译组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 世界银行编：《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本报告翻译组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
- 世界银行国别研究报告：《南朝鲜工业的过渡性转变》【本报告是根据

1985年8月和12月访问汉城的小组报告而撰写的,作者是D. M. Leipziger(小组负责人),Y. J. Cho, F. Iqbal, P. Petri和S. Urata等],石京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

### 三、中文资料

陈广汉:《刘易斯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陈晓律:《战后发展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第12期。

董正华、赵自勇、庄礼伟、牛可:《透视东亚“奇迹”》,学林出版社,1999年。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经贸政策和发展司等编:《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指南:韩国分册》,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

杜方利:《东亚经济的崛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房宁:《世界潮流中的国家利益》,《北京青年报》,1996年7月18日。

冯昭奎、张可喜:《技术立国之路:科学技术与日本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

高飞乐:《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1期。

高粱等:《崛起的奥秘:东亚经济起飞的经验及其给我们的启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

高钰:《第三世界发展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和外事司编:《中国台湾省、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南朝鲜、泰国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国家统计局国际信息中心《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国际金融统计年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和1996年。

韩国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编著:《韩国经济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经济日报》(台湾),1995年8月14日。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研究所编:《战后日本经济的畸形发展》,商务印书馆,1973年。

- 李琮:《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
- 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
- 李树藩、王德林:《最新各国概况(1997年版)》,长春出版社,1997年。
-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主编:《日本经济的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
- 刘旭明编著:《韩国经济发展之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
-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罗荣渠、董正华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缪宁:《规模未必经济:韩国大企业的问题探究》,《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3期。
- 全哲焕:《韩国的结构改革政策和经济动向》,《当代韩国》,1998年夏季号。
- 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邵名:“在稳定中寻求发展”,《读书》1989年第4期。
- 沈祖良、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 沈圣英主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背景、现状和战略模式》,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4年。
- 王洛林:《日本金融考察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
- 王健:《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概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
- 吴春波、郭国庆:《成“龙”的奥秘:韩国经济起飞透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 巫宁耕编:《亚洲“四小龙”的致富之路》,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
- 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 《亚洲华尔街日报》(香港),1996年10月22日。
-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
- 张季风:《90年代日本经济萎缩与政府的责任》,《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
- 张世和主编:《战后南朝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张琢主编,孙立平等著:《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
- 张蕴岭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经济管现出版社,1997年。
- 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 张蕴岭:《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 赵春明:《从神话到现实:东亚崛起与现代化模式》,武汉出版社,1998年。
- 赵春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多元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 郑励志主编:《快速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
- 郑也夫:《理性地批判与选择(读《知识分子与传统》)》,《读书》,1989年第4期。
- 周惠明:《挑战发展主义》,《读书》2001年第12期。

- 《亚洲华尔街日报》(香港),1996年10月22日。
- 杨永骧、沈圣英:《南朝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 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
- 张季风:《90年代日本经济萎缩与政府的责任》,《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
- 张世和主编:《战后南朝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 张琢主编,孙立平等著:《国外发展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
- 张蕴岭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经济管现出版社,1997年。
- 张蕴岭主编:《世界格局中的东亚与欧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 张蕴岭:《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 赵春明:《从神话到现实:东亚崛起与现代化模式》,武汉出版社,1998年。
- 赵春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多元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 郑励志主编:《快速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
- 郑也夫:《理性地批判与选择(读《知识分子与传统》)》,《读书》,1989年第4期。
- 周惠明:《挑战发展主义》,《读书》2001年第12期。